

從王道樂土到中國研究的資料庫
——超越帝國主義的滿鐵

陳鼎尹 著

2014年3月出版

自序

我曾對日本一無所知。少年十五二十時，對它的圖像來自漫畫、日劇、歌手與明星；在我開始為近代中國神往，日本卻為血腥與殺戮的斑斑鑿痕所佔據。祖父母偶爾提起的日治時代，也僅僅是浮光掠影。從未真真切切去探究那基隆的對岸。直至祖父驟逝，我才恍若大夢初醒，從遺物中尋找任何關於他的蛛絲馬跡。在一步步撿拾時間碎片的過程中，體會到不只是東亞近代史，對於我所關注的神州大地與台灣家鄉的發展，都有不可磨滅的痕跡與影響。

來到西子灣、遇見了石老師與思想中國團隊，我才開始摸索另一個探究中國的途徑——從各國、各不同文明基礎的漢學，所研究、精研的實體，甚至想像來反覆咀嚼——中國到底是什麼？這個被歸類在後殖民的研究，也像是一種拆解文本的逆向工程。因此，基於對日本／中國的興趣都難以割捨的情況下，我選擇了「滿鐵調查部」做為主題，期望能從這個可能是史上最大的中國研究機構，與自己過去所認知中國比較，同時能深入淺出日本。

團隊的其他成員，多從「個人」著手——亦即以個別中國學者為研究目標，以個案的累積拼湊出石公所追逐的——本土中國知識論的建構。本書則以調查部為主體，挖掘史料、探究系譜，與歷史、知識社會學範疇皆有涉獵。分為三部分：滿鐵的重要

ii 從王道樂土到中國研究的資料庫——超越帝國主義的滿鐵◆

調查、研究人員例像、戰後的影響。囿於個人能力與有限的資料，將這三個都可另外獨立成個別研究的議題合而為一，盼能提供一個較廣闊的綜合視野，以為之後的深入研究做準備，並稍稍彌補台灣在滿鐵研究上的缺乏。

除了指導教授石之瑜公，本書承蒙許多貴人相助。中研院黃福慶老師慨然借我日文專書，日本中心執行長鄭力軒老師提供了殖民／帝國主義的人類社會學觀點，臺北大學李朝津老師則給予了則從史學的角度給予指教。僅對這些學術先進致上誠摯的謝意。最後將本書獻給我摯愛的家人，以及觸發我走向日本，心底的最思念與最遺憾——爺爺陳東榮。

陳鼎尹 於西子灣 2014年3月

目錄

第一章 序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滿州的特殊性與滿鐵調查部	1
第二節 問題意識 — 帝國日本的機構與知識	5
第三節 研究背景	12
第一項 滿鐵調查部與後藤新平	12
第二項 大正民主與東大新人會	17
第四節 研究目的	21
第五節 研究方法	23
第六節 架構與章節安排	25
第二章 滿鐵調查活動的歷史軌跡	29
第一節 滿鐵調查部的發軔	33
第一項 滿州舊慣調查	33
第二項 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	37
第三項 東亞經濟調查局	40
第二節 從經濟調查會到大調查部	44
第一項 經濟調查會	44
第二項 大調查部與其組織	46
第三項 綜合調查	49
第三節 支那抗戰力調查	51
第一項 支那抗戰力調查	51

第二項 支那抗戰力調查的矛盾與政治後果	55
第四節 中國農村慣行調查	60
第一項 1920-30 年代中國的農村調查與研究	60
第二項 華北農村慣行調查	63
第五節 滿鐵期刊	69
第一項 滿鐵調查月報	70
第二項 北京滿鐵月報	72
第三項 滿鐵支那月誌與上海滿鐵季刊復刊	76
第三章 滿鐵調查部例像	81
第一節 調查部空氣與來源	82
第一項 1920 年代的轉折	82
第二項 日本國內鎮壓與調查部的擴大	84
第三項 調查部風氣與檢肅事件	87
第二節 戰爭理論家大川周明與東亞經調局	91
第一項 大川周明與東亞經調局	92
第二項 大川的研究與思想概述	94
第三節 記者觀察家橘樸與滿州評論	97
第一項 滿鐵之前的記者生涯	98
第二項 滿州評論	100
第四節 中國農經專家天野原之助	104
第一項 天野的中國研究略歷	104
第二項 滿州經濟月報與天野的中國農業經濟	106
第五節 從苦力研究到日中橋樑的伊藤武雄	110

第一項	從東大法學部、北京到加州柏克萊	111
第二項	從大連本部、奉天刑務所到日中友好協會 ...	114
第四章	滿鐵調查部遺緒與研究	119
第一節	滿鐵遺緒	119
第一項	戰後資料與調查人員去向	119
第二項	滿鐵資料分類及存放地	122
第二節	滿鐵研究的回顧與評價	127
第一項	滿鐵研究回顧	127
第二項	滿鐵研究的詮釋	131
第三節	中國農村資料的再研究	135
第一項	經濟史研究	135
第二項	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	141
第四節	滿鐵與日本戰後中國學	145
第一項	戰後的中國研究機構	145
第二項	對戰前中國學的批判與滿鐵的意義	147
第五章	結論：以滿鐵為方法進入中國	153
參考書目	157
附錄		
附錄一	：伊藤武雄的中國履歷	167
附錄二	：滿鐵知識菁英一覽表	169
附錄三	：1920-30 年代中國的農村調研整理	171

vi 從王道樂土到中國研究的資料庫——超越帝國主義的滿鐵◆

附錄四：滿鐵重要農村調查研究整理	172
附錄五：北京滿鐵月報	173
附錄六：滿鐵支那月誌	175
附錄七：上海滿鐵季刊發刊文	179

表目錄

表 1-1	帝國日本重要研究機構	8
表 1-2	1920 年代日本在華重要刊物	8
表 1-3	大正民主時期社運團體分類表	21
表 2-1	滿鐵調查部的行政組織沿革	31
表 2-2	滿鐵調查部研究分類	31
表 2-3	滿州舊慣調查報告書分冊內容與作者	36
表 2-4	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分冊內容與作者	53
表 2-5	被檢肅人員與支那抗戰力調查擔當表	59
表 2-6	華北農村慣行調查項目擔當者	68
表 2-7	華北農村慣行調查時間與地點	68
表 2-8	滿鐵調查月報議題整理	73
表 2-9	北京滿鐵月報特刊議題整理	74
表 2-10	滿鐵支那月誌議題分配比例	78
表 3-1	伊藤武雄發表於滿鐵支那月誌文章列表（部分） .	115
表 4-1	滿鐵資料分類	125

圖目錄

圖 2-1	滿鐵調查機關之系譜	32
圖 2-2	滿鐵調查月報第十一卷第九號刊頭	71
圖 2-3	生活費龍	74
圖 2-4	北京滿鐵月報特刊	77
圖 3-1	北京滿鐵月報封底	118

第一章 序論

現在把「滿洲」稱作我們的生命線。我覺得，我們的主要生命線就是按日本高尚的種族精神、日本民族精神和亞洲文明精神，在那裏建一塊樂土。為此目的，日本應該根據代表整個東方的日本精神、日本道德和日本文化，直接掌握和組織這個國家。

荒木貞夫，《日本之關鍵時刻》¹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滿州的特殊性 與滿鐵調查部

無論是對大東亞戰爭的反省、侵略史的爭辯或後殖民批判，都對帝國日本（Empire of Japan）這個概念賦予了複雜又細密的意涵。其涵蓋了不同時期、事件、地域與文化的各種意義，以至於切入的位置、發問的方式與面對的歷史情境，不能定於一。其中，因十五年戰爭² 而誕生，但最終遭到毀滅的滿州國（1932-

¹ 指滿州國。此為著將軍制服的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在 1933 年的新聞片《日本之關鍵時刻》中，慷慨激昂地進行侵略鼓動的演說。2010 年 7 月 4 日，條目：荒木貞夫，維基百科（中文）<http://zh.wikipedia.org/wiki>。

² 「十五年戰爭」指的是 1931 年滿州事變到 1945 年波茨坦宣言後日本無條件投降，最早是鶴見俊輔在《知識人の戦争責任》（中央公論 1956 年 1 月

1945），在此刻劃最深、最為後人所記憶，因為滿州國³除了有軍事、經濟與移民等實用目的，是日本當時欲突破困境的新天地，更同時蘊含了文化和思想的後設，以上荒木慷慨激昂的言詞即可一窺。

回溯歷史可知，滿州對日本的特殊意義自明治維新前即有之。早在寬永年間（十七世紀），民間與學術界就有日人遊歷滿州最早的記錄——《韃靼漂流記》；江戶幕府時期的國權論者佐藤信淵認為，「皇國為萬國之本，具有統一世界的使命」而為了實現這一使命，「必先使自滿州，次而朝鮮，近而及之於支那，更應向全世界推進」；吉野松陰則鼓吹「北割滿州之地，南收呂宋諸島」。⁴ 明治以後，有東洋學派創始人白鳥庫吉，以語言、歷史與民族的考據，提出滿蒙為東西洋文明之共同起源，向西形成了基督教，向東形成了敬天的儒教文明；⁵ 另有提倡泛亞洲主義的大本教（おおもと）教主出口王仁三郎，⁶ 因

號）中所用，靈感來自西格蒙·諾依曼把兩次大戰整個期間稱作三十年戰爭。鶴見認為若把太平洋戰爭或大東亞戰爭看成對美國的戰爭並不恰當，因為這種觀點無法掌握戰爭的結構，且會使日本人淡化戰爭責任。鶴見俊輔，邱振瑞譯，2008。《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臺北：行人出版，頁9。

³ Louise Young, 1998, *Japan's Total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⁴ 嚴紹盪，1993。《日本中國學史》，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⁵ Stefan Tanaka, 1993.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⁶ 出口王仁三郎（でぐち おにさぶろう），1871-1948。本名上田喜三郎，農家出身，祖母上田宇能為日本言靈學中村孝道之妹，幼年身體虛弱，由其祖母在家教育，因此被鄰居認為是神童。13歲時由於時代混亂，到附近學校擔任代理職員，後因正式職員到任而辭職，恢復從事農牧業。不久後

宣稱其為唯一保有純淨起源的真正神道教而被指控叛逆罪，但流亡滿蒙再回日本後，卻成為英雄般的公眾人物，既反映也激起許多人對滿蒙的幻想。⁷

所以，與其說滿州國是一個新的日本殖民機構（政府），不如說是依循日俄戰爭後創立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1906-1945）⁸ 的路徑在開展。握有權力的軍政界人士，如山縣有朋「主權線」與「利益線」的主張，⁹ 時任首相的田中義一在東京會議¹⁰ 後擬定上呈裕仁天皇的《我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¹¹ 宣稱「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¹² 或石原莞爾選擇滿州作為理想的行動場域，視為日本生存和稱霸的生命線，甚且是蘊含中國儒家

對宗教感到興趣，1898年三月去高野山靈修，10月在京都綾部遇到出口直，隔年七月受到出口直的招待到綾部去改善大本教。之後入贅，改名出口王仁三郎。

⁷ 出口回日本後被形容成“the man with big dream” “like a king in a fairy tale”，經歷更成為小說和戲劇的題材。Sven Saaler & J. Victor Koschmann eds., 2007. *Pan-Asianism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Colonialism, Regionalism and Border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er 4, Li Narangoa, Universal value and Pan-Asianism- The vision of Omotokyo.

⁸ 英文名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mpany，縮寫 SMR；中、日文簡稱都是滿鐵（まんてつ）。

⁹ 日本的利益線應以朝鮮、滿州為界，1890年提出。

¹⁰ 又稱東方會議，1927/6/27 至 7/7 在東京由當時的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討論對華侵略方針。關捷主編，2006。《日本侵華政策與機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1。

¹¹ 又稱田中奏摺。嚴紹盪，《日本中國學史》，頁 546。

¹² 關捷主編，《日本侵華政策與機構》，頁 53。

以德化為主而不尚武力的實踐所在，¹³ 乃是實現五族協和的王道樂土。而在「日本的滿州」首先登陸的滿鐵，是一個以交通運輸與經濟為掩飾的國策會社，揆諸日本各界對滿州賦予的精神意義與物質企圖，歷史學者（Matsusaka）用特洛伊木馬（The Trojan Horse）的形容或許更為傳神。¹⁴ 可見，滿鐵的意義值得再探究。

在首任滿鐵總裁後藤新平的倡議下，滿鐵甫成立即設立了調查部，當時最重要的目的是釐清自沙俄接受的鐵路附屬地。然而在長達四十年的歷史中，調查部非一時、一人、一地，它不只為殖民政策、軍方戰略需求與滿州國肇建的經濟計畫生產知識，也是菁英薈萃的場域。從歷史的回顧中可以看到，戰前許多日本的中國研究者、學者都與其有所關聯，或透過滿鐵遂行自身的研究，或因此與中國產生各種學術上的接觸與撞擊。調查部進行了可能是中國史上最早大規模與不同層次的農村調查（例如滿州舊慣調查、華北農村慣行調查），而這些資料都已超越政策所用，甚至成為戰後中國研究的爭辯。若僅以「帝國」、「侵略」來框架，也許就無法回答為何在 1940 年代，滿鐵調查部成為東條政府震壓對象中人數最多的知識機構。

如上述，欲回答帝國日本的種種，不能不掌握滿州的特殊性。滿州國固然可以解釋成一種物質導向的現象，成為許多被視為帝國主義實踐的方方面面，比如軍事戰略上的需求、實現

¹³ 李永熾，1992。《日本近代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頁 351。

¹⁴ Yoshihisa Tak Matsusaka, 2001. *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 1904-193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亞洲主義的王道樂土、資源擷取或經濟大恐慌後日本的出口，當然也可以當成是文化現象，尤其是能影響到從當代到後世的知識生產。

草柳大藏以「原野思想」來指涉支持滿鐵與調查部成員意志與行動背後的信念。¹⁵ 因此，帝國與調查部可以放到權力與知識的關係中，其研究機構則是權力來源，更是人（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中介。無論以漢學、中國學或支那學來歸納日本對「中國」這個研究客體的學問，滿鐵調查部的重要性都無與倫比。若以帝國日本崛起而對外擴張的時間起算，滿鐵調查部無論是在機構規模、存在時間、組織的研究、蒐集與累積的資料、發生的歷史事件與戰後的再研究，都最具有日本對華研究機構的代表性，更遑論它發軔於特別的滿州，故擇其為本論文的研究對象。

第二節 問題意識 — 帝國日本的 機構與知識

後殖民研究從帝國主義（imperialism）與殖民主義（colonialism）出發。楊格（Robert J. C. Young）認為，前者的定義包含了領土被宰制時的政治系統、意識形態和經濟操控，或者是一個中央集權官僚、一統的大（帝）國；後者指的則是殖民系統，以

¹⁵ 草柳大藏，劉耀武、凌雲、舟徒、關益合譯，1982。《滿鐵調查部內幕》，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頁10。

及其強行實施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政策。無論何者，都牽涉到「某群人從屬於另一群人的形式」。¹⁶ 而為了便於宣傳並更順遂地推行政策，帝國往往訴諸文化論述、思想或意識形態，如宣稱殖民的使命是上帝賦予，要使世界其他地方受到西方文明的現代化薰陶；為了「開化」土著、給他們更好的生活；而教育乃至基督教的傳播，亦被視為帝國主義用來正當化於殖民地不平等權力關係的附屬品。這顯然比真實的理由——與其他帝國的競爭、舒緩市場飽和、將（殖民）侵略做為暫時止住國內的異議等，是更為合情合理的動員之辭。但凡此種種，卻造成了殖民與被殖民者間在意識形態上的重大鴻溝。¹⁷

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小說《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藉由主角馬羅（Marlow）如此敘說：

征服土地多半就是掠奪他人土地，從那些和我們有不同的膚色鼻子稍微平一點的人手中奪走他們的地。如果你仔細檢視，這不是什麼光彩的事。能夠彌補的只有觀念，這個行為背後的觀念。不是什麼感性的藉口，而是一個觀念；並且毫無私心相信這個觀念——你可以將之建樹，趨前鞠躬，供奉犧牲。¹⁸

¹⁶ 楊格（Robert J. C. Young），周素鳳、陳巨擘譯，2006。《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導引》，臺北：巨流圖書，頁 15。殖民（colonial）與帝國（imperial）兩概念有不同的歷史背景與演進，於後殖民研究中有諸多爭議。本研究不特別探討，僅以楊格所做的定義為綱，視帝國日本在亞洲的推進（軍事與政治上）行為為 Imperialism，滿鐵等國策機關、後藤新平政策構思為 Colonialism（經濟、社會政策與治理），並為帝國主義的一部份。

¹⁷ 楊格，周素鳳、陳巨擘譯，《後殖民主義》，頁 28。

¹⁸ 楊格，周素鳳、陳巨擘譯，《後殖民主義》，頁 25。

在亞洲，也出現異曲同工的殖民論述。東洋史學者內藤湖南認為：

倘欲開墾大片稻田，就要先疏通灌溉溝渠。因此，你必須使用鐵鎚甚至炸藥粉碎巨石。假使有人反對你最終目的，或批評你破壞土地，你該當如何？¹⁹

內藤認為日本應承擔使中國現代化論述的後設，是日本在崛起之後和帝國／殖民主義同時發展出的概念－東洋史觀（oriental historiography）：²⁰ 現代西方文明的衝擊，使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產生了新思想與舊傳統之間的矛盾，及自我認同的兩難。藉著批判儒教與歷史建構，將中國（ちゅうごく）逕稱為支那（しな），重新概念化東洋後，舊有的中國概念及儒學思想便得以與日本區隔。在概念上拋棄中國後，能和西方平等甚至超越的新日本於焉誕生。於是，帶「超越性」的帝國日本在「停滯支那」的種種行為就有正當性，即使是侵略、戰爭的手段也蘊含「解救」與「開化」的意義。

¹⁹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溫洽溢譯，2001。《追尋現代中國》，臺北：時報出版，頁 509。Cooper 與 Stolerr 並指出，英、法、荷在殖民地建立了一個具普遍性的公民文化，儘管隱含了公民權、正當性與（政治）參與，卻是有界限的（bounded）。意指這不是真正的政治開放，也只是遂行殖民治理的一種手段。Frederick Cooper & Ann Laura Stolerr, 1997. *Tension of Empir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²⁰ 日文發音：とうようし，即東洋學。

表 1-1 帝國日本重要研究機構

機構名稱	時 間	創設者	備 註
東亞同文書院	1901-1945	荒尾精	前身為日清貿易研究所
滿鐵調查部	1907-1945	後藤新平	
東亞研究所	1938-1945	企劃院	

資料來源：《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隔世遺思－評滿鐵調查部》

表 1-2 1920 年代日本在華重要刊物

刊物名稱	創刊時間	發行者與地點
調查時報	1919 年	大連，滿鐵發行
支那研究	1920 年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發行
滿蒙	1920 年	大連，滿蒙文化協會發行
新天地	1921 年	大連，新天地發行社
北京滿鐵月報	1924 年	北京，滿鐵北京公所發行
月刊支那研究	1924-1926 年	大連，支那研究會發行

資料來源：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日本東洋史學方法之一面向》²¹

而在帝國日本半世紀的歷史中，設立了規模相當的研究機構（表 1-1），如滿鐵調查部、培養中國通的東亞同文書院，及企劃院在進入戰爭體制後成立東亞研究所等。非政府組織有亞

²¹ 陳慈玉，1993。〈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日本東洋史學方法之一面向〉，《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 42 期，頁 22。

太地區民間團體在一戰後成立，為研究該區域秩序維護的太平洋問題調查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 IPR）。²² 1920、30年代，因為更多日人需要更深入瞭解中國，各種報刊、雜誌因應而生，如伊藤武雄口中「在北京日人必讀」的京津日日新報。²³ 表1-2 為當時最受歡迎的日文（對華）刊物，其中《調查時報》與《北京滿鐵月報》由滿鐵發行。

從傳統的後殖民觀點出發，以上都可以歸類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幫兇；站在楊格（Robert Young）的角度，東洋史學確實可以看成合理化殖民政策的論述；若從傅柯（Foucault）的觀點來看，這些生產出來的知識、研究與系譜，都只是背後權力關係（當局）的反映；Stefan Tanaka 則認為，從個別學者到以上機構（滿鐵與東洋文庫皆然），都被單一的東洋史觀所影響。受到框架的研究架構與方法遮掩了真實，造成日本研究者和中國實況的疏離，他們期望救贖的東亞竟成為無聲的個體（voiceless thing）。²⁴ 山路愛山、橘樸、尾崎秀實這些貼近中國的觀察者，都曾抱怨日本的大眾不瞭解中國。²⁵ 平野義太郎在 1934 年撰文批判白鳥和內藤，認為兩者的研究方法都是從古代文本的詮釋與考證入手，卻忽略中國實際的社會經濟結構。他並將中國研究區分為「科學主義」和「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的中國研

²² 存在時間為 1925-1958 年。原覺天，1984。《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東京：勁草書房。

²³ 伊藤武雄，1984。《滿鐵に生きて》，東京：勁草書房。

²⁴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p.21.

²⁵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p.228.

究中又再分為純然（pure）和實然（practical）的研究者。²⁶ 尾崎秀實在《處於暴風雨中的支那》自序寫道：

在日本，並不是不存在著支那研究，倒不如說反而應該為所謂的支那通過多而擔憂。…這些支那觀，總體來說，應該都是「東洋」史的史觀。…今天，在支那研究中，成為一大問題的，那就是科學方法的缺少，亦即支那論中方法論的欠缺。²⁷

承上，導引出本研究第一個問題意識：欲探究滿鐵調查部中，是否有東洋史或其他論述做為研究的後設；與作為一個龐大的知識生產機構，在帝國日本崛起與擴張的進程中，與權力、政策當局的關係如何。滿鐵無庸置疑是殖民主義下的產物，是後藤新平以政策制定、（殖民地）治理為目的所設立，但滿鐵的知識系譜呈現了諸多知識與權力間的矛盾，故本研究以為出發點。

首先由回顧戰前歷史來討論，而第二個問題意識則是戰後對殖民、侵略時期所生產出知識的再反省——如何不因戰爭而斷裂，延續並影響戰後的中國研究。過去的殖民的研究中，由於和帝國主義掠奪、侵略與戰爭等歷史交織，使殖民機構生產的知識受到質疑；甚至因為冷戰體制的形成，在美國亞太戰略的

²⁶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p. 253.

²⁷ 野村浩一，張學鋒譯，1999。《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走向亞洲的行蹤》，北京：中央編譯社，頁 174。

構思下，日本掩蓋了殖民者對殖民統治與戰爭責任的反省；²⁸ 小熊英二在《单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則提出，在大東亞的文化論述中，日本的國體界定成為多民族國家，但戰後日本與日本性內縮到單一民族，因為海外殖民與相關經驗被官定在「侵略」與「戰爭反省」的框架下。若以此為前提，就會失去討論日本在海外的知識生產對日本國家發展反饋與影響的可能。²⁹

晚近的研究中，二分的絕對道德判准漸漸褪去，殖民知識被視為構成現代性（modernity）的一部份。由於在殖民地有著相對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使得政府可以比在母國有更大的空間進行政策或社會實驗。例如法國第一個都市計畫是在阿爾及利亞；日本本土在 1920 年才實施全國性的人口普查，台灣則早在 1905 年即實施。Louise Young 認為，無論是滿鐵或滿州國，因為滿州提供了行政組織重劃、社會實驗、大膽統制經濟與創新的場域，構成了戰後經濟奇蹟的一部份。³⁰ 岩波講座出版之《帝國日本の学知》指出，透過帝國政治系統以及知識、技術的實踐，政治學、法學、殖民政策學得以在亞洲不同地域實行並反饋到帝國，彼此交互作用而產生突破性的發展，並影響日本本

²⁸ 荊子馨，鄭力軒譯，2006。《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第一章。

²⁹ 小熊英二，1995。《单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

³⁰ Louise Young, 1998. *Japan's Total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土與殖民地的轉型。³¹ 因此，討論殖民知識生產對戰後研究者持續的影響，如仰賴滿鐵資料的中國農村研究，因而受到當時問題、認知與素材的影響；以及如何形成中國學研究中的特定知識體系。

第三節 研究背景

第一項 滿鐵調查部與後藤新平

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設立的背景，是日俄戰爭³² 後日本分別與俄國、清廷簽訂的和平條約。1905 年 9 月 5 日簽訂的「樸資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³³ 第六條規定：

在清國政府的承認下，俄國願意將長春（寬城子）旅順口間之鐵路及其一切支線並附屬於同地方之一切權利、特權及財產，並在同地方屬於該鐵路或為其利益而經營的煤礦轉讓給日本政府。³⁴

同年 12 月 22 日與清朝簽訂的「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

³¹ 酒井哲哉編，2006。《帝國日本の學知—第一卷》，東京：岩波書店。

³² 1904 年 2 月日本對俄羅斯發布最後通牒開始，至 1905 年 5 月對馬海峽海戰最後一場戰事底定，9 月 1 日簽署休戰議定書。

³³ 在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調停下，日俄兩國於 1905 年 9 月 5 日在美國新罕布夏州樸資茅斯海軍基地簽署合約，結束了日俄戰爭。

³⁴ 黃福慶，1986。〈論後藤新平的滿州殖民政策〉，《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十五期上冊，頁 379。

正文第一款謂：

中國政府將俄國按照日俄和約第五款及第六款允讓日本國之一切概行允諾。³⁵

這兩個條約確立了日本在主權仍屬中國的條件下，自俄國接收南滿鐵道及相關利權。戰後一段時間滿州委由野戰鐵道提理部管理，是為軍政統治。為討論撤除軍政而改行民政治理與滿州經營方針，1906年5月22日在首相官邸召開了「元老閣僚會議」（一稱滿州問題協議會）。³⁶會中大將如兒玉源太郎、山縣有朋、寺內正毅與山本權兵衛等人態度較保留，屬軍治派；伊藤博文主張開放，他在圓桌會議上出示瀋陽英國領事館來函，內容力促日本必須堅持門戶開放政策。³⁷早在1904年11月，伊藤在東京與英駐日大使 Claude MacDonald 會晤時就提出他滿州中立化的主張：「既沒有要滿州，也不會讓當地駐軍擴張並

³⁵ 第二款：日本國政府承允，按照中俄兩國所訂借地及造路原約實力遵行。嗣後遇事，隨時與中國政府妥商釐定。

第三款：本條約由簽字蓋印之時起即當實行，並由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禦筆批准，由本約蓋印之日起兩個月內，應從速將批准約本在北京互換。

³⁶ 與會人員：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大山巖、西園寺公望、松方正義、井上馨、寺內正毅、齋藤實、阪谷芳郎、林董、桂太郎、山本權兵衛、兒玉源太郎。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州殖民政策〉，頁380。

³⁷ Peter Duss,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1989, *Japan's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05. 英美等國之所以在日俄戰爭中支持日本，一個重要原因即是相信日本會比俄國更開放，並維持他們在滿州的商業與貿易利益。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州殖民政策〉。

推延到省的邊界」，而且「以鐵路為經營主體最能防範俄國的入侵」。³⁸ 加以當時列強以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為基礎，靠條約的多方平衡使中國免於瓜分，日本也必須遵守這個原則。在各種因素的權衡下，會議最後決定廢除軍政署，使經營滿州的中心機關，轉到後藤新平與兒玉源太郎研擬的鐵路公司上。³⁹ Matsusaka 指出，日本試圖圍繞列強訂下的規則，以不逾越他國能容忍得最大限度，即避免直接領土控制的條件下，把握每一個所能擷取利益的機會。⁴⁰ 滿鐵公司成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6 月 7 日，日本政府以天皇名義發布的第 142 號飭令，公佈了《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成立之件》，章程中規定了鐵路、煤礦與港灣的經營事項。11 月 26 日在東京正式成立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資本金兩億日元，一半由政府持股，首任總裁為後藤新平男爵。⁴¹ 他是在經過日本元老及閣僚慎重的考慮與協商後，獲得一致屬意後所出任。後藤曾擔任第三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1898-1906），對殖民地治理有經驗及貢獻，雖於滿鐵任期不滿兩年（1906 年 11 月 13 日-1908 年 7 月 14 日），卻是滿鐵架構的奠基人，其日後的龐大規模和調查機關的獨特性格，亦源自他的動機與堅持，故後藤新平對調查的邏輯與觀點值得介紹。

後藤新平（1857-1929）為明治末期與大正初期的政治家，

³⁸ Yoshihisa Tak Matsusaka, *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 p.43.

³⁹ 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州殖民政策〉，頁 381。

⁴⁰ Yoshihisa Tak Matsusaka, *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 p.3.

⁴¹ 2010 年 7 月 4 日，條目：南滿州鐵道，維基百科(中文)<http://zh.wikipedia.org/wiki>。

終其一生雖未爬至組閣的首相，但擔任各要任的政績⁴²與提振殖民地經營所採取的強烈手段，無人能望其項背。⁴³後藤原本是個醫生，直到明治十六年被推薦成為內務省事務員，才由衛生局展開他的仕途。⁴⁴後藤對調查相當重視，德富蘇峰曾如此描述：

後藤伯對於調查一事，簡直像手提包之類的東西，經常帶在身邊。後藤之所以開口便是調查，就是因為他首先要弄清楚自己所研究的對象，究竟是家鯽魚，還是偏口魚這一前提。⁴⁵

甫進入衛生局，為瞭解新瀉、長野、群馬三縣的衛生狀況，即擬定了一份詳細的問題清冊，除醫療衛生項目，連地理、測量、物資、風俗等範圍一併調查。⁴⁶他在明治二十二年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國家衛生原理》，綜合社會契約論、國家有機體論、社會進化論等，提出生物學的國家論，比喻政府為醫生、人民為患者，官員擔負著文明開化的使命。然而，又要如何進行所謂的「文明開化」、甚至不同民族風俗的殖民地治理呢？後藤的觀點是對自治與舊慣的尊重，即所謂的「生物學原理」，

⁴² 從衛生局開始，擔任過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滿鐵總裁、遞信大臣兼鐵道院總裁、內務大臣、外務大臣、東京市長等。

⁴³ 北岡伸一，魏建雄譯，2005。《後藤新平傳》，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前言。

⁴⁴ 後藤至衛生局赴任前曾寫下：良相良醫啟異乎！

⁴⁵ 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頁40。

⁴⁶ 北岡伸一，魏建雄譯，《後藤新平傳》，頁15。

他以比目魚來譬喻：

欸！絕不能將比目魚的眼睛當成鯛魚的眼睛呀！鯛魚的眼睛長在頭的側，而比目魚的眼睛卻長在一側，雖然很奇怪，要像鯛魚般把眼睛置放到兩側是不可能的。比目魚的一側有兩個眼睛，在生物學上有其必要才如此。要是非將所有的魚類的眼睛都置放在頭的兩側，是行不通的。這個概念在政治上也是很重要的。

社會習慣或制度這些東西，都是其來有自的，是長時間有其必要下所產生的。其道理未予辨明，便欲將文明國家的制度強行在未開化國家中實行，可稱之為文明的暴政；這種事情是不能做的。

所以，我們在統治台灣時，首先要把該島的舊慣制度，以科學的方式詳細調查，順應民情統治。不理解這個道理，就冒然地想把日本的法律制度移植到台灣實施的一千人等，就和想把比目魚的眼睛換成鯛魚的眼睛的人是一樣的，都是些不懂真正的政治為何物的傢伙。⁴⁷

對舊慣的重視不只是尊重，也是後藤所認為可以成功執行公共行政與殖民地治理的罩門。另外兩個著名的理論是「文裝的武備論」與「學俗並進」，前者指「文裝的措施，以備他日侵略之用」，表面上進行一般的治理，實際上這些建設都可以在戰時轉為軍備所用；後者則認為所謂文明的生活，是要將學

⁴⁷ 北岡伸一，魏建雄譯，《後藤新傳》，頁38。

者與俗人的距離拉近，即學術和實際相結合。⁴⁸ 大正三年（1914）在幸俱樂部的演講上，他說：「殖民政策就是文裝的武備。以王道為旗幟實行霸道，此乃當代的殖民政策。因此，它需要如何治理，應由帝國殖民政策來決定」。⁴⁹ 這三者共同組成後藤流傳後世的哲學，亦即強調凡事以科學的角度、方法作為處理事務前提的方法論。⁵⁰

第二項 大正民主與東大新人會

史家將 1905-1932 這段期間稱為大正民主（大正デモクラシー），始於對日俄戰爭後和平條約的抗爭，⁵¹ 終於政友會內閣倒台，可用「帝國民主主義」一詞蔽之。⁵² 1912、13 年發生大正政變，導致了第三次桂太郎內閣總辭，人民反對藩閥與軍閥控制，希望縮小特權階級的政治權力並將重心放在議會與政黨，以實行普選、給予婦女參政權訴求來擴大人民的參政範

⁴⁸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1988,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Fogel's introduction.

⁴⁹ 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頁 41。

⁵⁰ 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州殖民政策〉，頁 380。

⁵¹ 日俄戰爭軍費為甲午戰爭的八倍，戰死六萬人，另有兩萬人死於疾病。政府和輿論一直讓人民相信戰後日本可以在賠款和領土得到補償，結果卻是一無所獲。對日俄戰爭締結之和平條約的不滿，釀成了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安德魯·高登（Andrew Gordon），李朝津譯，2008。《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幕府到現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59。

⁵² 安德魯·高登，李朝津譯，《日本的起起落落》，頁 197。

圍。⁵³ 這時山本權兵衛的組閣，除了是兩黨政治的隱然成形、軍人權力削弱，也代表政治領袖已不能忽視國會民選議員的力量。至於國際因素方面，則有一戰後世界民主風潮，如美國民主理念的影響；又有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觸發了各地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革命、左翼運動蓬勃發展。而知識界重要的學者與思想家，有主張天皇機關說⁵⁴ 的美濃部達吉，自由主義派學者、提倡民本主義的有吉野作造、中央大學的長谷川如是閑與早稻田大學的大山郁夫等人。在這樣的背景下，除了社會以各種方式來表達對帝國憲法、國家政策、女權、勞工等議題的訴求之外，經濟、教育、文藝、美術與風俗各領域也產生新氣象。⁵⁵ 這樣的風潮向西擴張到帝國日本的滿州，有致力於滿蒙獨立運動的浪人⁵⁶ 與亞細亞主義者，也有主張建設滿州為王道樂土的大雄峰會與滿鐵中的左翼派系；向南則促使了台灣的新文化時期（1914-1936），如林獻堂領導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34）與台灣文化協會（1921-27）。⁵⁷

⁵³ 黃福慶，1993。〈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背景探討〉，《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二十二期下冊，頁 140。

⁵⁴ 東京帝大法學專家美濃部達吉在 1912 年提出的天皇機關說，主張日本的主權屬於國家，天皇作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行使權力，這就否定了上杉慎吉的天皇主權說，為在日本建立政黨內閣、實現政黨政治奠定了理論基礎。法西斯認為天皇機關說是建立獨裁專制的一大障礙，便群起而攻之，2010 年 7 月 4 日，條目：天皇機關說，維基百科(日文)<http://ja.wikipedia.org/wiki/>。黃福慶，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背景探討，頁 141。

⁵⁶ 1911 年，大陸浪人川島浪速趁辛亥革命策畫了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1916 策劃了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均未成功。

⁵⁷ 李筱峰、林呈蓉編著，2004。《台灣史》，臺北：華立圖書，第八章。

日本大學生（特別是帝國大學）在 1917 年俄國革命成功與翌年「米騷動」之後，既深受震撼，也有感於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因為教育制度的關係，這些相當於已取得高進入社會位階門票的大學生，不止對職涯預期頗高、也因這些衝擊反覆構思著帝國日本的社會與未來。⁵⁸ 1918 年 11 月，1918 年，在吉野作造及麻生久⁵⁹ 的指導下，赤松克麿、宮崎龍介（宮崎滔天之子）、石渡春雄等人在東京帝大法學部成立新人會，⁶⁰ 由赤松所擬的綱領有二：

一、吾人配合世界文化之勢——人類解放新氣運，並努力促進之。

二、我們致力事現代日本合理的改造運動。

他們剛成立時的主張是吉野的「溫和的民主主義原則」，但這與以意識形態為本位的學生運動比起來，未免太過柔弱。⁶¹ 1920 年代中期後，新人會與社會主義政黨的工會結合，傾向馬克思主義，要求經濟、社會平等與政治革命，成員也開始參與

⁵⁸ 鶴見俊輔，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頁 20。

⁵⁹ 新人會成立之後，原本以麻生久為中心進行社會問題研究的「木曜會」成員，如片山哲（日本第四十六代內閣總理大臣）、棚橋小虎、佐野學、野阪參三、岡上守造等人，也加入了新人會的活動。伊藤武雄，《滿鉄に生きて》，頁 37。

⁶⁰ 創會成員有赤松克麿、宮崎龍介（宮崎滔天之子）、石渡春雄、平貞藏、三輪壽壯（佐爾格事件中尾崎秀實的官方指派律師）、嘉治隆一、林要…等人。1918 年 12 月創立到 1929 年 11 月解散，可判別的會員人數約有 360 人，2010 年 7 月 4 日，條目：新人会，維基百科（日文）<http://ja.wikipedia.org/wiki/>。

⁶¹ 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頁 22。

各種勞工及佃農組織的運動，不久，新人會創始人與創始成員背離社會主義運動，轉向國家社會主義。⁶² 而新人會的意義為何呢？高登（Andrew Gordon）指出，以當時體制內菁英匯聚的東京帝大為基礎的新人會，是戰前所建立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學生政治組織。第二，是新人會成為共產黨和左翼運動團體的出身地，也因為東大法學部，使得社會主義、社會運動者地位提高。⁶³ 第三，新人會的風氣不只擴展到其他大學，甚至擴及高校。他們成立組織，與社會運動、民間社團連成一氣，或捍衛自己的立場、或為不同的問題爭辯。以下表列當時重要的，進行社團運動的知識份子，還有北一輝、大川周明、滿川龜太郎等。⁶⁴ 以下列出不同社團的分類表：⁶⁵

⁶² 新人會創立的雜誌從デモクラシー（1919/2-12）、先驅（1920/2-8），改為同胞（1920/10-1921/5），最後改稱ナロオド（NADOD。群眾之意，由俄文演變而來，1921/7-1922/4），由此可看出其思想、風氣之轉變。黃福慶，〈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背景探討〉，頁 146。

⁶³ 新人會以 1920 年 11 月區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新人會從人道主義、理想主義的社會運動出發，有學生、畢業生、工人參與，此時輩出了很多無產階級政黨、農工運動的領導者，以及大學教授和律師等專業人士。1920 年 11 月，因為學校社團組織而改組的新人會，繼續組織學生並鞏固東大內部的學生基礎。1926 年第二次日本共產黨建立時，新人會為其組織的一個分支。2010 年 7 月 4 日，條目：新人會，維基百科（日文）<http://ja.wikipedia.org/wiki/>

⁶⁴ 提出日本改造法案的北、大川與投身中國革命運動的滿川並列為猶存社的「三尊」。

⁶⁵ 京大猶興學會有大川周明、安岡正篤、笠木良明、中野琥逸等人；猶存社有北一輝、滿川龜太郎、岩田富美夫、清水行之助、辰川龍之助，大川與安岡亦有參加。

表 1-3 大正民主時期社運團體分類表

	學 院	民 間
國家主義	京大猶興學會、東大日の出會、拓大魂の會、早大潮の會	猶存社、行地社、神武會、大雄峰會、黑龍會
自由主義 社會主義	東京帝大新人會、早稻田大學民人同盟會	黎明會、日本共產黨

資料來源：黃福慶，〈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背景探討〉。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滿鐵調查部雇用者大部分來自東亞同文書院和東京外國語學校。但 1917 年十月革命前後，則有越來越多帝國大學畢業生進入了滿鐵，⁶⁶ 戰後許多滿鐵研究中都視新人會為滿鐵知識集團的重要出身地，可見大正民主風氣的影響。而新人會出身的滿鐵調查部成員有田中九一、伊藤武雄、波多野鼎、嘉治隆一、鈴木小兵衛、石堂清倫、野間清、石浜知行、岡上守造等人。

第四節 研究目的

中國大陸的近代史研究領域中，對十八世紀末期至二戰結束之間的中日關係史、日本侵華史及在華機構著墨極深。滿鐵調查部的研究與其他同時存於中國者，如關東軍、華北駐屯軍、

⁶⁶ 小林英夫，2005。《元祖シンクタンクの誕生と崩壊》，東京：平凡社，頁 49。

滿州國、汪精衛南京政府、東亞同文書院等機構的歷史研究，被劃定在帝國主義、後殖民批判的範疇，其所遺留的文書、報刊、報告、公文乃至建築，都是形塑中國做為一個被侵略與殖民受害者最好的例證，⁶⁷ 也是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原則下，進行國家建構（nation building）最好的途徑之一。日本的研究可分為兩種，一是原滿鐵調查部出身者的經歷回顧，例如野間清、伊藤武雄、石堂清倫、具島兼三郎等人的自傳式整理，對當時的種種提出詮釋、細節，兼以對戰爭的反省與批判；一為無相關經歷的研究者對歷史素材、事件的重新考據，或遺留資料、相關出身者的再研究，如小林英夫、井村哲郎與松村高夫，是區域研究、歷史或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者。第三種是站在中日之外的位置，或如楊覺勇（John Young）對美日圖書館滿鐵資料的考據，或如黃宗智（Philip Huang）與馬若孟（Ramon H. Myers）利用 1940 年代滿鐵所做農村調查資料（華北農村慣行調查）寫成對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歸類在實證社會科學的範疇，較少意識形態的沾染。本書則希望以社會科學而非歷史的方式來梳理材料，不預設民族主義後後殖民批判的立場或墜入某個預設中，特別是不把它僅僅放在殖民主義的框架中。試圖以一知識史、知識社會為核心，佐以文化、歷史和思想等要素，探討以其知識貫串的背景、人與機構，並觸及爾後的發展脈絡。如此研究的目的是，透過系譜與時代變遷，來找出調查部的知識生產呈現的問題意識、權力關係與歷史脈絡如何擴散，並分

⁶⁷ 用以做為戰爭屠殺、資源榨取或勞動剝削等侵略暴行、戰爭罪行的證據。

為三個問題來回答：

1. 滿鐵調查部的意義為何？
2. 滿鐵調查部研究與生產的知識，和時代背景、權力關係對研究者的意義與關聯為何？
3. 以滿鐵中國農村研究為代表，討論帝國知識生產在戰後遺緒中的擴散。

第五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

研究對象為滿鐵調查部，但其涵蓋範圍甚廣，因而有所刪減與過濾；再者，由於其間歷史演進與發展，並非從一而終置於大連本社，人員與組織架構亦有變動。為了社會科學途徑操作的便利性，本書將「滿鐵調查部」（或以調查部、滿鐵簡稱）設定為一概念化的名詞，主要指的是滿鐵會社中，社會科學、人文史地等領域知識生產的脈絡、人員與組織。第一是討論所選定的關鍵事件與機構細節作為背景分析；第二是選擇四個具有調查部經歷者做為例像，討論其中人（調查員）與機構在帝國日本脈絡下，知識生產的關聯與影響；第三是戰後留下的資料分佈、學術上的影響與後續的研究。而資料來源則主要是滿鐵史料，第一是滿鐵公司文件、調查部所生產的出版物與研究、歷史事件，如《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昭和十三

年），屬於「連續記錄文件」，⁶⁸ 從相關的歷史研究的書籍擷取之；第二是原調查部成員戰後出版的經驗性自傳，如伊藤武雄 1964 年出版的《滿鉄に生きて》，屬於「插曲文件」（episodic record）；⁶⁹ 第三是第一手資料，從蒐集到的部份期刊（北京滿鐵月報）整理並分析之（亦為連續記錄檔）；第四是以滿鐵資料從事其他研究的書籍，與歷史、區域研究學者的相關著作。

二、內、外在研究法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沒有固定的規範或形式，理解的方式會隨人類社會發展而改變。過去著重在發掘人類行為的真相，找到研究對象心中真正的動機與目的；新的社會科學方法則質疑真相，認為外在世界看似客觀存在的對象乃是歷史實踐與行為建構的產物，所以從行為表徵轉向當事人的問題意識。⁷⁰ 吾人以文獻分析法從資料中找尋歷史脈絡、社會與政治背景，建構出研究對象的問題意識。方法有兩種，其中外在研究法為其一，重視思想家與歷史情境的互動，強調在政治思想史與社會經濟史的交光互影之處解讀政治思想的內涵，內在研究法（internal approach）為其二，則重政治思想體系中，單位觀念（unit-ideas）

⁶⁸ 連續記錄文件（running record），例如每年出版一次的政府官方檔。林文程演講，2005。趙文瑾整理，〈方法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國大陸研究通訊》，第五期，頁 24。

⁶⁹ 例如日記、回憶錄與私人書信。林文程演講，趙文瑾整理，〈方法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⁷⁰ 石之瑜，2003。《社會科學方法新論》，臺北：五南出版。

之解析，分析其內在聯繫性及政治理論的周延性及有效性。⁷¹ 本書不只由此分析所選擇的四個調查部出身者，也以此討論概念化滿鐵的問題意識。雖無法以訪談法神入相關人士，但可由自傳式著作與史料中的論述，藉由文字與言論找出他們的後設與觀點，並與機構做連結。

三、歷史分析

歷史研究法是以敘述方法對某一過去事件作詳細的描述，著重於時間序列敘述，也稱作個案研究法。通常由歷史、人物、制度著手，從人事時地物的細節中找出概念之前相互的關連性，以解釋事件的本末，可說是其他研究的基礎。⁷² 滿鐵議題不出歷史研究的範疇，本書從耙梳調查部重要歷史事件與脈絡，如滿鮮史地部與白鳥庫吉、北京滿鐵月報的發刊、支那抗戰力調查與檢肅事件等歸納出以知識為核心的討論。並以政治學的方式分析之，其中重視例像的學知歷程、滿鐵經歷、中國關係乃至於運動歷程，亦以此途徑歸納並深入之。

第六節 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書第一章為序論，從滿州對日本人的特殊意義出發，認為這是滿鐵成立的文化背景之一；然後從歷史脈絡中敘述帝國

⁷¹ 黃俊傑，蔡明田，1997。〈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試論〉，《人文學報》，第十六期，頁 60。

⁷² 林文程演講，2005。趙文瑾整理，〈方法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日本的知識生產矛盾，是滿鐵知識集團的衝突源起。由於後藤新平是奠基者，而大正民主與新人會是當時知識風氣及日本人的文化與認同的重要構成因素，故作為研究背景。

第二章討論滿鐵調查部的機構與研究，選擇滿鮮史地、滿州舊慣、支那抗戰力與農村四個調查計畫，整理不同背景下調查部的任務與機構對研究的影響。由東洋史學者白鳥庫吉和後藤新平合作誕生的滿鮮史地部，可一窺學術在現實下的妥協與結合；而滿州舊慣與華北農村的調查則可和台灣舊慣調查相提並論，支那抗調則是觀察權力與知識衝突最好的借鑑。第五節擇北京滿鐵月報為滿鐵期刊的代表，統計與分類所蒐集到的月報題目，視其為當時在華日本人對中國所關心與研究的一個重要面向。

第三章從人出發，選擇大川周明、橘樸、天野原之助與伊藤武雄四人做為滿鐵調查部例像。他們各自不同的學知過程、經歷與在滿鐵中的位置，提供了我們從個別知識份子的角度來檢視介於權力與機構之間，如何利用或受制於調查部。若將層次拉高，他們也是在中國（或關注中國）活動的日本知識菁英，是戰前日本知識、文化與精神史的表徵之一。

第四章第一節是史料本身的考證，究竟滿鐵資料何去？如何分類？輔以知識集團在戰後去從與影響。第二節回顧半世紀以來日、中、台、美等地對滿鐵的研究，兼以討論此等研究所採取的詮釋與後設角度。第三節則以華北農村慣行調查為例，整理馬若孟、黃宗智、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蘭林友對此批材料的利用與詮釋，討論此知識上延續及被再利用的意義。

第四節從介紹日本戰後初期的中國研究機構出發，繼而由日本戰後中國學的延續／斷裂批判中，討論滿鐵知識生產的詮釋與意義。

— |

| —

— |

| —

第二章 滿鐵調查活動 的歷史軌跡

我認為為了使人們瞭解日本在東洋的特殊使命，並闡明東洋人在東洋活動的基礎起見，進行歷史習慣調查對於殖民政策是非常必要的…這種歷史關係的調查可以激勵研究世界殖民政策的學者，從而對於一般社會工作也能產生巨大的作用。

《後藤新平》第二卷

滿鐵調查部自成立後，隨時間推進陸續以調查部、總務部調查課、經濟調查會、大調查部及調查局的型態存在滿鐵的行政架構中。經調會與滿州國及軍方的「統制經濟」政策都有關，至於大調查部，一方面是松岡均平等人的期望，也是因為戰爭擴大而需要更龐大的調研計畫。1940年代兩次檢肅事件發生後，關東軍以此為契機將調查部本局自大連遷往新京，並改為調查局，但此時調查部已元氣大傷，以瀕臨瓦解的狀態直至終戰。⁷³ 惟滿鐵調查機關與事業非一時一人一地，不只調查事業多元，各調查支所分設各地、不相統屬，顯得很雜亂。⁷⁴ 滿鐵也承認

⁷³ 黃福慶，1995。〈九一八事變後滿鐵調查機關的組織體系（1932-1943）〉，《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二十四期上冊，頁 396。

⁷⁴ 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州殖民政策〉，頁 401。

「滿鐵的調查事業，各行其事，公司內的調機關並無一定的統治組織，使人有頭緒紛亂之感。」⁷⁵這樣的特性卻也是其自由調查氛圍的原因之一，在長達四十年的歷史中，身為奠基人後藤雖只任職了兩年，但其科學調查的精神不只被延續，滿鐵更遠遠超過國策調查的範疇，成為一個多元的研究場域。

在社會科學、歷史地理與軍需調查之外，滿鐵亦司自然科學的研究機構，如中央試驗所、地質調查所、獸疫研究所、農事試驗場、滿州資源館。本節從東亞經濟調查局與滿鮮史地部出發，探討滿鐵所進行的大型研究計畫（政治、經濟領域為主），最後則是分析滿鐵期刊（北京滿鐵月報為主）議題。以下表 2-1 為滿鐵調查部不同時期的行政架構，表 2-2 為滿鐵調查與研究項目的概略分類：

⁷⁵ 《昭和十年度滿鐵調查機關要覽》，轉引自解學詩，2003。《隔世遺思——評滿鐵調查部》，北京：人民出版社。

表 2-1 滿鐵調查部的行政組織沿革

時 間	名 稱	備 註
1907.04-1908.12	調查部	下轄三個部分：一般經濟調查、舊慣調查、圖書保管
1908.12-1932.12	調查課	下轄三個部分：轄舊慣調查班、經濟調查班、俄國調查班。
1932.01-1936.09	經濟調查會	在關東軍主導下成立，主要從事起草滿州國和對華北的經濟與調查工作。
1936.10-1938.03	產業部（併入）	配合滿州國產業開發及經濟發展
1938.04-1943.05	大調查部	1942、43 年兩次檢肅事件嚴重打擊了調查部。第二次檢肅事件後，調查本部被關東軍強行遷至新京，1944.4 再遷回大連。
1943.05-1945.08	調查局	

資料來源：解學詩，《隔世遺思－評滿鐵調查部》

表 2-2 滿鐵調查部研究分類

調查與研究項目	調查與研究成果
交通調查	滿州交通史
生產調查	滿州物產簡介、滿州大豆
資源礦產調查	國防資源調查計畫、礦產物研究論文
異民族調查	在滿朝鮮人調查
殖民地醫學	滿州醫科大學、移民衛生調查委員會
綜合調查	支那抗戰力調查、華中商工慣行調查
農村調查	冀東農村時態調查、華北農村慣行調查
軍需調查	軍用地圖、軍用資源調查

資料來源：松村高夫等編，《滿鐵の調査と研究：その「神話」と実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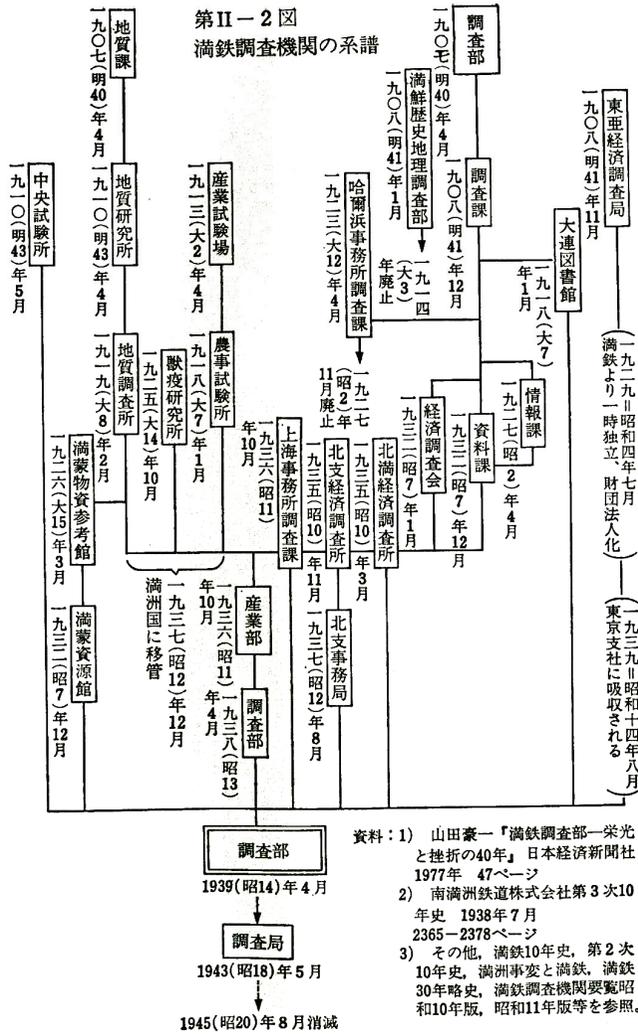


圖 2-1 滿鐵調查機關之系譜⁷⁶

⁷⁶ 引自小林英夫，《元祖シンクタンクの誕生と崩壊》，頁 34。

第一節 滿鐵調查部的發軔

第一項 滿州舊慣調查

早在日俄戰爭剛結束的 1905 年夏天，後藤因為向總參謀長兒玉源太郎作政情報告而順道視察中國東北時，就對如何利用鐵路經營滿州提出種種主張，稱「有必要設立像台灣那樣的大調查機關和中央試驗所」。⁷⁷ 確立滿鐵公司由他就任總裁起，後藤即開始找尋人才。他用人有三原則：

午前八時主義（富有朝氣的年輕人）、好高騖遠者不用、年長頑固者不用。⁷⁸

因此，除了從台灣帶來的中村是公⁷⁹ 擔任副總裁之外，所聘任的六名理事有一半均未滿四十歲。他們分別為栃木縣知事久保田政周、秋田縣知事清野長太郎、鐵道省技師國澤新兵衛、京都大學教授岡松參太郎，與三井物產職員田中清次郎、犬塚信太郎。⁸⁰ 其中岡松是後藤在台灣進行舊慣調查時倚重的法律

⁷⁷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35。

⁷⁸ 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1982。《滿鐵調查部內幕》，頁 46。

⁷⁹ 中村是公（1867-1927），時任台灣總督府財政局長，接續後藤為第二任滿鐵總裁（1908-1913）。

⁸⁰ 北岡伸一，魏建雄譯，《後藤新平傳》，頁 15。

專家，曾以六年的時間在台灣調查清廷法律與慣習，而滿鐵在清廷的領土內經營，處理錯綜複雜的法律關係是不可避免的。⁸¹即使京大與文部省反對，仍抵擋不住後藤的強力挖角，由岡松擔任第一任調查部長。

1907年4月1日，滿鐵本社從東京遷至大連並正式營運，設立總務、運輸、礦業、地方和調查五個部門。調查部底下規定一般經濟調查、舊慣調查和圖書保管三項業務。⁸²1908年12月改為調查課後，在組織上分為舊慣調查班、經濟調查班與俄國調查班三個單位，其中以舊慣調查投注最多人力、最受注目。雖然舊慣調查並非創舉，卻和台灣有相當的差異。第一，日本對台灣擁有完整的領土主權，滿州仍是中國領土；第二，是土地利權不清。根據記載，滿鐵從日本政府接收而來的租借地有14,672公頃，但次年測量的結果，卻比書面上多出3,000公頃。多出來的土地，一方面是中東鐵路，另一方面是日俄戰時、戰後日軍徵得或收買者。⁸³除了清查土地產權是經營所不得不然，而調查舊有土地的非正式制度，不同的土地利用與佔有形式如滿人封地、產權、抵押、地租等，以及相關的檔、記錄、契約及法律風俗，都是調查重點。而區域則涵蓋了瀋陽、吉林至黑龍江。

調查項目是由宮內季子、天海謙三郎、龍淵龜長共同擬定，

⁸¹ 北岡伸一，魏建雄譯，《後藤新平傳》，頁86。

⁸²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39。

⁸³ 黃福慶，1990。〈滿鐵調查部的調查事業——滿州舊慣調查報告評估〉，《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十九期，頁345。

他們首要的工作在於從舊文獻中釐清地目，採取了文獻調查和實地調查兩種方式。工作初始，調查人員從文獻中去瞭解滿州的概況，所依據的資料可分為：

1. 台灣舊慣調查報告，依其作為滿州調查的模式
2. 官方文獻，如大清會典、乾隆會典、盛京會典、政府官報
3. 日記、契據、舊帳冊等

實地調查則由調查員至農村訪問耆老，一方面在輔助及驗證文獻資料，一方面獲取文獻上所沒有的新資訊。第一次調查在 1909 年春天，目的地是關東州的普蘭店及貔子窩（即旅大租借地）。⁸⁴

調查資料被分集裝訂成契字集和採訪錄，但除了一部分被用在滿州舊慣調查之外，大部分在戰後佚失。滿州慣調取得的成果，有助於滿鐵擴張土地的《安東至大連一路權之土地慣例概要》與第一個實地調查《關東土地慣例概要》等的訂定，促進了滿鐵的土地管理與擴張⁸⁵ 及關東軍的軍事用途。⁸⁶ 其他舊慣調查班的成果自 1913 年陸續出版，至 1915 年共出版九冊，名為《滿州舊慣調查報告書》。下為各分冊內容與編輯者：

⁸⁴ 黃福慶，〈滿鐵調查部的調查事業－滿州舊慣調查報告評估〉，頁 349。

⁸⁵ 1906 為 14,672 公頃，1908 年擴增為 18,800 公頃。山田豪一，1977。《滿鐵調查部：榮光與挫折四十年》，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頁 33-36。

⁸⁶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表 2-3 滿州舊慣調查報告書分冊內容與作者

滿州舊慣調查報告書前篇		
第一冊（1914 年 10 月）	一般民地 上卷	龍淵龜長
第二冊（1914 年 10 月）	一般民地 中卷	龍淵龜長
第三冊（1915 年 11 月）	一般民地 下卷	龍淵龜長
第四冊（1913 年 12 月）	內務府官莊	天海謙三郎
第五冊（1915 年 04 月）	皇產	天海謙三郎
滿州舊慣調查報告書後篇		
第六冊（1912 年 10 月）	典權	宮內季子
第七冊（1912 年 10 月）	租權	宮內季子
第八冊（1914 年 05 月）	押權	眇田熊右衛門
第九冊（1913 年 12 月）	農地	龍淵龜長

資料來源：黃福慶，〈滿鐵調查部的調查事業——滿州舊慣調查報告評估〉

這九冊雖有 2,666 頁，仍然存在許多不完整的地方，例如用以闡明土地關係的典、押、租權調查僅限於奉天省。第二是受到許多限制，如官府不願意提供官莊承領冊、徵租簿等原始資料，而實地調查亦無法取得；其他無法取得的還有早已散佚、湮滅的早期開墾地文獻。⁸⁷ 雖然無法和台灣舊慣調查相比，但兩者目的與背景本來就不盡相同，⁸⁸ 其最受注意之處，是此次

⁸⁷ 黃福慶，〈滿鐵調查部的調查事業——滿州舊慣調查報告評估〉，頁 349。

⁸⁸ 台灣舊慣調查是基於施政上政策和制定法律，是全面且周延的，無論計畫、規模與投入人力都較宏大；滿州舊慣調查主要是維護滿鐵權利，重點在土地與財產權。

為中國第一個以科學方式進行的大規模土地調查，更和台灣舊慣調查、華北農村調查並稱為帝國日本的三大調查。⁸⁹ 根據此調查作出的成果，則有矢野仁一《清朝の滿州支配と支那人移往》、高巖《黑龍江省呼蘭平原の開発に就きて》、和田清《滿州蒙古史》與柴三九男《清末に於おける北滿州海倫拜泉地方の土地開發》等。⁹⁰

第二項 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

1908年1月，因為東洋史學創始人白鳥庫吉的緣故，滿鐵在東京支社成立了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白鳥於1905年遊歷歐洲時，即驚懾於他們對滿韓藏書研究的豐碩，返國後便極力提倡加強日本的亞洲研究，倡議成立亞洲學會。直到在澤柳政太郎的引薦之下和後藤新平認識，他才得以展開心目中對滿鮮歷史地理的大調查。⁹¹ 後藤新平強調的學俗一致，故治理是研究議程的主體；白鳥身為歷史學者，他的東洋學比較傾向於純學術的領域，兩者的哲學不盡相同，但皆認同研究是日本立足東亞最重要的基礎之一。後藤曾表示：

我認為為了使人們瞭解日本在東洋的特殊使命，並闡明

⁸⁹ 岡松參太郎、天海謙三郎與末弘嚴太郎並為台灣、滿州與華北農村三大舊慣調查之首。安藤彥太郎編，1965。《滿鐵—日本帝國主義と中國》，東京：御茶水書房，頁225。

⁹⁰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頁489。

⁹¹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p.240.

東洋人在東洋活動的基礎起見，進行歷史習慣調查對於殖民政策是非常必要的。⁹²

白鳥則聲稱：

日俄戰爭結束後，滿州已歸滿鐵經營，而且朝鮮的開發與保護亦仰賴日本，日本人既負有如此重大使命，因此本人從學術的觀點一再強調研究滿鮮問題的重要性。蓋其意義有：一、基於經營滿韓的實際需要；二、基於純粹的學術研究價值。因為現代的各種事業，應該建立在堅實的學術基礎上，自不待言，也是同樣的道理。⁹³

滿鮮調查部使他得以建立一個制度化的機構和平臺去促進和引導研究。白鳥研究的架構不只是動態的，更結合多種研究方法，且涵蓋了地理、氣候對文化和歷史的影響。因此主張歷史基礎在地理的白鳥，才會以「滿州歷史地理研究」作為主題。他曾主張「史的地理」，即歷史的分析是離不開地理的，因為在敘述每一個時帶都應將兩者統合運用。⁹⁴

他在給後藤的《滿州歷史調查報告書》中提到：「地理的研究對象，以遼代以後為主，由松井等、箭內亘、稻葉岩吉等三人擔任—松井等分擔遼金時代，箭內亘為元代及明初，稻葉岩吉為明清兩代。首先在遼河流域即盛京省方面從事研究，如果將所探索的問題一一加以解決，相信可獲得很大的收穫。至

⁹²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147。

⁹³ 轉引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州殖民政策〉，頁393。

⁹⁴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ch.6.

於唐代以前的史料編纂，由池內宏及津田左右吉擔任—池內宏分擔編纂肅慎、扶餘、沃沮…（下略）…及與研究滿州有密切關係而不可或缺的韓國史料如現存最古史籍三國史記等，並加以分析，闡明其歷史價值。津田左右吉分擔契丹、奚、室韋以及蒐集與研究滿州文化史及種族志有關的資料。」白鳥團隊使用史料考據與實地考察同時並進，以這種方法用在區域研究，是一種創舉。⁹⁵ 經過六年的研究，於 1913 年滿鐵調查部出版了白鳥、稻葉、箭內、松井執筆的《滿州歷史地理》⁹⁶ 兩卷、滿州歷史地理附圖一幅、朝鮮歷史地理兩卷。1914 年 8 月，又出版池內宏執筆的文祿慶長之役一冊。1914 年 1 月，因為副總裁伊藤大八和其他領導層認為以營利為主的滿鐵，不應長期保留這種純學術部門為由，撤銷滿鮮史地部。該部的研究連同藏書，一併移轉到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院，但和 1929 年成為獨立法人的東亞經濟調查局一樣，脫離後依然接受滿鐵的資助。1915 年由東京帝大文學部接收後，除了箭內、池內、松井、津田等四人重新受委託參加工作外，又有和田清繼續研究工作。到 1934 年，以《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為題，共刊行十三冊。⁹⁷

山田豪一對滿鮮史地調查作出評價，認為白鳥致力推動調研只是學院派的研究，價值不顯著、且只是將滿鐵的政治目的裝飾成學術研究的樣子。⁹⁸ 但 Tanaka 持不同的意見，因為白鳥

⁹⁵ 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州殖民政策〉，頁 394。

⁹⁶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35。

⁹⁷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153。

⁹⁸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p.246

和調查局有許多相似之處：⁹⁹

- 一、歷史必須是科學客觀的。
- 二、強調社會經濟條件的歷史、文化基礎。
- 三、農村社會是瞭解中國之關鍵。

不同之處在於白鳥認為需要經過考證並提出證據，而不能只依賴印象主義與簡單的態度來處理會反映在公眾意見與政策上的歷史認知（史觀），歷史證據是可以和當前事件產生連結的。但在白鳥等人的努力下，許多歷史認知如視滿韓是一個區域，而不是兩個民族或國家，都被接受了。既作為一個地理上的區域，滿韓在為日本利用的同時就不會產生觀念上的衝突，可以容納過多的日本人口或提供防禦屏障。¹⁰⁰

第三項 東亞經濟調查局

1908年9月，東亞經濟調查局¹⁰¹在滿鐵東京支社成立，在其之前滿鐵業已成立大連的調查本部與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後藤認為若要掌握世界商情，不僅不能侷限於東北，更必須以科學的方法將調查工作、資料蒐集擴大到全世界的範圍，後兩

⁹⁹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p.240

¹⁰⁰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pp.251-2.

¹⁰¹ 東亞經濟調查局德文名為 *Ostasiatisches Wirtschaftsarchiv zu Tokio*，英文名則是 *East-Asiatic Commercial Intelligence Institute at Tokyo*，之後改為 *The East Asiatic Economic Investigation Bureau*。

者僅及中國及滿蒙的調查範圍是不夠的。¹⁰² 成立時的組織架構方面，主要學習法、德等歐洲著名銀行、企業的調查局和記錄局，特別是里昂信託銀行調查局。¹⁰³ 雖然是由滿鐵創社理事之一的岡松主持，實際上先後由三位德國顧問主導該局業務（1908年創局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¹⁰⁴ 分別是但澤高等工業學校教授休士（K. Chies）、德國內務省參事官維德菲爾與曼海姆高等商業學校教授貝倫德。¹⁰⁵ 之所以倚賴外國顧問，除了借重他們的專業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對外宣傳、消除列強對日本經營滿州的猜忌，¹⁰⁶ 向國際宣傳滿鐵經營的據點。¹⁰⁷

1914年以絕密形式限於公司內部傳閱的《東亞經濟調查局發展當議》，則反映第二任局長松岡均平說過的「消除列強對日本經營滿州的猜忌」之目的：¹⁰⁸

¹⁰² 1902年，還是台灣民政長官的後藤訪問巴黎里昂信託銀行（Credit Lyonnais），時，發現該行附設調查局對於日本的公債、經濟、企業等各方面瞭如指掌，感到吃驚與佩服，並對設置經濟調查局的構想更趨成熟。後藤前去滿州後，延攬岡松參太郎為理事及主管調查機關事宜，並於1907年7月送他到歐洲考察，藉以吸取科學的調查方法及物色輔佐人才。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州殖民政策，頁396。

¹⁰³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156。

¹⁰⁴ 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州殖民政策〉，頁401。

¹⁰⁵ 維德菲爾在東亞經濟調查局任職期間為1911.3-1913.8，貝倫德則是1913.8-1915.2。解學詩，《隔世遺思》，頁156。

¹⁰⁶ 第二任局長松岡均平：「日本經營滿州，難免會引起其他國家的猜忌，如果被外國認為日本在搞利己主義的勾當，對滿州經營將產生障礙，為消除這個障礙，與其由日本人出面解釋，不如由外國人來表明，效果來得大。」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州殖民政策〉，頁398。

¹⁰⁷ 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頁62。

¹⁰⁸ 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州殖民政策〉，頁401。

1. 研究西洋文明國家的殖民地政策及經濟社會的各種問題。
2. 向世界各國介紹日本的殖民政策，特別是以介紹滿州政策的真相為目的。

若外國人對我國政策有所誤解，就要負責解釋；提出質問則要給予答覆，藉以加強相互瞭解。各國一旦聽到這個機構之後，必將歡迎並利用之。

而 1921 年的《東亞經濟局概況》，列出該局三個目標：¹⁰⁹

1. 多參加世界性的經濟活動，因為新興的日本及滿蒙將來的發展，視參加世界性的經濟活動的多寡而決定，如果忽略世界經濟情勢，則對日本及滿蒙的經濟發展將產生不良影響。
2. 蒐集整理各國的經濟資料，尤其應以東亞各國的經濟資料為基礎，建立日本及滿蒙的經濟立足點。至於整理的資料及調查成果盡量開放給一般社會人士利用。
3. 建立學術研究的基礎，培養層次較高的調查研究人才。

因此，東亞經濟調查局蒐集了世界各地的大量圖書、雜誌與新聞，特別是堪稱為世界之冠的東亞地區的資料。除了用於滿蒙經營，亦公開發表其成果，由其作成的報告即達百篇以上，以小冊子或叢書發行者更不計其數。¹¹⁰ 其所發行的《經濟資料》（1916 年起以月刊發行）、《東亞》（1928 年發行），與滿鐵調查部發行的《滿鐵統計年報》（1909 年創刊）和《調查資料》（1918 年起以月刊發行），都倍受當時日本各大學、研究機構

¹⁰⁹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頁 431。

¹¹⁰ 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州殖民政策〉，頁 398。

矚目，且多列為必購之書。¹¹¹ 在德籍顧問建議下建立的精密、科學的資料處理、整理方法，更是該局聞名的原因之一。滿鐵社史云：「本局的設置是以德、法等國聞名的銀行公司所設的調查局或記錄局為榜樣的。它與國內外官署、經濟機關、企業家互通訊息，取得各種報告、資料，涉獵東西方報紙、雜誌、書籍蒐集後並分類之」。¹¹² 原覺天將東亞經濟調查局的調研資料分成五種，即根據內外資料做分析的一般調查、特定課題的調查研究、調查員個人的研究、翻譯與字典與典籍的編纂。¹¹³

第二，則是所吸納的豐富人才及自由的研究風氣，草柳稱之以「知識份子的梁山泊」。¹¹⁴ 在東京帝大法科教授松岡均平擔任局長的十年間（1911-1921），調查局吸納了許多人才，如永雄策郎、市川代治、石井成一、石川鐵雄、岡上守道、藤澤親雄、佐倉重夫、佐野學、波多野鼎、伊地支重厚、嘉治隆一、皆川豐治、貴島克己、綾川武治、弘田勝太郎、伊藤武雄，¹¹⁵ 其中許多出身於東大新人會的菁英。¹¹⁶ 亦是東大畢業的大川周明在 1919 年以囑託被滿鐵聘任，並於 1929 年滿鐵成為獨立法人時擔任理事長，他主導了近二十年（1921-1938）的經濟局研究。松岡均平時代強調從世界的角度來把握東亞及日本的問題；

¹¹¹ 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州殖民政策〉，頁 401；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35。

¹¹² 轉引自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159。

¹¹³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

¹¹⁴ 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頁 69。

¹¹⁵ 伊藤只在東亞經濟調查局待了三個月，就被調至滿鐵本社調查部。

¹¹⁶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

大川周明就任理事後，基於個人興趣轉向了東南、西南亞區域、回教圈與佛教的研究，他的風格也壓縮了原本自由主義者的活動。¹¹⁷ 大調查部成立之後，東亞調查局成為大調查部中針對西南亞、澳大利亞、南洋的調查專屬的分局，成果以《新亞細亞》月刊發行。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戰局嚴峻，雖然有更多外部機關的委託研究，卻因為南洋的戰事使調查活動窒礙難行。

第二節 從經濟調查會到大調查部

第一項 經濟調查會

滿鐵在名義上是鐵路公司，實際上是國策會社，故從自成立以來即和關東軍、關東都督府有所牽連，受到干預與影響。駐東北的最高權力機關的關東都督府，為滿鐵的監督機關，又都督府最高長官由軍方出任，使得滿鐵調查任務必須要配合都督府意向。隨著關東軍在東北的勢力逐漸強大，對滿鐵的干預也隨之上升，這傾向在 1927 年後日益強烈。¹¹⁸ 另一方面，既然滿鐵接受來自軍部的委託調查，軍部也給予調查上的方便。¹¹⁹

¹¹⁷ 2010 年 7 月 4 日，條目：東亜經濟調查局，維基百科（日文）<http://ja.wikipedia.org/wiki/>。

¹¹⁸ 黃福慶，〈九一八事變後滿鐵調查機關的組織體系（1932-1943）〉，頁 369-70。

¹¹⁹ 山田豪一在滿鐵調查部榮光與挫折四十年中指出「關東軍和滿鐵當時是魚水的關係，調查課調查課對於石原的要求，也熱心的回應」。

1927年7月，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命佐久間亮三研究有關滿蒙統治等問題，並要求調查課予以協助；¹²⁰ 山本條太郎與松岡洋右分就任總裁與副總裁後，鑒於經濟情勢的推移與實現國策。主張「實務化與合理化」的經營政策，並認為調查活動不應僅作為桌上調查及蒐集一般的社會參考資料，最好是提供對滿鐵業務直接而有效的調查機關。因此，在原有調查課下，於該年11月成立直屬總裁的臨時經濟調查委員會（1929年8月，山本下臺時裁撤）。¹²¹ 1930年3月，石原莞爾在調查課的講備忘錄中，已具體表示一旦佔有東北地區，調查機關需全面參與。¹²²

1931年九月爆發九一八事變後，因為新的政治與軍事情勢變化，為從事策劃及執行任務，軍方需要更多的資料與調查，進而要求滿鐵調查課在各方面參與佔領地的之政治、經濟計畫。¹²³ 1932年1月設立調查課奉天出張所，2月在軍方的要求下，滿鐵董事會通過成立經濟調查會（同時將奉天出張所裁撤）。經調會可歸納為以下幾個特點：

1. 超越原本滿鐵公司底下的業務部門，成為日本對滿州（國）經濟建設、日滿經濟統制政策與滿蒙各項調查、建設方案的擬訂和研究。¹²⁴

¹²⁰ 黃福慶，〈九一八事變後滿鐵調查機關的組織體系（1932-1943）〉，頁369。

¹²¹ 下設交通港灣工場、實業、資源、民勢四部，目的在「提供滿鐵有效的資料」，並謀求「調查與經營方針之決定兩者結合」，陳豐祥，1984。〈滿鐵經調會成立及其影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2期，頁232。

¹²² 黃福慶，九一八事變後滿鐵調查機關的組織體系（1932-1943），頁371。

¹²³ 陳豐祥，〈滿鐵經調會成立及其影響〉，頁231。

¹²⁴ 當時少壯派軍人和右派主張國防國家、日滿一體經濟統制、對軍需工業的

2. 人才與機構由滿鐵提供，實際上在軍方的指導下從事調查立案等活動，¹²⁵ 其為關東軍「經濟參謀本部」的意義更明確。¹²⁶
3. 由於從屬於軍方的權力，從調查課題至方法無不配合軍方意向。¹²⁷

在 1936 年 10 月經調會解散、另成立產業部前的四年又八個月期間（1932.01-1936.10），因企劃「滿州國」經濟建設的藍圖，動員 900 多位人員，完成立案 829 件、調查資料 1,053 件，區域包含滿州、華北與蘇俄遠東區，內容則可分類為立案調查關係書類、資源調查關係書類、經調資料、刊物四類。¹²⁸ 重要者有橘樸、大上末廣、天野元之助、三輪武。另有對日後滿鐵調查活動影響甚大的《滿州產業開發永年計畫》，及《滿州評論》、《滿州經濟年報》等期刊。

第二項 大調查部與其組織

1937 年支那事變生發生後，隨著中日間戰事的擴大，做為國策會社的滿鐵有所調整，滿鐵檔案記載「社業的調整純化和

需求與所謂的國家改造論，滿鐵機構成為他們在滿實現其計劃與理想的最佳工具。

¹²⁵ 原本調查課的人才、資源都移轉到經調會，成唯一形式上的單位，於 1932 年 12 月裁撤。伊藤武雄是最後一任課長。

¹²⁶ 陳豐祥，〈滿鐵經調會成立及其影響〉，頁 235。

¹²⁷ 黃福慶，〈九一八事變後滿鐵調查機關的組織體系（1932-1943）〉，頁 374。

¹²⁸ 黃福慶，〈九一八事變後滿鐵調查機關的組織體系（1932-1943）〉，頁 379。

以支那事變為契機的社業急速伸張」，¹²⁹ 解學詩據以評論指出，「滿鐵也大舉入侵華北以至華中，其規模是日本其他機構無法項背的。」伊藤武雄則發現，滿州國成立後，軍方就開始將目光移轉到華北，滿鐵在日軍對華北的侵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經調會委員長十河信二成立的「興中公司」，藉著對華北鐵礦、煤、鹽與棉花原物料產業的控制，將華北納入「日滿經濟圈」。¹³⁰

1938年4月，產業部所屬的地質試驗所、農事試驗場等機構向滿州國移交，滿鐵宣佈其撤銷產業部並設立調查部，承襲了產業部的調查業務，改組為庶務、資料兩課和調查役，轄八百餘人。¹³¹ 調查部成立的同時，滿鐵決議「調查部營運方針」與「昭和十三年度業務大綱」兩份檔案，據前者所制定的後者內容可分為以下三方面：

1. 時局下滿鐵經營方策的基礎性綜合調查研究，及重要問題的對策研討。
2. 為完成本社的開拓鐵道使命，並做為推行大陸政策所需的日本大陸機關一翼，進行東亞（當前是滿、華及北亞）的社會、經濟、文化、交通及其他基礎性綜合調查研究。
3. 與國家機關合作及其他方面的調查研究。

¹²⁹ 轉引自解學詩，《隔世遺思》，頁363。

¹³⁰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oth Manchurian Railway*, p.160.

¹³¹ 華北事務局和上海事務所也因戰事的有所擴張，華北事務局負擔「有關華北經濟、交通調查和研究事項」，調查活動則大部份是「佔領政策的制定的必要調查」；上海方面機構沒有改變，但由伊藤武雄擔任局長。

業務大綱更具體提出「滿州五年計畫修改諸問題」、「日滿華集團經濟調整諸問題」、「中華民族文化經濟法制及外國權益」、「亞洲北部經濟及其他」等四方面的基礎調查。顯而易見的是，滿鐵不只機構上因應調整、觸角向華北與華中延伸，調查部的調查任務也隨之改變。

滿鐵調查部關於未來經營方策的調查報告已經提出設置大調查機關和從事綜合調查的思路與主張，而這種思路和主張又都是以預計侵華戰爭擴大為背景的。時任總裁的松岡洋右¹³²曾提出大東亞共榮圈建設論，他心中的調查部涉獵範圍不侷限於滿州，而是涵蓋整個大東亞。1939年滿鐵調查部擴大，¹³³社內所有調查機關均歸調查部直轄或管理。¹³⁴這個時期滿鐵調查部定員有2,489人，實有1,731人；1940年定員2,433人，同年4月1日實有2,345人，為滿鐵的頂峰。而為因應人員的轉出、調動，調查部擴大增員的數量相當多。許多在日本因左翼運動被鎮壓的知識份子，多在此時期被引薦到滿鐵調查部。¹³⁵

¹³² 其滿鐵總裁任期為1935年8月2日至1939年3月24日。

¹³³ 滿鐵調查部擴大案是在1938年11月通過，1939年4月1日第十五次職制改組而實行。

¹³⁴ 滿鐵調查部之直轄機關包括：大連本社各課、調查室、大連圖書館、滿州資源館、北滿經濟調查所（哈爾濱）、華北經濟調查所（北京）、張家口經濟所、中央試驗所；調查業務由調查部統一管理的機關：東京、新京（長春）兩支社調查室、上海事務所調查課、原鐵道總局調查室。除此之外，1929年分離獨立的東京經濟調查局也回歸滿鐵，由調查部管理。

¹³⁵ 所謂的中間採用者。如具島兼三郎、石堂清倫、尾崎秀實、野野村一雄等人均在此時進入滿鐵。

第三項 綜合調查

大調查部時期，最重要的調研任務就是「綜合調查」。1939年4月，甫擴大的滿鐵調查部提出了五個綜合調查的重點：

1. 日滿華物資動員
2. 以通貨膨脹問題為中心的日滿華貨幣金融
3. 東亞再建的政策體系建立
4. 東亞新體制的基礎規範
5. 東亞新交通體系的形成和滿鐵企業營運、整備與擴充

而綜合調查，即指在調查部的組織推動下，由各現地調查機關按統一的計畫、方法，分工、協力進行的整體調查計畫。各現地機關也從事自行決定的區域一般調查、接受當地有關單位的委託，但綜合調查被置於中心地位。滿鐵內部檔《滿鐵調查機關的立場與任務》透露：「隨著戰爭的擴大會社將廣泛的全東亞政治經濟社會全面綜合性調查作為當務之急」。¹³⁶戰後出版的《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中說明了「綜合調查就是對一定的調查課題，從日滿華政治角度和經濟角度等進行多方面的科學分析和科學綜合」。¹³⁷

1940年1月，在大連調查部召開了「業務擔當會議」，討論因應當時形勢之調查課題，並得出結論：「日本經濟體制因

¹³⁶ 《滿鐵調查機關的立場與任務》，轉引自解學詩，《隔世遺思》，頁418。

¹³⁷ 《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前言，頁4。轉引自解學詩，《隔世遺思》，頁418。

戰事的拉長及內外情勢的激烈變化，產生很大的危機，若不迅速制定根本對策，遑論理想中的東亞新秩序建設，就是推行現在規模的戰爭都是困難的。」日本本土、滿州、中國等地都逐漸面臨因戰爭產生的經濟問題，包括生產下降、流通混亂、物價上漲及人民生活惡化。因此滿鐵在 3 月召開的調查部首腦會議上，將《日滿華通貨膨脹對策》列為 1940 年度的統一調查課題。滿鐵並動用各方力量去克服時間急迫、計劃龐大且分散各地的支所（現地調查機構）不易組織等問題。1941 年，調查部將戰時經濟調查、中國抗戰力調查、世界形勢調查、社業調查列為綜合調查課題。隨著各方面整備與協調，大規模調查所面臨的問題逐漸解決，也建立了運作機制。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滿鐵便開會決定「調查部營運基本方針，重點仍置於綜合性調查研究，但努力以更具體的實踐性成果適應國家的時局要求。」也就是調查地域，從滿州、華北擴大到整個東亞。¹³⁸ 調查轉向了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和初始時後藤新平以滿州舊慣調查來奠定滿州治理基礎的想法如出一轍。但今非昔比，軍部為了戰爭需求對滿鐵調查部干涉漸深，影響到原本自由的風氣。從參與「支那抗戰力調查」的調查員面對觸及政策的調查時，在自我學術認知與當局立場殊異時所產生的矛盾，看出滿鐵知識生產性質的多元性。

¹³⁸ 戰時經濟調查要綱：…查明在東亞共榮圈以確立日本重工業為中心的經濟建設基本要點…東亞共榮圈內各地區經濟社會的結構特性及其決定之各地區經濟建設協同者及對抗勢力研討…。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428。

第三節 支那抗戰力調查

第一項 支那抗戰力調查

「支那抗戰力調查」是最早進行、影響最大並受到最多關注的綜合調查。¹³⁹ 不只加深了調查部與軍方在戰事擴大後益深的嫌隙，更成為了釀成檢肅事件的導火線。1939年6月，重慶抗戰力調查委員會成立，由調查部副部長宮本通治擔任委員長，調查部綜課長與第一至第三調查室主查，華北經調所負責調查役，上海事務所主事及負責調查役擔當委員。¹⁴⁰ 因為地理位置的優勢，委員會中心在1940年由大連移轉至上海事務所，並由伊藤武雄擔任委員長。¹⁴¹ 本身即是上海支所長的伊藤指出：「當調查部擴大，也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綜合調查…上海（支所）在支那抗戰力調查、日滿支通貨膨脹調查、世界情勢分析三個綜合調查擔綱重任…」這些調查的目的是「綜合性地分析重慶國

¹³⁹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792。

¹⁴⁰ 戰爭陷入膠著後，華北經濟調查所與上海事務所、東京支社調查室，都各自展開對中國戰時政治、經濟情況做分析，例如中西功等人對重慶戰時體制考察的籌畫。針對這種情況，滿鐵調查部綜合課職員島兼三郎提出：「與其各自分散地進行同一性質的調查，莫不如就此制定一個重慶抗戰力調查的綜合計劃。」他的提議受到伊藤武雄的大力贊同，計劃也很快被滿鐵批准。蘇崇民，1990。《滿鐵史》，北京：中華書局，頁792-793。

¹⁴¹ 滿鐵調查部，1970。《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東京：三一書房，頁97。

民黨政權和共產黨的政治經濟力量，與其對日本的抵抗能力。」

¹⁴² 解學詩認為支那抗戰力調查的成功有兩點，其一是對中國社會本質的深刻認識，其二是左翼調查員發生了作用，¹⁴³ 而中西功則是支抗調中最突出、活躍的人物。¹⁴⁴ 從 1939 年 7 月 1 日出版的《調查部報》第一號中，我們看到調查目標分為中國抗戰能力¹⁴⁵ 與在華外國勢力的研究。¹⁴⁶

經過約兩年的時間（1939 年 6 月至 1941 年中），抽調 30 多名調查員從事情蒐、調查與分析的專門業務，¹⁴⁷ 1940 年出版了五篇十冊的《中國抗戰力調查委員會昭和十四年度總括資料》，¹⁴⁸ 也是滿鐵綜合調查中唯一印刷成冊的成果匯編，分冊內容如下：¹⁴⁹

¹⁴² Itō Takeo, Joshua A.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175.

¹⁴³ 當時上海事務所有 300 名職員，特別是左翼人士，很多都是因為伊藤武雄新人會時期的人際網路而進入滿鐵。Itō Takeo, Joshua A.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174.

¹⁴⁴ 伊藤武雄也認為中西功在支那抗戰力調查中扮演吃重的角色。Itō Takeo, Joshua A.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175.

¹⁴⁵ (1)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及其動向(2)蔣政權的政治軍事諸政策(3)抗日的中國戰時經濟重組(4)蔣政權的戰時財政金融政策。

¹⁴⁶ (1)各國在中國的經濟勢力(2)各國在華利益(3)各國遠東政策。

¹⁴⁷ 蘇崇民，《滿鐵史》，頁 793。

¹⁴⁸ 1939 年 10 月、1940 年 3 月召開過兩次報告會，1940 年 5 月在大連舉行前一年度成果的彙整和整理，同時出版《中國抗戰力調查委員會昭和十四年度總括資料》。1970 年三一書房以全一冊《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出版。

¹⁴⁹ 滿鐵調查部，《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

表 2-4 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分冊內容與作者

冊 別	篇 名	內 容	編 輯 者
第一分冊	總篇	支那抗戰力調查的方法論及總結論	中西功
第二分冊	政治篇	戰時支那內政	中西功
第三分冊	政治篇	八路軍及新四軍	津金常知、小倉音次郎
第四分冊	戰時經濟政策篇	交通	言城俊次
第五分冊	戰時經濟政策篇	商業・貿易	熊谷康、岸川忠嘉
第六分冊	戰時經濟政策篇	通貨・金融	加藤清
第七分冊	戰時經濟政策篇	財政	林田和夫・中西功
第八分冊	奧地經濟篇	農業	石川正義
第九分冊	奧地經濟篇	工礦業	片山康貳
第十分冊	外援篇	列國對支援助	具島兼三郎

資料來源：《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

《總篇》分為《支那抗戰力調查方法の諸問題》、《支那抗戰力調查總括報告書》與《世界情勢の新階段と支那事變》三部，第一部中探討調查方法論、形成抗戰力的各種要素與階段性的改變。總篇第一部、第一章《支那抗戰力形成の基本問題》開宗明義寫道：

現代國家在其戰時體制中，作為現代國家的因果律發生作用。半殖民地國家因為有其獨特的因果律，不認清這一因果律，在半殖民地國家與現代國家進行對抗時，就無法考慮其戰爭能力的性質問題，不能深入認識問題。可以說，它是抗戰力調查中一切研究的大前提條件。¹⁵⁰

¹⁵⁰ 滿鐵調查部，《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頁 10。

因此，必需從中國社會結構的特質出發，從「這場戰爭對中國社會所具有的性質」與「進入戰爭過程的中國社會性質」兩個方向切入。¹⁵¹ 前者所謂的戰爭對中國的性質分三點：

1. 全國民族的抗戰
2. 戰爭造成中國政治經濟的重組，重組的方向是政治經濟的近代化
3. 戰爭發展階段之外，還有佔領區複雜的政治經濟戰

《總篇》最後的結論是，戰爭將使中國政治經濟狀態重組，而中國既有的四個社會性質作為因素之消長，將決定最終結果。¹⁵²

第二分冊《戰時支那內政》亦是中西功執筆，他分析了戰爭使中國社會根基更加複雜，並將國共產黨視為社會及群眾的力量，而中國抗戰力的據點在農村，農村、農民與土地的問題勢必影響到中國政治未來的走向與國家統一的發展。¹⁵³

第三分冊《八路軍及新四軍》主要就中國方面的資料分析八路軍與新四軍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與地域性。報告書總結認為，北支形勢的發展不只是整個日中戰爭的縮影，「北支游擊區的意義，已經由對日作戰，逐漸轉向對內革命的意義。」¹⁵⁴ 第四至第九分冊就交通、貿易、金融、通貨、財政各方面討論中國的戰時經濟政策與奧（內）地經濟，主要是重慶國民政

¹⁵¹ 滿鐵調查部，《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

¹⁵² (1)作為半封建、半殖民國家的弱點(2)百年來中國民族取得的發展(3)豐富資源與農村經濟的存在(4)國外條件。

¹⁵³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438。

¹⁵⁴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438。

府管轄區。中西功在報告書總結（總篇第二部）中將政治力與經濟力連繫起來，從戰爭的發展中，考察了這兩種力量的結合的消長與變化。¹⁵⁵

尾崎、伊藤與原都對政治篇給予高度評價，尾崎認為中西功執筆的第二分冊是報告書水準最高的一部分，第三分冊是「對中共領導下的軍隊採取什麼方針和有什麼動向的最早說明。」¹⁵⁶ 原覺天說：「政治篇的兩項調查，也受到資料方面的制約，因為採用了毛澤東為首的許多中國領導人的論文，絕不能說是經過實地驗證的東西。然而，從經過長期日中戰爭中國最後所得到的結果來看，從毛澤東指導的遊擊戰略來看，不能否認，是相當有效的。」小林英夫與草柳則認為，報告內容有許多地方和毛澤東「論持久戰」有類似的結論。從事後的觀點來看，《支那抗戰力調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中國政經的實態，但是卻無法和只求勝利的軍方對話，甚至反過來吞噬滿鐵調查部。

第二項 支那抗戰力調查的矛盾與政治後果

《支那抗戰力調查》受到軍方很大的關注，除了調查報告廣泛的流傳，調查部也在東京、奉天、新京、上海等地舉辦報告會，匯總成果更以活版印刷刊行並以文書保存下來，根據野野村一雄所指出，綜合調查中只有支那抗戰力調查受到這麼大

¹⁵⁵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438。

¹⁵⁶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438。

的重視。¹⁵⁷ 報告精確地捕捉了重慶與延安的政治經濟實態，中西功是其中的靈魂人物。他肯定地認為對日統一戰線的成功及中國對日抗戰力的強韌，並認為「如果日軍深入中國內地，補給線會變長且困難，保護其會成為巨大的困難，最終將無法使重慶伏降。」¹⁵⁸ 而這是面臨戰爭僵局的軍方最感興趣、也最想要解決的問題，¹⁵⁹ 其本身就是戰爭發展重要時刻，在決策者得以判斷形勢的需要下推行的。但是，不只是沒有產生關鍵性作用、快速解決戰爭，¹⁶⁰ 這份純粹就中國抗戰力客觀研究的報告，還和一心求勝的軍部有認知的差距，導致矛盾並最終釀成衝突。草柳大藏《滿鐵調查部內幕》中的一段敘述具體而微顯示了這樣的問題：

軍部的反應如何呢？具島有這樣一段珍藏故事。他（具島）和中西一起訪問了陸軍參謀部，竭力主張「政治收場」，談得舌敝唇焦。在演講結束後開始質疑時，一個青年參謀打破短暫的沉默舉手質問：「總之，轟炸什麼地方好呢？希望能指出要害地區。」¹⁶¹

當時進行研究的調查部，不只很多左翼人士參與其中，使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與中共方面的資料時，都沒有受到任何干涉，頗不同於日本本土日益緊縮的言論尺度。例如身為中共

¹⁵⁷ 野間清等，1986。《十五年戰爭與滿鐵調查部》，東京：勁草書房，頁 60。

¹⁵⁸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792。

¹⁵⁹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442。

¹⁶⁰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442。

¹⁶¹ 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頁 13。

地下黨員的中西功¹⁶² 就運用其特殊關係將許多不易取得的資料給調查團隊。¹⁶³ 石川正義：「…研究團隊在上海的抗日書店蒐集中國共產黨理論家，如毛澤東、朱德的演講文集，輪流閱讀並翻譯…其成果印製並散發給所內各系主任及調查員，做為以馬克思主義分析對中共方面抗戰政策的基礎資料。」¹⁶⁴ 第二，在大調查部時期，像支那抗戰力調查、日滿支通貨膨脹等，滿鐵調查部人員只要注意「調查的政治性」便可，而不像滿州國官僚與關東軍諜報人員，必須從事「服從於政治的調查」。¹⁶⁵

然而，滿鐵內部的左派人士認為戰事發展對日本是不樂觀的，具島兼三郎憂心英美的加入；中西功及其他人則關注以中共為主體的社會革命、農村階級力量。¹⁶⁶

具島獄中手記寫道：

我為了避免對英美的戰爭進行了很多啟蒙活動，也對法西斯主義抱持批判的態度，並感到很憂心（指軍方對中國及戰爭的認識和現實有差異），雖然支那抗戰力調查非常重要、也受到很大的讚賞，但軍方只當成參考情報，沒有實際瞭解、注意到報告中所揭示的問題。¹⁶⁷

¹⁶² 中西功為中國共產黨上海情報科戰略情報員。

¹⁶³ 「…中西功不但通過中國同志可得到諸如解放、文獻、時事叢刊、求知文叢、上海週報等中方刊物資料，而且經常與中國同志討論有關問題，包括中共地下工作者…。」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432。

¹⁶⁴ 小林英夫（2006），滿鐵調查部的軌跡，東京：藤原書店。

¹⁶⁵ 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頁 521。

¹⁶⁶ 小林英夫，《滿鐵調查部的軌跡》。

¹⁶⁷ 小林英夫，《滿鐵調查部的軌跡》，頁 281。

中西的回憶則堅持說：

我們巨大而詳盡的研究決不是為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目標。1937年7月日本入侵和戰爭之前，華北日本軍當局就要求滿鐵調查機關作一個是否可能在華中、華南戰局嚴峻的條件下治理華北五省的報告。而滿鐵的答案是不可能。¹⁶⁸

他們抱怨軍方雖然熱切地接受了研究報告，卻沒有認真瞭解及認知其中所揭示的問題，因此才会有上述草柳書中描述的年輕參謀不能理解中西和具島所謂「政治解決」，這反映了軍方與調查部無法對話而產生的謬誤。而當戰爭情勢轉向失敗的徵兆越來越明顯後，軍方繼而要求甚至強迫調查局的知識份子提供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Fogel 指出「但當報告的結果指出日本戰敗，他們就成了不受歡迎甚至被討厭的人物。雖然軍方知悉戰敗的可能，他們仍要繼續戰鬥下去，而且為了掩蓋這個複雜性他們濫用了最高權力（當局），並清算了滿鐵調查部。」¹⁶⁹

因此，當報告從初始珍貴的敵情資料轉成為敗戰思想的證據，研究員就成為了鎮壓的對象。無論是單單作為研究法或者活躍於推進共產主義運動，雖然一度是「左翼花園」的場域，滿鐵開始和日本本土走上一樣的道路，遭到當局無情的震壓。

¹⁶⁸ Itō Takeo, Joshua A.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Introduction.

¹⁶⁹ Itō Takeo, Joshua A.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Introduction.

表 2-5 被檢肅人員與支那抗戰力調查擔當表¹⁷⁰

姓名	滿鐵職位	支那抗戰力調查委員會與報告分冊擔當	被檢肅事件	時間
尾崎秀實	東京支社囑託	北支分科會委員	佐爾格事件	1941/10
中西功	上海事務所	中支分科會幹事；第一、二、七分冊	中共謀報團事件	1942/06
津金常知	上海事務所	第三分冊		
石川正義	上海事務所	第八分冊	第一次檢肅事件	1942/09
具島兼三郎	大連本社	調查會幹事、滿州分科會幹事；第十分冊		
加藤清	上海事務所	第六分冊		
伊藤武雄	上海事務所	調查會委員、中支分科會主查	第二次檢肅事件	1943/06
石田精一	北支經濟調查所	調查會幹事、北支分科會幹事		
三輪武	上海事務所	調查會幹事、中支分科會幹事		
田中九一	調查部第一調查室	調查會委員		

資料來源：《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

1941年10月發生了佐爾格事件，間接導致1942年6月的中共諜報團事件，中西功、尾崎庄太郎與津金常知等人被逮捕，這

¹⁷⁰ 本處參考「支那抗戰力調查委員會、昭和十四年度調查經過」中的委員會組織，其委員會分為委員長、委員、幹事、滿州分科會、北支分科會、中支分科會六部分。滿鐵調查部，《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頁93。

是對滿鐵調查部震壓的開始。¹⁷¹ 昭和十九年出版、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編的《在滿日系共產主義運動》¹⁷² 鉅細靡遺地研究滿鐵中被歸類為「左翼人士」的派系、關係與背景，並從他們寫的文章、期刊與報告中找出他們「左傾」的證據。雖然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中的核心人物，同時也是滿鐵調查部中的知識菁英包括尾崎、伊藤、中西、具島以及石川，¹⁷³ 都先後被檢肅。以下是他們在支那抗戰力調查中的擔當與被檢肅的事件詳表 2-5。

Fogel 指出，美軍在越南時也希望打一場「有限戰爭」，Westmoreland 將軍扮演了中西功的角色。他提供越共抵抗力報告被忽視，戰事也持續進行。這個情況和滿鐵如出一轍。¹⁷⁴

第四節 中國農村慣行調查

第一項 1920-30 年代中國的農村調查與研究

二十世紀的 20-30 年代，革命家與學者都開始意識到農村

¹⁷¹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Introduction.

¹⁷² 1969 年由東京極東研究所出版復刻本。

¹⁷³ 具島兼三郎、中西功與尾崎秀實被滿鐵調查員稱為支那抗戰力調查的三大支柱。十五年戰爭與滿鐵調查部，頁 63。轉引自解學詩，《隔世遺思－評滿鐵調查部》，頁 433。

¹⁷⁴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Introduction.

與城市的差異，將注意力放集中到糧食短缺、土地分配不均和農民困境上面，¹⁷⁵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以「經驗知識的狂熱已蔚為主流」來形容知識界對農村關注與研究的高潮。¹⁷⁶ 1920 年代，創立中國第一個農業經濟系的金陵大學教授卜凱（John Lossing Buck），利用學生放假返鄉所收集的資料與自身的田野，寫成一系列經驗研究；¹⁷⁷ 毛澤東與共產黨人為了瞭解農村真實情況以便有效地將階級矛盾化為革命力量，透過湖南省湘潭、湘鄉、衡山、醴陵與長沙五縣的調查，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¹⁷⁸ 德國農經學者威廉·瓦格納（Wilhelm Wagner）以個人田野調查和多年的第一手觀察及閱讀為基礎寫成《中國農書》（Die chinesische Landwirtschaft）。¹⁷⁹ 1930 年代，中研院社科所副所長陳翰笙¹⁸⁰ 除了擔任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理事主席、創立中國農村月刊（1933 年），更與北平社會調查所、中山文化教育館、嶺南大學等機構合作，在數年內進行了無錫、保定、廣東與山東濰縣等三個菸草區（安徽鳳陽、河

¹⁷⁵ 馬若孟著，史建雲等譯，1999。《中國農民經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頁 13。

¹⁷⁶ 史景遷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頁 559。

¹⁷⁷ 馬若孟著，史建雲等譯，《中國農民經濟》，頁 13。

¹⁷⁸ 史景遷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頁 488。2010 年 7 月 4 日，毛澤東 —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http://marxists.anu.edu.au>。

¹⁷⁹ Ramon H. Myers, 1970.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 22.

¹⁸⁰ 陳翰笙（1897-2004），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在中研院社會所、國立北京大學任職，積極參與社會運動與推行農村調研。1949 年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當選過數屆人大及政協委員。

南襄城)的農經、農村調研；¹⁸¹ 由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贊助的南開大學經濟所，在方顯廷¹⁸²的帶領下，對天津市及河北各城市與鄉村工業、經濟情況做了田野調查。¹⁸³ 費孝通由在江蘇省吳江縣開弦弓村訪查的資料完成的倫敦政經學院學位論文，後以《江村經濟》為名出版，不只使他躋身人類學界大家，也引起世界對中國農村的認識與興趣。1933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為瞭解決農村的困窘與若干問題，在行政院下設立了農村復興委員會，在桂、滇、陝、蘇、浙等地進行了調查並出版。¹⁸⁴ 1935年，方顯廷在《中國土地問題文獻評述》中指出，「革命前有關中國農業的大批文獻中，很多沒能在戰爭中保存下來，或是丟失或是被毀」，但另一方面，他發現「於南開大學經濟所蒐集到1920-1935年間出版的涉及土地問題的102篇專論、251篇期刊論文是以土地研究做為主題，其中90%的專著與87%的雜誌分別在1927、1933年後出現。」¹⁸⁵ 馬若孟提出兩個原因來解釋對農村研究的方興未艾，一是中國正處於往現代社會的過渡階段；二是1931年底的經濟蕭條衝擊了中國經濟部門最脆弱的農業和手工業，使城市居民意識到城鄉更大的互相依賴，以及城市不過是落後農村汪洋中的孤島。¹⁸⁶

¹⁸¹ 2010年7月4日，條目—陳翰笙，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¹⁸² 方顯廷(1903-1985)，耶魯大學經濟博士，返國後受聘於南開大學，為經濟研究所主任兼經濟系教授，並展開一系列農村與城市的經濟調查與研究。

¹⁸³ 史景遷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頁559。

¹⁸⁴ 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1999。《江蘇省農村調查(民國二十二年)》，臺北市：文海出版。

¹⁸⁵ 馬若孟著，史建雲等譯，《中國農民經濟》，頁13。

¹⁸⁶ 馬若孟著，史建雲等譯，《中國農民經濟》。

第二項 華北農村慣行調查

滿鐵甫成立時，調查課為釐清附屬地地權而針對關東州與奉天等區域進行的滿州舊慣調查，雖然被批評「文獻至上主義」，¹⁸⁷ 仍因其為日本在中國（不含台灣）做的第一個具規模、系統的實地調查而重要。調查課時期，農、林、牧的資源與產業調查更多於農村調查，農業經濟的分佈與統計資料是新的重點，代表者有《滿蒙全書》第四卷。經調會成立前後，亦即上述中國農村調查方興未艾時期，因為對滿州經濟問題的爭論與實際上需要，滿鐵策劃並展開了更多農村調查。¹⁸⁸

1933年，滿鐵公主嶺農事試驗場推行了「大泉眼村調查」，經調會第一部第四班主任天野原之助，囑託鈴木辰雄與第五部諸稅班水谷國一也予以協助，公主嶺經調會以此出版了《滿州一農村的社會經濟的研究—大泉眼部落調查》（1934，滿州文化協會）。翌年對吉林省永吉縣進行了農村概況調查，成果有鈴木辰雄撰寫的報告書《滿州農業和部落構成一生產諸關係》、水谷國一《滿州一農村的金融》與野間清《滿州一農村的農民租稅負擔》。¹⁸⁹ 1936年3月，在農林省塩見友之助的推動下，由滿州國臨時產業調查局¹⁹⁰ 與經調會在奉天（五縣）、熱河（兩

¹⁸⁷ 黃福慶，〈滿鐵調查部的調查事業—滿州舊慣調查報告評估〉，頁349。

¹⁸⁸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245。

¹⁸⁹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246。

¹⁹⁰ 滿州國實業部臨時產業調查局，1934年成立，人員400名，主要進行資源、商工業和農村實態調查，調查業務主要由椎名悅三郎、消見友之助與關東

縣)與黑龍江三省(一縣)展開大規模的農村實態調查,其成為滿州國財政和農業政策制定的基礎。¹⁹¹ 1936年4月,由於天津事務所駐在幹事伊藤武雄所寫的冀東農村調查計畫經軍方同意,於是在天津事務所、經調會、臨時產業調查局與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合作下,展開第一次冀東農村時態調查。伊藤為調查班班長,方法則是文獻蒐集與口述記錄的田野調查。該年夏天完成四部份的冀東農村時態調查報告書。1937年冬天,又針對十三縣其中的平谷、寶坻、豐潤、昌黎四縣農村深入調查。¹⁹² 同年,北支經濟調查所第四班對冀東地區做了記帳式調查(農家經濟調查);1939至40年,則是對河北、山東交界處的部分農村概況做比較研究,即華北農村概況調查。¹⁹³

1939年,大調查部成立。而因局勢發展,滿鐵、東亞研究所、陸軍省與興亞院等機構,開始制訂並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政治研究計畫,除由各機構共同組織,也與日本本土的大學合作。10月,東亞研究所第六調查委員會組成,要綱中規定調查「以有助於帝國對華政策的推行為目的,進行華北華中的法律及經濟的諸慣行調查」,¹⁹⁴ 並由滿鐵調查部、北支經濟調查所組織團隊現地調查。¹⁹⁵ 京大為此在經濟學部設立「支那經濟慣行調

軍參謀岩畔豪雄等人推進,很多調查員都來自滿鐵。解學詩,前引書,頁246。

¹⁹¹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248。

¹⁹²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285。

¹⁹³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493。

¹⁹⁴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482。

¹⁹⁵ 中國慣行調查主要由:(1)華北農村慣行調查(2)華中商工慣行調查(3)城市不動產慣行調查三者組成。解學詩指出,對東亞研究所來說,滿鐵只是中國

查部」，下轄第一（農地制度）、第二（商事、金融）與第三部（礦工業）；東大教授山田三良、我妻榮、末弘嚴太郎與囑託杉之原舜一等人則是參與計畫的主要學者。¹⁹⁶ 中國慣行調查由華北農村慣行調查、華中商工慣行調查與城市不動產慣行調查三者組成，其中以農村調查影響最大、也在之後受到學術界最多的關注。¹⁹⁷ 計畫確立，滿鐵北支經調所第三班¹⁹⁸ 開始就地方誌、京漢等鐵路沿線（還有京古線、正太線）農村概況調查、綏遠土地關係等資料進行整理。1940年，杉之原舜一等六人加入團隊，¹⁹⁹ 從6月到10月，由杉之原擔任總指導者，對調查方法進行全面的檢討，並將重點放在調查項目（調查表）的製作，²⁰⁰ 內容主要有村落、土地所有、土地買賣、租佃制、水利、地契、稅收、借貸、貿易、宗族等十項。²⁰¹ 同年11、12月慣行班對河北省順義縣沙井村、欒城縣寺北柴村與山東省歷城縣冷水溝莊進行了第一次實地調查。直到1942年為止，針對七個村莊分次實施調查（共七回），獲得了114篇《質問應答錄》的第一手口述資料。1943年後因為戰局使調查變得困難，1944年全面終止。

慣行調查中提供現地資料的配角地位，但滿鐵視其為自身綜合調查中關於中國慣行的部份。

¹⁹⁶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483；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頁139。

¹⁹⁷ 以上提到學者主要是參與農村慣行調查。

¹⁹⁸ 在加入新的成員與籌備工作完成後，於1941年改稱慣行班。

¹⁹⁹ 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1952。《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第一卷》，東京：岩波書店。

²⁰⁰ 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第一卷》，頁17。

²⁰¹ 黃宗智，1994。《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末弘嚴太郎在《滿州北中支農村視察狀況》（1940）中指出華北慣調的調查方針是：

本調查以對中國社會進行法的慣行調查為目的。而且可以說是同樣的法的慣行調查，如曾在台灣進行的舊慣調查，很明白不是為了得到立法乃至行政的參考資料。既然如此，那麼本調查的終極目的，就是闡明中國民眾是在怎樣的慣行下運營其社會生活，換言之即揭示中國社會實行的慣行，用以勾畫出其社會生活的本質。這必須成為我們調查的目的。²⁰²

杉之原進一步提到「整理成問答體的形式，得到了內地方面的好評，因為他沒有陷入從最初起就按既有法律概念進行分析並做相應記述的那樣綜合處理之中，而是對事物乃至對社會實態原貌的忠實描繪，因而成為極其恰當的方法，受到高度評價。」（滿鐵調查部報第 17 號，通卷）²⁰³

東亞研究所支那慣行調查室主任山田三良在東研出版的《支那農村慣行調查報告書》第三輯（華北租佃的法律關係）（1944）前言中指出：

該巨大的報告書實際不止對我國的中國研究，從全世界的社會調查來看，也是足以成為模範的前人所未涉足的獨創性調查資料…使我們得以在角度和資料方面不同於過去歐美人對中國所進行的調查而著手研究，必須說實

²⁰² 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第一卷》，頁 22。

²⁰³ 滿鐵調查部報第 17 號，通卷，頁 97。轉引自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504。

乃滿鐵華北經濟調查所慣行班的獻身努力之所賜。²⁰⁴

由上可知，戰後被視為滿鐵農村調查代表作的華北農村慣行調查，日本學者在當時已給予很高的評價。不過同時也有負面的看法，例如在軍方支援的情況下，如何能相信其訪問不受權力甚至武力威脅的影響？野間清即提出質疑：

所有訊問和回答，都是在縣公署或村公所等地對勤勞農民來說是威嚴象徵的衙門中進行的。在那裡，大約可以想像，在爐邊屈膝相對述說著生產之苦的氛圍是不存在的。

解學詩認為，在已是日本佔領區的農村將村民召至公署「訊問」，是無法使其卸下心防而侃侃而談的。此外，現地調查主要根據日本人行政顧問意見選定調查的縣份與村莊；入村前，都要舉行招待縣知事、顧問、日本守備隊隊長、村長等等，給村民帶給了很大的負擔。²⁰⁵ 戰後，岩波書店從 1952 年陸續以這批資料出版了分為六卷的《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將在第四章繼續討論其後續成為相關研究的重要素材與引發的學術爭議。

²⁰⁴ 轉引自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505。

²⁰⁵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502。

表 2-6 華北農村慣行調查項目擔當者

調 查 項 目	擔 當 者	調 查 項 目	擔 當 者
土地所有權	杉浦貫一	公租公課	佐野利一、小沼正
土地買賣	早川保	金融取引	安藤鎮正
小作	山本斌	家族同族	內田智雄、早川保
水	杉浦貫一	村 落	旗田魏
地籍および土地公證	塩見金五郎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第一卷》

表 2-7 華北農村慣行調查時間與地點

次	時 間	地 點
第一回	1940.11-12	河北省順義縣沙井村、欒城縣寺北柴村； 山東省歷城縣冷水溝莊
第二回	1941.02-03	沙井村
第三回	1941.05-06	寺北柴村、冷水溝莊
第四回	1941.10-12	同第三回
第五回	1942.02-03	山東省歷城縣路家莊；寺北柴村、沙井村
第六回	1942.05-06	河北省昌黎縣侯家營、良鄉吳店村； 山東省恩縣後夏寨
第七回	1942.10-11	侯家營、吳店村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第一卷》

第五節 滿鐵期刊

除了上述大規模綜合調查、報告之外，滿鐵調查部亦發行《滿鐵調查月報》、《北京滿鐵月報》、《滿州評論》、²⁰⁶《滿州經濟年報》²⁰⁷等期刊。大連調查本部 1919 年 12 月開始發行的《滿鐵調查月報》前身是《滿蒙情事》與《調查時報》，1931 年 9 月改題，²⁰⁸發行到 1944 年的第 24 卷²⁰⁹為止。1924 年 5 月北京公所發行的《北京滿鐵月報》²¹⁰是伊藤武雄於其擔任駐在員時倡議創設，他成為主編直到 1926 年因出國考察而交棒給宮本通治。²¹¹1929 年，為了連接中國政治中心隨蔣介石政府的遷移，滿鐵機關也南移。於是北京公所研究機關轉移到上海事務所，並易名為《滿鐵支那月誌》直到 1933 年 3 月休刊。²¹²1937 年再以《上海滿鐵季刊》復刊。

²⁰⁶ 1931 年 8 月發行，至 1945 年 4 月停刊共發行 675 期。

²⁰⁷ 1933 年由經調會出版，1936 年因經調會撤銷停刊，1937-39 年由產業部、調查部接辦，之後改為《滿州經濟研究年報》，同註 186。

²⁰⁸ 解學詩，2004。〈日本戰時對中國的認識－滿鐵的若干對華調查與觀點〉，《近代史研究》，第四期。

²⁰⁹ 調查時報第一卷（1-6 號）是 1919-1920 年，第二卷是（1-10 號）是 1922 年，1923 年及之後每年一卷，當年出的期刊再以「號」分之。

²¹⁰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頁 22。

²¹¹ 伊藤出國後，宮本接替成為主編直到 1929 年其改為《滿鐵支那月誌》。

²¹²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Introduction.

伊藤此時回支後先被派駐南京，再到上海事務所，而宮本通治則成為上海事務所調查主任。休刊時間查閱自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145。

第一項 滿鐵調查月報

滿鐵發行期刊的形式與內容是什麼呢？以《滿鐵調查月報》昭和六年（1931）九月十五日發行的第十一卷第九號為例，²¹³分為調查及研究、資料、時事雜錄、重要日誌、法令及規則。²¹⁴ 調查研究中有《滿州に於ける耐火煉瓦工業と其の需給狀況》、《間島地方に於ける鮮農經濟情事》、《獨逸油房工業と滿州大豆の將來》、《滿鐵社債利迴り計算就て》四篇，是為滿州的經濟分析；第二部分則有《葫蘆島築港の概要》、《北滿に於ける輕油の需給狀況》、《哈爾濱に於ける毛織洋服地の取引事情》等數篇經濟資料、概況、或統計等；時事雜錄則有《中部支那の洪水》、《支那の反日運動と日本の對支輿論硬化》、《滿州經濟概觀》，類似現代的新聞週刊、社論或政治經濟評論；法令《國際貿易局章程》、《廣東全省菸草局章程》、《日滿經濟統計數據》、《四方機械特殊工作時間暫行支配辦法》等，是經濟法規及統計。而本期刊行後三天，關東軍即發動了滿州事變（九一八），之後幾期時事雜錄皆有相關文章，如《滿州事件と南京政府》、²¹⁵《國民黨に對する滿州

²¹³ 滿鐵調查部編，《滿鐵調查月報第1卷（1985年復刻版）》，十一卷九期～十一卷十二期，首爾特別市：高麗書林。筆者於國家圖書館六樓日韓文區查閱，其購自東京不二出版株式會社，全套共22卷，收錄1931-1937年的11-16卷。

²¹⁴ 重要日誌、法令及規則兩個有時只有其一，有時兩者皆有。

²¹⁵ 1931/10/15 刊行的第十一卷第十號。

事變の意義》、²¹⁶《學良政權の行衛》、²¹⁷《事變後に於ける經濟復興の現況》。²¹⁸ 但相對來說，關於時事的評析或深入研究較少，生硬的資料與法規佔較大比重。伊藤認為其大多數都是以滿州事務為主的區域研究，加上自己在北京兩年也累積了一些經驗與成果，於是倡議成立一個有更多深入研究議題的新刊物。²¹⁹

滿蒙事情改題 滿鐵調查月報

第十卷第九號

(號十二百第卷通)

昭和六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目 次	
調查及研究	滿洲に於ける時次鐵工工業と其の發達狀況……………一
三	間島地方に於ける鮮蒙經濟事情……………三
五	獨逸油房工業と滿洲大豆の將來……………五
六	滿鐵社債廻り計算に就て……………六
七	朝鮮島築港の概要……………七
八	東北四省鐵道通商產物築港と對し北奉路局員の論評……………八
九	北滿に於ける輕油の供給狀況……………九
一〇	北滿に於けるセメントの供給狀況に就て……………一〇
一一	北滿に於ける木材取引事情……………一一
一二	哈爾濱に於ける毛織服地の取引事情……………一二
一三	時事雜錄……………一三
一四	時 評……………一四
一五	中朝關係の洪水と支那の反滿筋と日本の對蒙關係に關する論議……………一五
一六	經濟問題……………一六
一七	大連口岸の發達と對外關係……………一七
一八	滿鐵調查部編輯の現況……………一八
一九	日油價の現況……………一九
二〇	◆重要日誌……………二〇
二一	法 令……………二一
二二	會社登記規則、國際貿易局章程、廣見倉庫章程……………二二
二三	章程、四方機務特許工作時間暫行實施辦法……………二三
二四	滿鐵調查部統計部、日滿統計部……………二四
二五	滿鐵調查部統計部、日滿統計部……………二五
二六	滿鐵調查部統計部、日滿統計部……………二六

滿鐵調查課

圖 2-2 滿鐵調查月報第十一卷第九號刊頭

²¹⁶ 1931/11/15 刊行的第十一卷第十一號。

²¹⁷ 滿鐵調查部編，《滿鐵調查月報第 1 卷》。

²¹⁸ 滿鐵調查部編，《滿鐵調查月報第 1 卷》。

²¹⁹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80.

第二項 北京滿鐵月報

1924年，伊藤等人假北京公所開辦了《北京滿鐵月報》，這個新的刊物將論文表列在開卷處，附加了政治經濟的實事解說與中外文新出的圖書資料介紹。除此之外，當重要事件發生時，還會籌備特輯。²²⁰ 新人會出身伊藤本身研究志趣在帝國主義侵略、勞工問題與抗爭、學運等，而從月報議題即可輕易窺知，這些不只是伊藤等人所關注，也都是當時中國政治中心的北京、北洋政府所面對的問題。筆者就台灣大學特藏的《北京滿鐵月報》進行整理，²²¹ 其範圍集中在1925-1926兩年（該月報發行時間為1924-1929），並可分為通刊及特輯兩部分。通刊部份都是調查研究、月報與資料任兩者，議題可分為鐵道、經濟、政治與軍事，相較於《滿鐵調查月報》的零散、瑣碎與資料性質，其更為集中並針對議題深入探討。以下例舉通刊議題與分類：

²²⁰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80.

²²¹ 筆者找到的三本散的期刊（兩冊滿鐵支那月誌、一冊北京滿鐵月報），兩冊北京滿鐵月報合訂本，北京滿鐵月報特刊、滿鐵調查月報、滿鐵支那月誌合訂本各一冊。除滿鐵調查月報合訂本鋼印為臺北帝國大學，餘四本都是國立臺灣大學時期所裝訂，但內容確實均為戰前贈送給台北帝大理農學部農業經濟教室之藏書。

表 2-8 滿鐵調查月報議題整理

刊 號	該期刊類別	議 題	分 類	時間
第二年第七號	月報	勞動問題視察記	勞工	1925
	資料	支那古代政治思想史	新書介紹	
第三年第一號	月報	日本滿州出兵反對輿論	政治	1926
第三年第三號	調查研究	平滂鐵道線路測量報告大意	鐵道	1926
第五年第一號		北京に於ける下層社會の金融機構と各種の社會設施	經濟	1928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農業經濟學教室於 1930 年 12 月受贈圖書。（帝大戳蓋印於期刊首頁）

在第二年第七號第二部資料介紹，介紹了著名支那學者中江丑吉於北京鑽研數年後於大正十五年所出版的《支那古代政治思想史》。²²²

而特輯部份則依據彼時支那發生的時事、研究主題或現勢作單一而深入的討論，例如上海 1925 年發生工運的五卅慘案，該年 9 月即發行第二年第四、五號合刊之特輯——一九二五年上海事件特輯（一），從上海事件に就て、上海及各地狀況一般、輿論及宣言、經濟上の影響に就て四部份作綜合性的探討。以下表列所蒐尋到的北京滿鐵月報特刊及其主題：²²³

²²² 北京順天時報社印刷，大正十四年八月五日發行。

²²³ 北京滿鐵月報第二年第四、五號雖形式為通刊，但內容為特輯，故在此歸類於特刊。

表 2-9 北京滿鐵月報特刊議題整理

特刊名稱	出刊時間	特刊主題	分類
北京滿鐵月報 第二年 第四、五號	1925/9/30	一九二五年上海事件特輯（一）	政治經濟
北京滿鐵月報特刊第一	1926/2/28	聯露か排露か	國際關係
北京滿鐵月報特刊第二	1926/3/10	支那鐵道概論（三）	經濟
北京滿鐵月報特刊第三	1926/3/20	民國十四年反奉戰亂誌「附」奉郭 戰事と日本	政治軍事
北京滿鐵月報特刊第五	1926/6/20	勃興せる支那の國家主義思想	國內政治
北京滿鐵月報特刊第六	1926/7/15	支那鐵道經濟	經濟
北京滿鐵月報特刊第七	1926/8/25	英支西藏問題交渉略史「附」西藏 各喇嘛教主事記	國際關係
北京滿鐵月報特刊第十二號	1926/10/25	一九〇〇～一九二四間に於ける北 京的物價勞銀及生活費	經濟

資料來源：同表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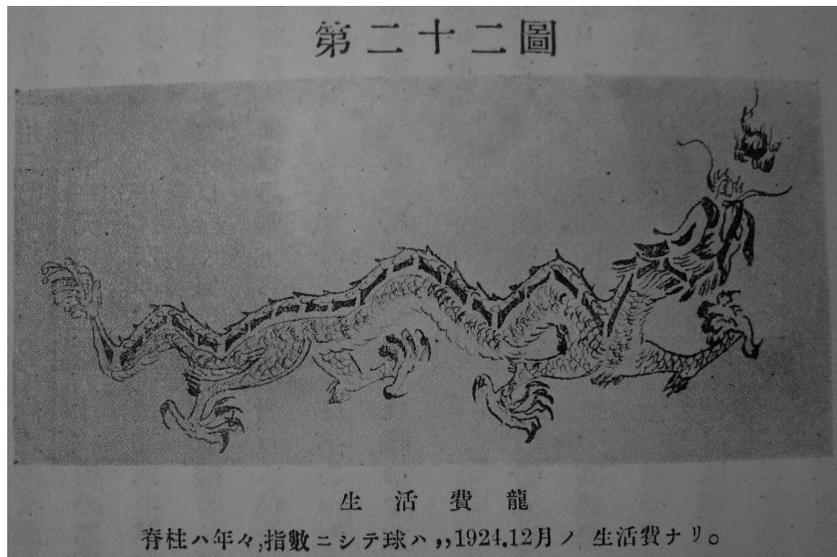


圖 2-3 生活費龍

第一號特刊《聯露か排露か》（聯俄？排俄？）收錄並翻譯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於中國對到底該和共產俄國保持何種關係的爭論。緣起是 1925 年北大教授陳啟修在晨報週刊上投稿了「帝國主義に赤白の別あるか」，遭到張若奚痛斥而引發一連串知識界藉由在報章雜誌、期刊發表文章的討論和相互批評。除陳啟修、張奚若，不乏陳翰笙、陶孟和、梁啟超等人文章。再如第五號特刊《勃興せる支那の國家主義思想》（興起的國家主義思想）介紹當時中國各地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社團的組織、宣言與活動，例如國立北京大學「國魂社」、²²⁴ 國立政法大學「孤軍社」、²²⁵ 上海「醒獅社」、²²⁶ 浙江「愛國青年社」²²⁷ 等等。其中國魂社被評價為「北支國家主義團體的中堅」、「支那全國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有力的一份子」。該刊具體而微呈現了五四後中國學運與國家意識興起的盛況。第十二號特刊《一九〇〇～一九二四間に於ける北京の物價勞銀及生活費》（1900-1924 年北京勞銀物價與生活費之研究），探討屬於總體經濟範疇的物價水平。作者畫了一條龍，龍尾為 1900 年基期物價，龍脊的曲折代表了期間北京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的波動，龍珠則是 1924 年的物價，並將之命名為「生活費龍」（該特刊圖二十二）。文末指出作為政治中心北京這二十年因「形形色色的政治事件」導致農業生產、交通受影響，物價、銀價亦隨

²²⁴ 成立於民國十四年六月，發行雜誌《國魂旬刊》。

²²⁵ 成立於民國十四年一月，發行雜誌《孤軍週報》。

²²⁶ 成立於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發行雜誌《醒獅週報》。

²²⁷ 成立於民國十四年五月，發行雜誌《愛國青年旬刊》。

之波動，表十六則列出 33 件政治事件。²²⁸ 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

第三項 滿鐵支那月誌與上海滿鐵季刊復刊

1928 年蔣介石北伐成功、東北易幟，中國形式上成為統一的國家，中國政治中心也從北京南移至南京國民政府。故滿鐵北京公所研究機關轉依此形勢移到上海事務所，原本的《北京滿鐵月報》也改名為《滿鐵支那月誌》。1929 年 11 月 15 日，發行了通刊第三十號的第一本滿鐵支那月誌，伊藤下了「支那研究を科學的綜合へ」（趨向科學研究的支那研究）的標題，一方面作為改刊的象徵，一方面也發表他自歐美考察回來的心得。伊藤探究了歐洲支那研究的一般觀點，主張日本支那研究必沒有超越歐洲的研究方法和途徑。他認為現在（指 1929 年）除了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沒有新的科學方法可真正闡明問題，「從那時開始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的分析出現在中國人自己的研究中。在日本也是一樣的，受到 Liudvig I. Mad'iar 和 Wittfogel 著作很大的影響。」²²⁹ 此外，易名刊行的月誌有一個新特色就是創立了日中共同研究的方向，得到了陳翰笙與熊得山等人的支持。²³⁰

²²⁸ 如義和團、光緒帝駕崩、滿清覆滅、張勳復辟、安直戰爭開始…等等。

²²⁹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109.

²³⁰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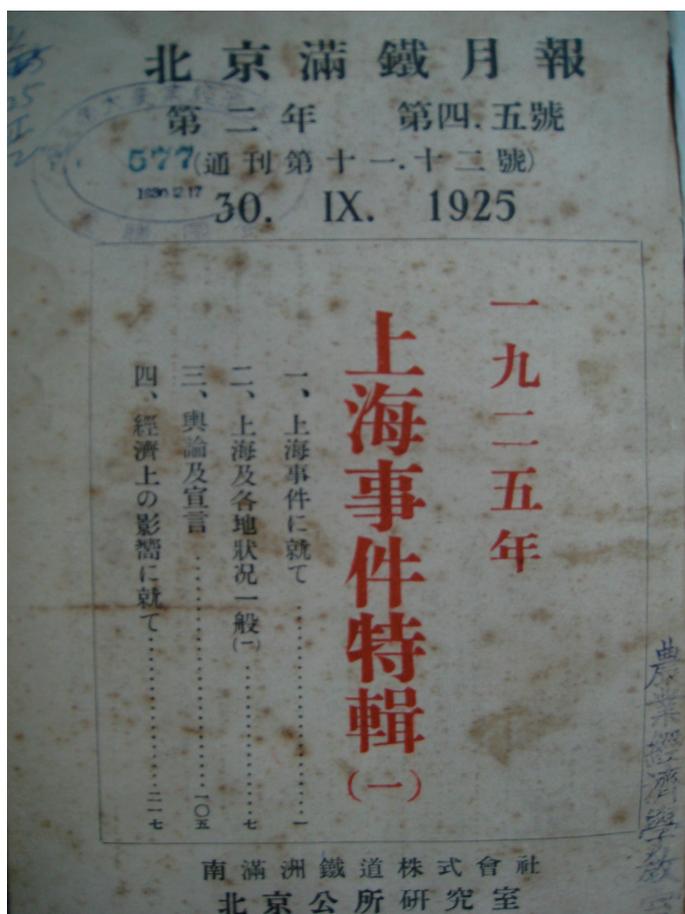


圖 2-4 北京滿鐵月報特刊

筆者就所蒐集到 1929-1931 年發行的 16 期《滿鐵支那月誌》(通刊第 30~43 號、46 號、第八年第四號)的標題進行整理：²³¹

²³¹ 同一議題的續篇不計算在內。

表 2-10 滿鐵支那月誌議題分配比例

分類	比例 (69 篇)	主要議題	例題
經濟	40.5% (28)	政府財政與事業、農村經濟及土地、上海經濟	銀の暴落と上海市場の影響に就て、支那の農村經濟に関する一つの觀察、國民政府の農金廣事業と財政問題
政治	27.5% (19)	勞工及農民運動、國民政府及其對外關係	最近に於ける支那の赤色勞動組合運動に就て、訓政時期の國民黨と國民政府
社會	11.5% (8)	中國社會的封建	中國社會の封建性
政治經濟 政治社會	7.2% (5)		國民政府の工商關係問題、支那農村社會の封建的性質に就て
其他	13.0% (9)		上海に在る支那研究機關

資料來源：同表 2-8

由表可知最多的研究是關於中國政治與經濟的現勢分析，為國際所承認的南京國民政府為最重要議題，從財政、事業、國際關係與經濟政策皆有之。第二是勞工及農民運動，和關於階層（封建）及農村經濟的研究，從經濟與社會結構來分析社會所受到的壓迫與運動，或以馬克思的方法論來研究相關問題。在橘樸的指導下，由大塚令三編輯的《中國共產黨文獻考》成為滿鐵最初關於中共的研究。²³² 1929 年，滿鐵囑託鈴江言一利用所內資料完成了《支那無產階級運動史》、《從無產階級對

²³² 其整合太平洋研究所 (I.P.R) 的研究並補齊不足。發行在 1930 年出版的通刊第 35、36 號。

立研究支那革命》，²³³ 顯示當時他們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產生相當大的興趣。第三，是較純粹的經濟議題，例如熊得山《支那の土地制度》、宮本通治《支那の農村經濟に関する一つの觀察》、大塚令三《上海の小銀に関する一考察》、赤塚武雄《銀の暴落と上海市場の影響に就て》等等。發表文章的有伊藤武雄、宮本通治、裏見甫、大塚令三、橘樸等，中國人則有陶希聖、熊得山、陳翰笙、朱伯康等。此外，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後在月誌上發表了《支那共產黨批判》。²³⁴ 這不只是和中國知識界的合作，也是和他們在學術研究上的密切交往。²³⁵

1937年4月，上海事務所承襲《北京滿鐵月報》與《滿鐵支那月誌》的基礎，發行了《上海滿鐵季刊》。安盛松之助於刊首發表了「支那研究と我們的態度」做為重新復刊的宣言（請見附錄七）。²³⁶ 他指出，「東亞最主要的國家就是日本與支那，兩國有唇齒相依的關係。做為東亞問題的中樞、他們的融合調整和東亞的興隆有關，從這樣的意義來看，兩國的互相理解就非常重要。」而由於支那很多地方（指調查研究上）都是未開發的處女域，特別是最近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有顯著的變

²³³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111.

²³⁴ 陳獨秀在1927年被奪取領導權，1929年11月被開除黨籍。他的《支那共產黨批判》刊行在1930年3月出版的通刊第34號。

²³⁵ 伊藤武雄最初是靠著鈴江言一和北京大學教授的關係，取得了地下雜誌《嚮導》，證實了中共的存在與活動。因為是秘密發行，伊藤是以郵寄的方式取得。

²³⁶ 安盛松之助，1896年生，1921年神戶高等商業學校畢業後入滿鐵，1935年任上海事務所調查係主任。井村哲郎、天野弘之，2008。《滿鐵調查部と中國農村調査—天野原之助中國研究回顧》，東京：不二出版，頁312。

革，因此「對以支那為對象的研究提供了無限的可能。」雖然支那地大物博，但不管研究主體、焦點如何轉移，都必須從社會經濟的本質來探究。為了達到這樣的研究目標，安盛提出了兩個研究規範：

1. 把握新興支那實體才可以看清楚未來的發展。
2. 在支那外國勢力動向的認識。

在強調使用客觀科學的研究方法、探究真正因果關係之外，外國勢力是支那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個重點，畢竟當時國民政府並未驅逐清末所遺留下來的列強不平等條約與特權。文末又指出，因為季刊不是營利或宣傳機關，「即使我們的支那研究受到很多制約，仍必須要用客觀科學的研究方法來彰顯出我們對於這個研究的態度。」並感謝日支各界一直以來對季刊的支持與聲援，「期望中外識者諸賢一同來為支那研究而努力。」

第三章 滿鐵調查部例像

滿鐵調查部的特徵之一是充滿自由的空氣，也可以說滿鐵公司也有這個特點。但這種自由的空氣與其說是領導容許的，毋寧說是職員們自己形成並繼承下來的。其理由可能是企業的性質或者說是所處的歷史背景所決定的。

草柳大藏，《滿鐵調查部內幕》²³⁷

滿鐵及調查部的宏大規模使其雇用了為數眾多的職員，1910年代有從業員兩萬人以上，1920年代有三萬人。²³⁸ 雖然日人佔絕大多數，滿鐵中仍有為數不少的中、韓、俄人。其員工分為參事、職員、雇員、傭員四級，對於一些有特殊技能、或特別任務的職員，則採用囑託制，不受滿鐵一貫實行的社員制度所規範。²³⁹ 囑託是滿鐵為了遂行特殊任務所設置，刺殺張作霖與九一八發動者之一的河本大作參謀、滿映理事長甘粕正彥、²⁴⁰ 記者觀察家橘僕、因佐爾格事件被處死的尾崎秀實等人，都曾是滿鐵囑託。解學詩認為：「滿鐵調查課人事結構的這種相容

²³⁷ 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頁116。

²³⁸ 小林英夫，《滿鐵一知的集團の誕生と死》，東京：吉川弘文館，頁78。

²³⁹ 按社員制，日本人傭員以上都可取得社員資格，中國人雇員以上才是社員。非社員一般都是下層工人，囑託也非社員，但非工人範疇。解學詩，《亂世遺恩》，頁43。

²⁴⁰ 甘粕正彥（1891-1945），浪人、陸軍大尉，刺殺了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後，入獄服刑。後至滿州擔任關東軍特務、滿映理事長等職。

並包的狀態，從一個側面反應了滿鐵調查活動的複雜性」²⁴¹ 第一章已介紹過作為背景的大正民主思潮與社會運動，本章選取大川周明、橘樸、天野原之助與伊藤武雄四人做為探討滿鐵調查部之自由「空氣」與各種不同思想人物之例像。

第一節 調查部空氣與來源

第一項 1920 年代的轉折

滿鐵本社由東京轉移到大連之後，於 1907 年 4 月設置總務、運輸、礦業、地方和調查五個部，由後藤新平從京都帝大挖角過來的岡松參太郎主管擔任理事並主管調查業務。直到 1914 年，岡松成為滿鐵調查事業的奠基人。²⁴² 調查部第一任領導，為參與過台灣舊慣調查川村鉦次郎。調查部初期雖有許多部門的專家，卻沒有發揮所長；而許多東亞同文書院畢業生從事著受軍部委託、缺少方法論的地誌調查。²⁴³ 川村沒有整合調查部的資源去籌謀具方向性的調查計畫，使調查部陷入一個停滯狀態。直到 1919-1920 年左右，才因為第四任領導石川鐵雄與任用來源改變而有了轉機。²⁴⁴

²⁴¹ 解學詩，《隔世遺恩》，頁 44。

²⁴² 解學詩，《隔世遺恩》。

²⁴³ 由《生活在滿鐵》、《滿鐵調查部內幕》整理之。

²⁴⁴ 石堂清倫、野野村一雄與原覺天都將此時視為滿鐵調查部的轉機。原覺天從職能、制度將調查課時期分為前、後期。解學詩，《隔世遺恩》，頁 43。

畢業於東京帝大法學部的石川鐵雄，與鶴見祐輔、²⁴⁵ 前田多門等人被視為新渡戶稻造²⁴⁶ 十個最傑出門徒之一。²⁴⁷ 1919年7月，石川從東亞經濟調查局被派至大連主導調查課。他引進東亞經濟調查局所開拓的科學方法，制訂年度計畫，並以調查的總體性與劃一性為目標，從新組織了調查工作。此外，他加強了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如推行了資料室、製作雜誌資料卡片和目錄索引、報紙剪輯等工作。²⁴⁸ 石川種種努力的體現，以滿蒙全書為代表。第二，是同年東京帝大教授松本烝治至滿鐵擔任理事。他大量引進東大與京大的畢業生，如伊藤武雄、嘉治隆一、石浜知行、波多野鼎、田中九一等人，打破了以往東亞同文書院獨大的格局。²⁴⁹ 伊藤武雄指出，他們是在東大學長佐野學與岡上守造的牽線下進入東亞經濟調查局。²⁵⁰ 這些大學時期參與新人會、社會運動的成員給滿鐵調查部帶來了自由的氣息。

第三，則是囑託的大量雇用。²⁵¹ 滿鐵吸取了不同類型的菁

²⁴⁵ 鶴見祐輔（1885-1973），畢業於東京帝大法學部，日本官僚、政治家、作家，後藤新平女婿。

²⁴⁶ 新渡戶稻造（1862-1933），國際政治活動者、農學家、教育家，曾任國際聯盟副事務長、一高校長、東大教授、拓殖大學學監等職。

²⁴⁷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48.

²⁴⁸ 解學詩，《隔世遺恩》，頁45。

²⁴⁹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43.

²⁵⁰ 伊藤武雄、嘉治隆一、石浜知行、波多野鼎四人於1920年4月從東京帝大畢業後一同進入滿鐵（田中九一則於1921年進入），但只有伊藤和田中待到最後；兩人也同在檢肅事件中被逮捕。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39.

²⁵¹ 由「明治四十年至昭和六年度《滿鐵統計年報》，從事員項」可看出，調查部僱用的囑託人員從1919年開始逐年遞增。參考解學詩，《隔世遺恩》，

英以因應各種各樣的任務，而這些人以非正職的囑託身份在滿鐵兼職。²⁵² 具相當彈性的用人制度與囑託社員不但避免官僚化與人事造成的僵化，也使其得以在長期雇員之外，為擴張的責任提供人力資本的補充。²⁵³ 草柳大藏認為「滿鐵錄用特約人員之盛，簡直可以寫出一部特約人員史」。²⁵⁴ 滿鐵聘用之囑託來源，在關東軍方面有河本大作、甘粕正彥；學者則有日本考古學先驅者入木奘三郎、研究中國思想的中江丑吉、²⁵⁵ 關心勞動議題的鈴江言一、替滿鐵圖書館收集整理漢文古籍的松崎鶴雄；²⁵⁶ 新聞從業人員有日本時報領導本元貞、盛京時報社長佐原篤介、日笠芳太郎與滿州評論編輯橘樸；左翼人士如尾崎秀實、細川嘉六、伊藤律、伊藤好道、堀江邑一等；右翼則有大川周明與井上日召。²⁵⁷

第二項 日本國內鎮壓與調查部的擴大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與工人運動在二十世紀初期便已出現

頁 5。1926 年滿鐵有特約人員 142 人（其中屬於調查部的有 23 人），而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則超過兩千人。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頁 107。

²⁵² 滿鐵的僱員制度具有相當的彈性，從與最高階層理事同級的顧問到最尋常的員工皆有囑託編制。

²⁵³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40.

²⁵⁴ 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頁 107。

²⁵⁵ 中江兆民之子。

²⁵⁶ 1868-1949，明治-昭和時代的中國文學者。

²⁵⁷ 由《滿鐵に生きて》（Fogel 翻譯之英文版），頁 41、《滿鐵調查部內幕》，頁 107 整理之。

在日本，²⁵⁸ 大正民主時期帶來的自由風氣，更使各種社運、思想與社團蓬勃發展。然而，日本政府並非毫無管制與干涉。明治時期即有 1880 年通過的集會條例、1890 年的集會及結社法和 1900 年的治安警察法，用以控制群眾運動與維持社會穩定。1925 通過的普選法案雖使民主政治更進一步，²⁵⁹ 但政府鑑於當時社會運動風潮的日益熾烈，同年還通過了和上述三法一脈相承的治安維持法。其內容為變革國體、否認私有財產制等一切結社及運動的禁止，違者處十年以下徒刑。²⁶⁰ 1928 年 7 月，內務省與憲兵隊分別設置了特別高等員警課與特別思想股，做為鎮壓破壞社會體制運動、思想的政治警察。

從 1926 至 1929 年，陸續發生了京都學連事件、²⁶¹ 三一五事件、²⁶² 四一六事件，²⁶³ 加上右翼及愛國主義的抬頭，使得日本自由主義各流派遭受嚴重的打擊。²⁶⁴ 在學連事件的影響下，文部省於 1926 年 6 月下令禁止學生的社會科學研究（時任文部

²⁵⁸ 德魯·高登，李朝津譯，《日本的起起落落》，頁 205。

²⁵⁹ 合格選民從 334 萬增為 1,415 萬。

²⁶⁰ 而若批評天皇，其罪可及死刑。陳水逢，《日本近代史》，臺北市：台灣商務，頁 154。

²⁶¹ 1926-1927 年間，以研究馬克思主義、勞工議題，在全日本擁有 1,600 名會員、橫跨 49 校的學生社會科學連合會（學連）遭到特高以治安維持法、違反出版法、不敬罪等罪名檢舉與搜捕，並起訴了 38 名學生。

²⁶² 1928 年 3 月，日本政府大規模檢舉日本共產黨（第二次共產黨）、共產青年同盟等左翼團體 1,600 餘人，其中以違反治安維持法起訴的有 484 名。

²⁶³ 1929 年 4 月 16 日，日本政府起訴了 339 名共產黨員。四一六事件為該年一連串檢舉事件的總稱，1929 年共有 4,942 人以治安維持法被逮捕。

²⁶⁴ 黃福慶，〈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之背景探討〉，頁 151。

大臣為岡田良平），1928年更下達東大新人會以及各帝大社研的解散命令。1929年11月22日，他們發表了「新人會解散聲明書」，從推動普選到國家改革不遺餘力的菁英薈萃團體，終究還是走上解體的命運。繼而從經濟大蕭條發生的1929年到1932年，社會矛盾、軍事擴張與暗殺事件頻仍，改變了整個日本的政治體系。不只是對社會的壓制與政治尺度的日益緊縮，經濟大恐慌與國際情勢都使日本急於尋求一個突破口，這樣的壓力成為滿州事變與滿州國成立的原因之一。而軍方佔領中國東北後，為了推動日本低迷的經濟與日滿經濟圈的構想推波助瀾，積極展開經濟建設。對具有新穎經濟知識與調查企劃能力人事的需求，使得1926-29年間遭受鎮壓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各流派有存活及發展的機會，具自由主義傳統的滿鐵調查部遂成為他們發展的溫床及達成理想的活動據點。²⁶⁵

到了支那事變後的1938-39年，因為新局勢與軍方的需求使產業部將調查部分支機關做一整合、擴張而成大調查部，而有新一波的人士進入滿鐵。改組後的大調查部擁有1,731人（1939年），隔年即成長到2,345人。²⁶⁶短短一年之間即增加超過600員，自非大量錄用新人不可。為了因應當時國策與情勢，滿鐵希望任用具備立即進行獨立調查與研究能力者；然而，初出茅廬畢業生多無法立即勝任此工作，因此採取了中間徵募人才，

²⁶⁵ 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編，《在滿日系共產主義運動》，頁115-117。轉引自黃福慶，〈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之背景〉，頁151。

²⁶⁶ 此時為滿鐵調查部規模的頂峰，之後因為財務的惡化而減少。

或由在職調查部人員、大學教師推薦，希望物色有實際業績的「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的人」。²⁶⁷ 許多具相當社會科學素養的「思想前歷」者，因為滿鐵對其需求孔急、且以求才為重點而得以被任用。尾崎秀實、細川嘉六、伊藤律、具島兼三郎等被歸類為「左派」之人士均在這個時期進入。Fogel 指出他們飄洋過海來到滿鐵的三個理由：其政治運動在日本被摧毀、因被逮捕而被迫「轉向」、²⁶⁸ 因為過去的經歷而無法找到工作。諷刺的是，為了逃離日本政府的鎮壓來到中國，卻進入了整個中日戰爭主要的行為群體之內。²⁶⁹

第三項 調查部風氣與檢肅事件

滿鐵調查部非一時、一人、一地，但吾人還是可以從後藤新平「文治武備論」、用人制度（囑託）、時代背景致使「轉向者」來到中國等因素一窺其概況。在歷史脈絡之外，以下介紹身處其中者與調查部重要傳記作家草柳對「調查部風氣」的論述。根據草柳大藏記載，調查部「簡直像一場從右翼到左翼

²⁶⁷ 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頁 513。

²⁶⁸ 由日文漢字「轉向」（てんこう）直接借用過來，意指思想、政治主張的改變，特別是指昭和前期受當局鎮壓、檢肅而放棄共產主義立場者。例如 1933 年日本共產黨委員長佐野學、鍋山貞親在獄中發表「轉向聲明」，聲稱自己受到蘇聯指導進行共產主義運動是錯誤的、今後將進行對天皇遵從的社會運動云云。

²⁶⁹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Introduction.

有各種思想的人在演出一樣。但調查局內部的空氣是明朗的。雖然有些爭論，卻沒有因思想意識上的分歧而產生陰險的對立。這也許是由於他們每個人精神都各自有所寄託的緣故吧！」²⁷⁰ 具島兼三郎回憶道：「說海的那邊有自由，因此 1937 年就飄洋過海進入滿鐵，當時就感受到滿鐵有想像不到的自由。…（日本本土）在取締左翼思想的風暴之際，這裡卻可以光明正大地在談論馬克思或列寧…」；²⁷¹ 田村羊三在「調查部觀」中這樣說：「調查部是滿鐵傘下的一個部門，事實上並不是這樣。雖然他是隸屬於滿鐵的，但也可以說不是滿鐵的。如果從滿鐵的社則或工作性質來看，他是一治外法權的存在。這種奇特的現象，是靠滿鐵人的精神努力造成的。」；²⁷² 福島正夫：「和日本內地比起來，一直到 1942 年之前，滿鐵內部的自由程度都算是不錯的。」²⁷³

後藤的邏輯是在於為了統治，因此為政策所用的真實比立場更重要，或者可以說，調查並不預設任何立場，自由原則是最重要的傳統。草柳即指出：「…但滿鐵調查部不是一個單純的組織的花園，也不是一個在知識的發展變化中只求得一致就可以的單位。」而在實際研究上，滿鐵調查部最大的特色就是「資料」與「步行」，也就是在掌握既有的資料後，出去進行「野外作業」（田野調查）。新進人員在最初的兩年內，主要

²⁷⁰ 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頁 72。

²⁷¹ 轉引自黃福慶，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之背景探討，頁 154。

²⁷² 草柳大藏，1979。《實錄滿鐵調查部（下）》，東京：朝日新聞社，頁 142。

²⁷³ 井村哲郎、天野弘之，《滿鐵調查部と中國農村調査》，頁 90。

的工作就是剪報（報紙雜誌的剪輯、蒐集）與讀書。²⁷⁴ 圖書館裡有著各式各樣的書籍，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Bapra 經濟年報、列寧著作、1927 年提綱等。因此，滿鐵調查員可以自由地閱讀這些在日本內地連收藏都是危險的書籍，若是向上級申請圖書館沒有的書，基本上也都會核准並買來。²⁷⁵ 瞭解了調查部這樣的風氣，也就不難理解在戰爭擴大後，因為「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結果不受軍方歡迎，及種種觸怒軍方立場的「敗戰言論」而最終釀成的檢肅事件。身處中國的調查部依然還是逃離不了政治鎮壓的命運。

1940 年，不只軍人與官僚已攀至整個政治體制內的權力高峰，²⁷⁶ 國家準備進入戰時體制、同時不斷發生政治事件，而擁有眾多高知識菁英的調查部亦不能倖免。第二次近衛內閣時修改了治安維持法，進一步縮限了人民思想、結社、運動自由；東條英機上臺後，除兼任陸相及參謀總長，更禁止一切批評政府的言行。²⁷⁷ 1941 年修正治安維持法之後兩年，陸續發生了企劃院事件（1941/1-4）、²⁷⁸ 佐爾格事件（1941/10）、²⁷⁹ 合作社

²⁷⁴ 「…每天早上分配給每人五、六份外國報刊，從中摘出需要的地方並用紅鉛筆把它勾畫出來。熟練之後，早上即可完成，下午便是自己的讀書時間…」，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頁 85。

²⁷⁵ 黃福慶，〈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之背景探討〉，頁 153。

²⁷⁶ 安德魯·高登，李朝津譯，《日本的起起落落》，頁 205。

²⁷⁷ 1942 年 2 月通過「戰時刑事特別法」。

²⁷⁸ 1939-1941 年，企劃院職員與調查官共 17 名被指控和左翼關係者之牽連、想達成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而遭到治安維持法的檢舉。曾在企劃院擔任高等官的滿鐵調查部川崎巳三郎遭到約談，致此事件也波及到滿鐵。

²⁷⁹ 同時替近衛內閣與滿鐵調查部擔任囑託的尾崎秀實因對社會主義裡想與運

事件（1941/10）、²⁸⁰ 中共諜報團事件（1942/6）、²⁸¹ 滿鐵調查部第一次檢肅事件（1942/9/21）、第二次檢肅事件（1943/6/4）、橫濱事件（1942/9-1944）²⁸² 等。這些幾乎全和滿鐵調查部有所關聯，政府、軍部與滿鐵三者的衝突也越演越烈，²⁸³ 終於演變至對調查部全面性打擊的兩次檢肅事件。雖然最終大都無罪釋放，卻已經使其元氣大傷。士氣一蹶不振的滿鐵調查部許多計劃都終止，苟延殘喘直到戰爭結束。

從以上可知道，在日本本土因為政治局勢逐漸成為一言堂時，滿鐵調查部提供了轉向者、受鎮壓者一個容身之處。這說明一個意圖成為帝國的日本，在擴張過程中所建立象徵帝國的機構，必須具有比日本本土更大的包容力量，否則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帝國，充其量只能像強行移植魚眼睛一樣等待失敗。雖

動的熱衷而認識 Agnes Smedley，又經由他結識 Richard Sorge，致使後來捲入「佐爾格事件」並被處死。

²⁸⁰ 佐藤大四郎等左翼前例者人在北滿推行合作社運動，關東憲兵隊因此指控其在國策（滿州國於 1937 年制定農事合作社法）的掩護下進行共產主義運動而鎮壓，逮捕了 50 餘人。

²⁸¹ 中西功等人因為協助中國共產黨蒐集情報被逮捕。解學詩，《隔世遺恩》，頁 637。

²⁸² 1942-1945 年間神奈川縣特高主導的言論彈壓事件，波及改造社、中央公論社、朝日新聞社、岩波書店、滿鐵調查部關係者 60 人被檢舉。

²⁸³ 第二章已提到，軍部對支那抗戰力、日滿支通貨膨脹等調查報告的結果均是戰局對日本不利，政治解決為上策很不滿，視其為敗戰思想；而雖然是為日本帝國做國策調查，滿鐵內部左翼運動的方興未艾，一直令當局頗不安。而因為合作社事件中被逮捕的鈴木小兵衛供出了滿鐵調查部 90 人的左翼名單與派系，使關東憲兵隊有機會發動兩次大整肅，總共拘提了 44 人。解學詩，《隔世遺恩》，頁 643。

然滿鐵內部對「左翼前歷者」並非沒有微詞，但其和日本之間有著「思想上的時差」，²⁸⁴ 卻是不容置疑的。第二，滿鐵僱用了為數龐大的囑託人員，不止活絡了滿鐵及調查部的機能，也顯示了他的多元與包容性。第三，是滿鐵調查部及其人員在 1940 年所遭遇的政治壓制，是和日本本土一脈相承的，也是調查部和獨裁統治與主導戰爭的東條內閣必然會發生的衝突。這顯示了滿鐵調查部在戰爭擴大後，本身也成為了帝國、軍國主義肆虐的受害者。滿鐵自由風氣的扼殺，無異預示了帝國包容性的毀滅，敲響了帝國本身難有所成的警鐘。

第二節 戰爭理論家大川周明 與東亞經調局

大川周明（1886～1957）一方面被歸類為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代表人物、右翼運動理論指導者，參與了軍部法西斯軍官策畫了一系列政變活動，²⁸⁵ 更是甲級戰犯中惟一的民間人士；另一方面他則也是對歐洲殖民史、亞細亞主義、回教等問題有研究的學者。大川的思想與行動使其評價充滿爭議，在當代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中，多把其視為法西斯思想、理論的代表者。原覺天認為大川的本質不能從單一面向來瞭解，必須從

²⁸⁴ 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頁 16。

²⁸⁵ 1931 年的三月事件、十月事件，1932 年的五一五事件。

學者和思想行動家個別來討論之。²⁸⁶

第一項 大川周明與東亞經調局

大川周明在東大期間即對印度哲學與吠陀文學產生興趣，1911年從文化哲學系畢業後，在接受參謀本部委託翻譯德語資料的同時，一邊持續研究印度哲學。²⁸⁷ 1919年，大川進入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擔任勤務，後升任為編輯課長、調查課課長。²⁸⁸ 1928年，大川成為東亞經濟調查局局長。而在調查局工作的同時，大川也參與政治運動，1919年組織了國家主義團體猶存社，²⁸⁹ 1924年與滿川龜太郎成立行地社，目的在提倡日本法西斯化，其更成為大川對東亞經濟調查局影響的媒介。行地社的綱領扼要地表達了大川的思想——維新日本的建設、國民理想的確立、精神生活中自由的實現、政治生活中平等的實現、經濟生活中友愛的實現、有色人種的解放、世界道義的統一。經調局成員如笠木良明、綾川武治、島野三郎及高村光次都參加了行地社的活動。行地社從1925年4月開始發行機關誌《月刊日本》，²⁹⁰ 並透過此雜誌和各分部機關的社員聯繫。²⁹¹ 身為東亞經濟調

²⁸⁶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頁444。

²⁸⁷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頁444。

²⁸⁸ 大川周明於1919年4月獲得東亞經濟調查局囑託兼臨時產業調查局囑託的職務，當年11月已成為編輯課長。

²⁸⁹ 猶存社中心人物為北一輝，主要成員有大川周明、滿川龜太郎、岩田富美夫、清水行之助等人。因大川和北一輝意見相左，其於1923年解散。

²⁹⁰ 笠木良明說服大川而發行，並參與編輯。

查局的課長，同時可以隨自己意志推行此政治社團的活動，而經調局內許多重要成員皆參與之，即可看出東亞經濟調查局的環境是很自由的。²⁹² 1929年7月，東亞經濟調查局從滿鐵獨立成為民間機構，大川隨即就任理事長一職。除了以大川為核心的右翼派，還有主張自由主義的派系，以曾擔任調查局理事的副島道正為首，有嘉治隆一、松方三郎、水野正直、田中九一等人。他們對大川的思想行動有強烈的批判，兩派有所相抗。1932年爆發的正面衝突使自由主義派一敗塗地。²⁹³ 原覺天指出，雖然大川的思想、行動、個性並不是完全代表經調局的全體活動，但在財團法人時代，其思想行動對調查局、調查員之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²⁹⁴

1932年，大川以行地社為本創立了神武會，²⁹⁵ 其中的調查部長金內良輔、組織部長片岡氣介、編輯部長雪竹榮都是東亞經濟調查局的職員。這個組織是被稱為「當時多數國家主義團體的壓卷」、「東亞經濟調查局是神武會的根本」。因為大川的關係，經調局職員可以在局內任職的同時，又被允許在外從事思想活動。1938年4月，服完五一五事件刑責的大川開設了

²⁹¹ 大川會在每期雜誌寫卷頭論文，經調局內成員也會參與。這些人同時以革新運動者的身份參加行地社在各地舉辦的演講會。

²⁹²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頁458。

²⁹³ 嘉治隆一被轉往朝日新聞社，松方和水野轉往同盟通信社，田中九一則轉到大連本社。

²⁹⁴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頁458。

²⁹⁵ 神武會有七個部份，分別是總務部、勞動部、調查部、組織部、法務部、青年部、編輯部。

東亞經濟調查局的附屬研究所並擔任其所長。這個計畫從滿鐵、外務省、陸軍省各拿到 5 萬，總共 15 萬的援助，為了實行《亞細亞調查要員的養成為直接目的》，每年從全國高中學校四年畢業者當中選拔 20 名，施以兩年的基礎教育後派往南方及西南亞細亞各地擔任實務研究，任期十年，使其成為個區域的專家。這個掛在東亞經調局下的

附屬研究所，名副其實是「大川塾」。上課內容有：(1)日本精神、(2)國史與東洋史、(3)政治學、(4)國際政治經濟學、(5)南方事情、(6)民族學、(7)回教概論、(8)禮法、(9)語學、(10)體育等。內容包含了大川自己研究的殖民史與亞洲民族運動，除了以養成佔領地區工作要員為目的，也為軍方所用。²⁹⁶

第二項 大川的研究與思想概述

大川的著述頗豐，代表作有《印度國民運動的現狀即其由來》、《日本及日本人之道》、《日本精神研究》、《大東亞秩序建設》、《特許殖民公司制度研究》、《日本兩千六百年史》等，其法西斯思想散見於這些著作中，²⁹⁷但這只是他思想中的被強調的一部份。他關心亞洲議題，認為被殖民的亞洲諸國應組成大東亞共榮圈來復興之；他強調戰爭為國家發展的必然性，以及提出宗教興國的理論。

²⁹⁶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頁 460。

²⁹⁷ 崔新京等著，2006。《日本法西斯思想探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63。

原覺天將大川的研究領域分為歐洲殖民史、²⁹⁸ 亞洲²⁹⁹ 與回教³⁰⁰ 三個；而若以時間來區分，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在殖民史與殖民制度，中年以後研究亞洲地區，晚年則是集中在伊斯蘭的議題。³⁰¹ 進入東亞經調局後，大川周明第一個研究課題是《專賣公司的研究》，然後是《專賣殖民公司制度的相關研究》。之所以選擇這些題目，除了自身興趣，³⁰² 也和滿鐵性質及東亞經濟調查局的業務有關。殖民史關係和亞洲研究素來即是滿鐵注重的領域之一。³⁰³ 大川投入更多的是《近代歐洲殖民史》（全3卷），他從歐洲的角度分析了15至20世紀殖民國對殖民地政策施行與鬥爭史，重點有三：歐洲觀點的殖民史研究、更深入探討被支配民族的鬥爭史、專賣公司。³⁰⁴

被稱為亞細亞主義者、大東亞說客的大川，更關心的是亞洲研究。³⁰⁵ 大川周明對亞洲的關心初期集中在印度民族運動的

²⁹⁸ 代表作為1920年的專賣公司研究、1924年的專賣殖民公司研究、1941年的近代歐洲殖民史。

²⁹⁹ 1923年的如復興亞細亞的諸問題、1943年的大東亞秩序建設。

³⁰⁰ 如1942年的回教概論、1950年的古蘭（譯註）、穆罕默德傳（遺稿）。

³⁰¹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頁444。

³⁰² 大川在東大圖書館偶然讀到Sir Henry Cotton的《新印度》之後，被吸引並開始投入亞洲問題相關的書籍「…不只是印度，這茫茫的亞細亞大陸都遭到白人的蹂躪，他們不得不為奴的景況…」，從此便轉而投入歐洲殖民史及殖民政策的研究。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頁446。

³⁰³ 滿鐵成立時，即關心從東印度公司到歐洲各國殖民統治組織經營的議題。1909年進行了「近代各國殖民地統治制度」的研究。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頁446。

³⁰⁴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頁450。

³⁰⁵ 大川周明亞洲研究著作按年份排有：印度國民運動的現狀及其由來、復興

研究，到了 1920 年代早期的《復興亞細亞的諸問題》³⁰⁶ 則開始以全亞洲地區為研究對象。³⁰⁷ 他在其中提出亞洲的精神和政治的獨立，以大亞細亞主義的姿態論述亞洲民族解放及統一的問題。他在《日本兩千六百年史》中寫道：³⁰⁸

滿州對日本有根本性的利益。

日本在滿州具有特殊的政治、經濟權力。

把滿州自中國分割開來，實現日滿提攜是日本實現目標。

在滿州挑起事端，可緩和國內矛盾，調整國內關係。

日本在滿州實現上述目標，有利於在國民精神中驅逐民主主義、共產主義，進而加強愛國心。

除了強調滿蒙為日本生命線，更認為日本必須代表亞洲和歐洲一戰。1942 年的《米英東亞侵略史》則稱「…日本負起了朝鮮滿州中國在內的整個東亞的治安保全的巨大責任…」1943 年出版《大東亞秩序建設》時，日本已完全在軍人的把持之下，他的著作幾乎可視為是用來合理化戰爭的理論及宣傳工具。他強調戰爭為國家之母、東西對抗之衝突的文明觀、世界史就是

亞細亞的諸問題、滿蒙問題的考察、印度國民運動的由來、亞細亞建設者、大東亞秩序建設、新亞細亞小論、新東洋精神、英美東亞侵略史。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頁 452。

³⁰⁶ 復興亞細亞的諸問題由十三個問題構成。原覺天，前引書，頁 455。

³⁰⁷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頁 455。

³⁰⁸ 大川周明（昭和十四年），《日本兩千六百年史》。轉引自嚴紹盪，《日本中國學史》，頁 557。

東西洋對立、抗爭和統一的歷史，而日本則是亞洲解放和對西方戰爭的領導者。³⁰⁹他在第二章討論了大東亞共榮圈地區的內容與範圍，並主張大東亞秩序建設的必然性。³¹⁰

大川周明在東亞經調局，但他並不是完全服膺後藤所建立的準則。不只親自參與政治運動、組織社團，更將其黨羽帶入局內成為一派。他的理論與思想成為法西斯最佳的輿論工具，1929年起，在日本陸軍的協助下，大川以東亞經調局理事長的身份率人在全國各地進行滿蒙問題的演講。³¹¹而他的研究與著作同時也獲得極高的評價，原覺天認為以當時的水準來看，是具有開拓性價值的。

第三節 記者觀察家橘樸與滿州評論

橘樸（1881-1945）從明治末年、大正至昭和，幾乎在中國大陸渡過了自己大半的生涯，野村浩一稱其為「日本帝國在大陸興亡盛衰史同時代的人」。³¹²自從1906年進入東北大連遼東新報社後，橘樸就以一個記者、評論家的身份用他自己的方式來詮釋「支那」；而兩次轉向則將他對中國的現實與理解區

³⁰⁹ 王屏，2004。《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頁251。

³¹⁰ 大川舉出佐藤信淵、吉田松陰、西鄉南洲、頭山滿等人來為其論點做思想分析的根據。

³¹¹ 崔新京等著，《日本法西斯思想探源》，頁168。

³¹² 野村浩一，張學鋒譯，《近代日本中國認識》，頁201。

分為三個側面。³¹³ 從研究方法的角度出發，橘樸被歸類在東洋史學中和白鳥庫吉「案牘研究」相對的「田野調查」方法，以親身體驗、觀察時事的記者身份實際觀察中國，且並被視為東洋史學建構過程中的非學院派代表。³¹⁴

第一項 滿鐵之前的記者生涯

橘樸於 1881 年在九州大分縣出生，雖然他父親職業為老師與教學行政，他的求學歷程卻不是很順利，先後念過東京日本中學、愛知縣立第二中學都被退學，雖在愛知縣立第一中學完成學業，卻曾發起學生運動遭到處分。之後至熊本第五高等學校，當時由於義和團事件（1901）的餘波蕩漾，使熊本瀰漫著一股中國熱，他因此產生對中國政情的關心。³¹⁵ 1902 年九月進入東京早稻田大學，翌年卻因助他人作弊遭到退學，離開學校後在上野的帝國圖書館自修。

1905 年，橘樸結束「放浪」的日子，進入札幌的「北海時報社」；隨著日本實質佔據南滿，他於隔年進入在遼東新報期間，在大連、長春、哈爾濱等地採訪，也和在海道時一樣，利用時間到農村調查民眾的社會經濟生活狀態。³¹⁶ 1913 年，他到中國政治中心北京長住，成為《日華公論》主筆（主編為

³¹³ 野村浩一，張學鋒譯，《近代日本中國認識》。

³¹⁴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

³¹⁵ 山田辰雄等著，2005。《橘樸翻刻と研究》，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社，頁 668。

³¹⁶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頁 18。

森川照太），一方面熱心觀察中國政局的演變，一方面與中野江漢研究民間同俗道教，此點相異於當時日本知識份子經由儒教來瞭解中國。³¹⁷ 換言之，他延續往日農村調查活動，用弱者（被統治者）的觀點來看中國歷史，逐漸形成他的方法論，亦即研究表面政治現象之底層的社會組織與民眾生活。³¹⁸ 1919年，橘樸開始和中野一起編輯《京津日日新報》，他認為從一般民眾的日常言論中可以得到最真實民意、輿論，因此時常出入都市的茶館和農村市集。伊藤武雄在北京時，即被《京津日日新報》中橘樸庵筆名所寫關於中國行會（guild）、幫的文章所吸引，而當時在京津一帶居住的日本人沒有人以近代意識寫這樣的社會評論。³¹⁹ 1922年10、11月間，為了探究中國農民的經濟生活，他到山東李村³²⁰一帶從事農村田野調查。山本秀夫指出其對李村一帶基礎資料的蒐集工作與研究，可視為日後滿鐵農村時態調查報告的先驅。³²¹

1923年6月，橘樸自天津到旅順，翌年開始編輯《月刊支那研究》，³²² 這是《支那研究資料》³²³ 後他所主編的第二種雜

³¹⁷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頁19。

³¹⁸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頁19。

³¹⁹ 伊藤武雄之後在滿鐵本社和橘樸有所接觸，他原本想像橘樸是為了餬口才從隨軍記者轉到滿鐵（橘樸在1918年以因為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結束半學究的生活，以隨軍記者身份經大連、哈爾濱到貝加爾湖畔的工業都市Chita），但經由其態度才發現他不是為了錢當記者。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118

³²⁰ 今嶗山縣。

³²¹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頁21。

³²² 月刊支那研究，1924-1925，通卷十號。

誌。但因個人財力不足，兩者都僅出版 10 期、維持不到一年即終止。當時在華日本人中所流傳的期刊中，都是由滿鐵、東亞同文書院等發行，而《月刊支那研究》卻是靠個人的財力支持。但橘樸為何不投稿，而要大費周章的主編及發行期刊呢？山本秀夫推斷是因為橘樸極希望盡可能迅速而有系統把所觀察到中國真面目介紹給日本朝野，³²⁴ 他期望把科學方法灌注到日本傳統的支那研究學風之中，進而發展出異於傳統支那學的，也超越歐美學者的方法論。³²⁵ 1926 年 9 月，橘樸停止發行《月刊支那研究》，10 月被滿鐵本社調查課聘為特別顧問（囑託），當時他已是個名望頗高的中國問題研究者與新聞記者。野野村認為「從這一身份地位來看，通過特別顧問這一非常自由的形式與“滿鐵”結合在一起，或許是極其自然的事實」、「得到了這個合適的地位身份，以滿鐵發行的各種雜誌為舞臺，更是奮筆不息了」。³²⁶

第二項 滿州評論

伊藤武雄說：「當我們想到滿鐵調查部中的思想與科學系譜，無論是間接或直接的，橘樸都有很深遠的影響。」³²⁷ 滿州

³²³ 支那研究資料，1917-1918，全十冊。

³²⁴ 山本秀夫，1977。《橘樸》，東京：中央公論社。轉引自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頁 22。

³²⁵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

³²⁶ 野野村一雄，1986。《回想滿鐵調查部》，東京：勁草書房，頁 248。

³²⁷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119.

評論的主編不但成為橘樸後半生最重要的工作，取得滿鐵囑託身份也標誌著他把視點重心轉向滿鐵、滿州或日中兩國的「滿州問題」。³²⁸ 滿州事變發生前的 1931 年 8 月 15 日，由橘樸擔任主編、小山貞知³²⁹ 為發行人，在大塚令三³³⁰ 和滿鐵調查部人員的籌劃下，創辦了以週刊形式發行的政治經濟評論誌——滿州評論。³³¹ 至 1945 年 4 月 28 日停刊為止，共持續發行十五年、675 期。滿州評論發刊之際，正值中村大尉事件（6 月 27 日）、萬寶山事件（7 月 2 日）等中日關係緊張時刻。其目的是要對中國情勢提出公正的批判與評論，也要蒐集研判中國與滿州之間之趨勢時所必須要的內外文獻資料，所以在中國各地（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廣東、奉天、哈爾濱）以及東京、大阪、紐約，都有通訊網，以期能提供世界對中國和滿州問題的正確認識。³³²

橘樸之前就曾在《調查時報》、《滿鐵調查月報》、《新天地》等雜誌上撰文批判日本當時對中國（特別是滿州）的政策，也介紹他對滿州農村田野調查的結果與中國勞工運動的研究等。³³³ 他認為中國國民革命、國家意識與民族主義是歷史進程的必然，而這一定會和日本在滿州的特殊利益相衝突，故呼

³²⁸ 野野村一雄，《回想滿鐵調查部》，頁 248。

³²⁹ 滿鐵總務部囑託。

³³⁰ 大塚曾擔任長谷川如是閑「我等」雜誌的編輯，野野村一雄指其用同樣標準來編輯滿州評論。野野村一雄，《回想滿鐵調查部》，頁 170。

³³¹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119.

³³²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頁 27-28。

³³³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頁 26。

籲日本應把和滿州的關係回到純經濟方面，放棄軍事，甚至停止移民。再者，是他發覺當時滿州的日本人忽視了滿州的普遍性，而只強調特殊性，不把滿州問題當作中國問題的一部分來認識。³³⁴ 但滿州事變後，橘樸轉向了，肯定石原莞爾對滿州的政策。伊藤記載了「從滿州事變到滿州國建立之前，滿州評論站在一個批判的位置來討論政治及軍方政策；但滿州國成立後，橘樸態度卻和之前所預期的不同。」³³⁵

滿州評論每期發行 5,000~8,000 部，在滿州國內頗具影響力，但對日本國內輿論影響則較小。³³⁶ 滿州評論一個值得玩味的地方是他的性格。滿州評論第一卷第八號收錄了一段大塚令三與魯迅的對話：³³⁷

魯迅：這個滿州評論有讓人難以理解的存在。

大塚：在那邊？

魯迅：舉例來說，有右派布爾喬亞、也有左派無產階級的立場。

大塚：這就是滿州評論的特色，一人一黨主義，沒有一個明確的立場。

魯迅：這會讓讀者迷惑，應該要有一個明確的立場。

大塚：我不是誰的機構的雜誌，所以我不一定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滿州的事當作一個啟蒙的使命讓大眾明白。

³³⁴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頁 26。

³³⁵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119.

³³⁶ 野野村一雄，〈回想滿鐵調查部〉，頁 172。

³³⁷ 野村浩一，張學鋒譯，〈近代日本中國認識〉，頁 171。

發行人小山貞知自己不但同時是滿鐵、關東軍的囑託，更擔任滿州青年聯盟³³⁸ 理事長。雖然他自己為文並帶來關東軍參謀、右翼立場者的文章，卻絲毫不干涉滿州評論同時擁有其他立場的文章，任由橘樸、大塚等人自由發揮。雖然橘樸之後辭去主編之職，尊敬他的門人仍然在滿評上刊載自由主義乃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³³⁹

田中武夫³⁴⁰ 指出，一定要從橘樸本身的特質才可以瞭解到滿州評論的性格。記者生涯時期，橘樸就強調以親身體驗的態度去觸摸真實的支那，甚至寧以個人財力發行雜誌來維持這樣的獨立觀察。橘樸的邏輯和後藤新平學俗一致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後藤的目的是為了政策，橘樸則是要瞭解中國、傳遞中國。橘樸自況云：「而我對中國的評論，不是個人的喜好或知識上的求知慾，主要是透過這個政治的目的，探討日中兩民族的正確關係的理論和方法。一言蔽之，就是想徹底瞭解中國這個民族，故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研究。」³⁴¹ 進入滿鐵之後，橘樸得以利用龐大的資源、資料庫與人才，編輯滿州評論。其能維持強烈、尖銳的評判與自由主義的批判立場，除了初代編輯長橘樸為記者身份，也是因為滿鐵調查部既有的自由、科學風氣使然。

³³⁸ 滿州青年聯盟成立於 1928 年，主要目的是呼應關東軍，要以日本人的手來奪取被視為日本生命線的滿州。野村浩一，張學鋒譯，《近代日本中國認識》，頁 170。

³³⁹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119.

³⁴⁰ 田中武夫生於 1910 年，1927 自大連一中畢業後進入滿鐵情報課，為滿州評論社主幹。

³⁴¹ 田中武夫，1975。《橘樸と佐藤大四郎》，東京：龍溪書社，頁 58。

第四節 中國農經專家天野原之助

天野原之助（1901-1980）是著名的中國農業專家，他從京都帝大畢業後，即進入滿鐵大連本社工作。在調查部的二十年間，走遍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等地進行農村調查，戰後因為中國長春鐵路公司的留用，直至 1948 年才回到日本。先後在京大等地教授農業經濟、中國農業史，更出了許多相關的著作。

第一項 天野的中國研究略歷

天野於 1901 年生於大阪，1920 年進入松山高等學校（文科甲類）。松高期間，他會在下課後到懷德堂³⁴² 閱讀中國的古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除了受重松俊章講授的當時流行的東西文化交涉史與今村完道的漢文造詣所影響，天野認為他中學時期比較特別的，是每星期六到京大上如內藤湖南等著名學者的課程，這些都使他漸漸對中國產生興趣。1923 年他進入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除了當時學部最有名的河上肇，³⁴³ 他還上過西田幾多郎哲學與末弘先生政治課，而覺得有所收穫。天野不但花了一年半的時間讀完河上肇翻譯的「資本論」，更

³⁴² 懷德堂，享保年間大阪町人創設，為中國經典的教學場所。1869 年關閉，1916 年重新開放。

³⁴³ 河上肇（1879-1946），日本經濟學家、作家、社會運動參與者，馬克思政治經濟理論專家。1908 年於京都帝大擔任講師，1915 年自歐洲歸國後升任教授，1928 年辭職。日本翻譯資本論第一人，對左翼理論有很深的影響。

同時對照德文與英語版本。³⁴⁴

從京大畢業後，天野通過考試進入滿鐵，先在地方部衛生課、大連圖書館待了一段時間，後轉至調查課。³⁴⁵ 初進入的工作是滿鐵第二次十年史與二十年略史的編纂。經調會成立後，蘇聯專家宮崎正義為第一部（負責一般經濟調查立案與不屬其他部之事項）³⁴⁶ 主查，天野則被委任為底下的滿州經濟班主任（又稱經調會第一部第四班）。³⁴⁷ 1933年3月，滿鐵公主嶺農業試驗所推行大泉眼農村調查，天野制訂了家族數、耕地面積、經營費用、地主與小作關係等項目。他指出，相對於福武直在蘇州農村的社會關係（學）調查，大泉眼是純粹的經濟調查，目的是想讓農民提高產量並使農作物商品化。³⁴⁸ 熱河戰爭結束半個月後，³⁴⁹ 他到承德等滿州國新佔領地調查旅行，成果寫成《熱河省經濟的現狀與將來》。1934年夏天，他先至山東濟南、青島、坊子、昌樂、辛店等地調查旅行，寫成《支那農村準記》，³⁵⁰ 之後又到上海和中國農村經濟史專家馮和法見面，馮並將他介紹給薛暮橋、王寅生、孫治方等屬於中國農村派的學者（以

³⁴⁴ 井村哲郎、天野弘之，前引書，頁 10-11。

³⁴⁵ 1926 年京大畢業後，於 4 月 14 日抵滿鐵大連本社，10 月 1 日轉至調查部。

³⁴⁶ 黃福慶，九一八事變後滿鐵調查機關的組織體系（1932-1943），頁 373。

³⁴⁷ 井村哲郎、天野弘之，《滿鐵調查部と中國農村調查》，頁 32。

³⁴⁸ 天野舉當時日本農村社會學專家鈴木榮太郎為例，並以他在上海時和福武直等人學術交流的經驗，比較了農村經濟調查與社會調查的不同。井村哲郎、天野弘之，《滿鐵調查部と中國農村調查》，頁 51。

³⁴⁹ 熱河戰爭，1933 年 2 月 11 日至 3 月 4 日，戰爭結果是熱河省十九萬平方公里併入滿州國。

³⁵⁰ 井村哲郎、天野弘之，《滿鐵調查部と中國農村調查》，頁 61。

陳翰笙為首，另一派則是中國經濟派）。1935年，天野以滿鐵「乙種支那留學生」的身份到北京，學習中國農業與支那語。³⁵¹日中戰爭擴大後，天野到了上海，指導江南農村時態調查。1942年，³⁵²時海南島海軍特務部想在當地作土地慣行調查，³⁵³使一直對「南支那」有興趣的天野有機會前往研究。他關心的問題有祭典（祭）、同族（家族）關係、宗祠與族內裁判等，並觀察農村社會處理犯罪行為、違逆倫理的非正式制度。1943年回到新京，任調查局第二滿州調查室主查；雖然他沒有因為檢肅事件被逮捕或拘留，³⁵⁴卻被禁止從事跟政治經濟有關的研究。於是他在這個期間轉而整理北京留學時購入的賈思勰《齊民要術》、王禎《農書》與徐光啟《農政全書》等中國著名農書。戰後，天野並沒有立即回日本，而被中長公司聘為科學研究所經濟調查局主任研究員，並從事滿州經濟的研究。1948年7月返日，於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中國農業史、農業經濟史等課。

第二項 滿州經濟月報與天野的中國農業經濟

經調會時期最重要的兩份刊物是《滿鐵調查月報》與《滿

³⁵¹ 井村哲郎、天野弘之，《滿鐵調查部と中國農村調査》，頁70。

³⁵² 1942年4月轉任大連調查本部調查役。

³⁵³ 日軍於1939年2月10日佔領海南島。天野1942年11月到海南島，待到1943年3月。

³⁵⁴ 在鈴木小兵衛供出的滿鐵調查部左翼名單與派系中，天野被歸類為「大上系」，但最終並沒有被逮捕。

州經濟年報》（以下簡稱年報），前者是調查部的機關報，後者是新創辦的理論性刊物，也是滿鐵第一份向外部發行的雜誌，而其中最重要的兩人是天野原之助與大上末廣。宮崎正義曾指派天野到東京取經，經由東亞經濟調查局田中九一的介紹，參訪了當時與中央公論齊名的《改造》雜誌社。³⁵⁵ 年報被認為「從滿州社會經濟結構，從而探索滿州國民生活的規律…把原來低水準的滿州經濟理論性研究急速拉高，以推行我國對滿國策。」³⁵⁶ 身為主要編輯的兩人都認同這個方針，但在學術上卻有所差異——³⁵⁷ 天野從事以實證主義為主的農村經濟研究，曾發表三、四篇文章，如《滿州經濟的發達》、《滿州經濟的機構》、《滿州農業近代化的過程》；³⁵⁸ 大上則是理論派的社會經濟研究者，被同仁認為在企劃文案、領導能力與馬克思主義知識幾方面都相當出色，³⁵⁹ 並在之後超越天野成為年報的主導者。³⁶⁰ 1932年經天野介紹成為滿鐵囑託的大上，³⁶¹ 早在高校時期就接觸「唯物史觀」，入社後更積極推廣當時影響年輕知識份子深遠的講座派理論與山田盛太郎《日本資本主義分析》。大上的活躍與口才使他成為滿鐵中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派」之首（另一派

³⁵⁵ 井村哲郎、天野弘之，《滿鐵調查部と中國農村調査》，頁40。

³⁵⁶ 解學詩，《隔世遺恩》，頁239。

³⁵⁷ 解學詩，《隔世遺恩》，頁240。

³⁵⁸ 井村哲郎、天野弘之，《滿鐵調查部と中國農村調査》，頁40。

³⁵⁹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査》，頁28。

³⁶⁰ 解學詩，2004。〈日本戰時對中國認識〉。

³⁶¹ 也在經調會第一部。

是「前歷派」，如石堂清倫、山口辰六、鈴木小兵衛）。³⁶² 天野曾以經調會第一部第四班主任，邀請橘樸來經調會講授幾次中國社會經濟史，不只大上和橘一拍即合，還以他為老師主持研究會，研讀方譯成日文的魏復古（K.A. Wittfogel）《支那之經濟與社會》。³⁶³ 1942年第一次檢肅事件時，年報成為關東憲兵隊逮捕大批滿鐵調查員的罪證之一，遭指控為「最先將馬克思主義引進滿鐵調查部的是以大上末廣為中心的所謂青年將校…昭和十年版滿州經濟年報展現了大上派的最高水準與成果…」此外，由於該昭和十年出版所收錄的大上論文《滿州農業危機的現階段》引起他與鈴木小兵衛、中西功等人對滿州經濟的爭論，間接成為滿鐵第一個農村實態調查——大泉眼部落調查的推力，蓋他們需要更清楚的資料來佐證彼此的論點。³⁶⁴ 而在當時，以實證田野配合理論，是一種嶄新的社會經濟研究方法，³⁶⁵ 不只是年報有此的風氣，一直「以深入經驗且反對概念先行」研究農村的田野，更是此研究途徑佳的實踐者。

戰後天野成為專職研究與教學的農業經濟學者。除了集二十多年的中國調研經驗，更親眼見證中國農業的變遷，並以此其出版《中國農業の諸問題》、《中國農業史研究》、《中國古農書考》與《中國農業の地域的展開》等專書。1966年11月，他以日中友好協會訪中團一員的身分，踏上文革正方興未

³⁶² 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頁109。

³⁶³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頁29。

³⁶⁴ 解學詩，《隔世遺恩》，頁241。

³⁶⁵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頁29。

艾的中國。1973年7月，天野原之助、野間清與福島正夫在靜岡大學談論滿鐵調查部，對談錄音帶於1994年被其孫天野弘之所發現，經過整理與井村哲郎合寫了《滿鐵調查部と中國農村調查—天野原之助中國研究回顧》，³⁶⁶關於他多年對中國的農業研究，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1. 研究中國農業經濟、農村，第一是不可忽略制度，而制度又分為正式的規章與非正式的慣習、文化、風俗、家族關係等。
2. 不能從儒教對中國的詮釋、想像，或僅僅從鄉紳的觀點來看農村，在上海時做的農村調查就有過這樣的問題。必須以自身實際的經驗、深入的體驗來感受，並輔以質問應答錄等資料。
3. 以問答的形式（質問應答錄）和農民對話是比較適當的，北支農村慣行與中支商業慣行調查都做得不錯，能不透過翻譯會更好。

然而，天野的「中國觀」又是如何呢？由於共產革命的成功，使相對傳統的中國農業在短時間走向集體化，中國也有很多不同於以往的（農業）政策。野間依此提出問題：老師從1930年就開始研究中國農經，到現在有什麼感想呢？天野回答，他在《支那農業經濟論》中從生產關係、地主與小作人的榨取關係這幾點來作的分析，就反映了他的「支那觀」。他認為除了地主與小農間的剝削不會改變，不能團結的農民更無法成為革

³⁶⁶ 井村哲郎、天野弘之，《滿鐵調查部と中國農村調查》，2007年出版。

命的火苗。但是戰後逗留中國的三年間，透過和年輕人的接觸與學習，他發現自己漏看的東西。他的結論是：

因此我的中國觀改變了，成為我現在的「現代中國經濟論」…共產黨的指導理論與土地改革是我教學生進入中國的第一課，不這樣就把握中國的實態…我一直在想怎麼可以瞭解中國，最後得到的答案就是長時間觀察農民，光從僱傭勞動、生產與小作關係來看是不夠的，特別是農民生活的黑暗面。³⁶⁷

作為滿鐵調查部的一員，天野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學者，利用調查部甚至軍方戰事的推進，跑遍中國各地進行農村調查、蒐集資料。透過滿鐵這個媒介，他建立起以從農村實地觀察來瞭解中國的觀點，他個人也認為自己「反對經驗先行」的立場有繼承到後藤的風格。

第五節 從苦力研究到日中橋樑的伊藤武雄

伊藤武雄（1895-1984）自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後即進入滿鐵調查部，從 1920 年到日本戰敗的 1945 年，以一個滿鐵調查部高級社員的身份見證、研究乃至參與了中國近代的大歷史。從東亞經濟調查局、大連本社調查課、北京公所、天津到上海皆任職過；參與過滿蒙全書、北京滿鐵月報、冀東農村調查計

³⁶⁷ Itō Takeo, Joshua A.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p.186-7.

劃，且因為新人會與自身經歷，相當關注中國的工農運動、政經情勢與未來發展。1964年，伊藤武雄出版了《滿鐵に生きて》（生活在滿鐵），不只是關於滿鐵調查部、中日關係的經典回憶錄，Fogel認為更重要的是伊藤「成為了中日間意識形態鴻溝的橋梁」。³⁶⁸ 這本回憶錄成為之後山田豪一與原覺天研究滿鐵調查部的開端。³⁶⁹

第一項 從東大法學部、北京到加州柏克萊

「我對中國民族的興趣是從一高時代的中國旅行開始，而更深入的啟蒙則是在大學時聆聽了吉野作造以中國革命論為題的演講」伊藤在1917年高中畢業的暑假，和朋友展開了45天的中國旅行，遊歷青島、濟南、曲阜、泰山、北京、張家口、天津、大連、哈爾濱等地。不只如其他高校生海外畢業旅行的目的是認識日本的新佔領地，對他而言對中國關注與志趣的啟蒙。同年九月進入東京帝大法學部，吉野作造的中國革命史課程、新人會的參加與遊歷中國成為他加入滿鐵調查部並投身中國研究的三個因素。³⁷⁰ 1920年畢業後，與新人會同學嘉治隆一、石浜知行、波多野鼎一同進入隸屬滿鐵東京支社的東亞經濟調查局。經過三個月的學徒實習後，石浜和伊藤被派到大連的滿鐵調查本部。在石川鐵雄調查課長領導下，參加滿蒙全書第二

³⁶⁸ Ibid., Introduction.

³⁶⁹ Ibid., Introduction.

³⁷⁰ Ibid., pp.29-31.

卷軍事擔當的編撰。由於在一高的中國旅行中，受到大連碼頭衣著襤衫的苦力所震懾，伊藤希望到撫順煤礦進行中國勞工階級研究（或稱「苦力」）。在佐野學的引薦下，他得以透過福昌公司責任者杉村，進入勞工宿舍碧山莊觀察他們的生活。前去北京後隔年，伊藤不只參與了香港罷工，更至開灤煤礦罷工觀察中國解放運動。1926年，在鈴江言一的介紹下，到廣州採訪第二次香港大罷工，並結識蘇兆征、劉少奇、林祖涵等人。³⁷¹

1921至26年在北京逗留期間確定了伊藤畢生的志業，同時也是調查部重要刊物之一的《北京滿鐵月報》的創立。完成滿蒙全書編撰工作後，石川於1921年派任他為「北京初代駐在員」，而北京公所是滿鐵調查部在滿州之外的中國設置的第一個支所，³⁷²除了可視為一戰後滿鐵及日本帝國主義往南推進的期望，也是滿鐵向南延伸以取得中國復雜政治情況、更多訊息的觸角，如同為取得新興蘇俄情報而在1923年設置的哈爾濱事務所調查課。³⁷³石川給予他的研究計畫是關於中國的財政問題，例如北洋政府的外債、軍閥與中央政府依恃對土地控制來提高自身的相對支配權、帝國主義競逐其勢力範圍等問題。伊藤指出，他並沒有完全追隨滿鐵的指導方針，而是用更開闊的視野來研究中國，滿鐵也未干涉他根據自己興趣所做的研究。

³⁷¹ Ibid., pp.66-77.

³⁷² 北京公所事務所與社宅地址為北京市椿樹胡同二號，為滿鐵向之後滿州國駐日公使丁士源所購買。Ibid., p.61.

³⁷³ Ibid., p.56.

³⁷⁴ 伊藤回憶指出，

我瞭解到外債與北洋政府的財政問題，是帝國主義對入侵中國的現象之一，而由此發展出我的研究…軍閥抗爭與腐敗官僚是一連串中國社會的解體現象，這是帝國主義列強競相借款的原因之一…解體現象一方面是軍閥混戰，一方面是學運與工運。這些運動是在社會解體的過程中產生，但最終卻也把這個過程帶向終點。我的研究是關心這些社會運動對產生中國新的未來的過程中，佔據何種位置。³⁷⁵

為了發揚在北京目擊到的支那解放運動與累積的個人經驗與資料，伊藤提倡籌辦以北京為中心的支那研究期刊。他向北京支所所長牛島吉郎爭取到一個處所，命名為「北京研究室」，做為《北京滿鐵月報》的辦公室。³⁷⁶ 他們蒐集了大革命發軔時期的詳細資料，對中國早期勞工運動和五卅事件有豐富的記錄。伊藤寫了一系列關於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文章，如帝國主義侵略史、國民革命論、革命政黨論、學生運動史、紡織工廠罷工論、中國苦力和近代勞動組合論。小論文有北京貧窮問題、中國人口統計研究、北京人力車夫研究、中國新聞發達史、耶

³⁷⁴ Ibid., pp.79-80.

³⁷⁵ Ibid., pp.79-80.

³⁷⁶ 為此特別聘任助理三谷享君。伊藤一直擔任主編（1924-1926/8），直到因為歐美的進修計畫才將其交與宮本通治負責，直到1929年。伊藤回中國後，繼續從事滿州支那月誌的編纂工作。Ibid., pp.82-84. 北京滿鐵月報的南遷與改題請見第二章。

蘇會傳教士的中國研究論等。³⁷⁷ 1927年3月，東京同人社出版了伊藤武雄北京生活的總括《現代支那社會研究》，主要收錄他發表在北京滿鐵月報、社會思想與改造幾份雜誌上的文章。³⁷⁸ 矢內原忠雄與山川菊枝評價其為「關於中國研究的科學解說書」。³⁷⁹ 北京期間，除了和佐野學、片山潛、鈴江言一、中江丑吉等在華日人接觸與合作，更結識了李大釗、胡適、魯迅、蘇兆征、劉少奇、林祖涵等中國各界菁英。1926年五月，他向滿鐵申請的留學研修計畫「歐美諸國的對中國政策和中國研究調查機關的研究」被批准，³⁸⁰ 同年十二月伊藤到了美國，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習了 Williams 教授開設關於中國的討論課，他在《滿鐵に生きて》中寫到：「…課堂上（Williams 教授的討論課）沒有人瞭解正在發生、變動的中國革命情勢，由於我才剛離開東亞，使用生硬的英語跟他們說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勾結的歷史、國民黨內左右翼鬥爭…。」³⁸¹

第二項 從大連本部、奉天刑務所到日中友好協會

1929年3月，伊藤武雄自歐洲返回大連，5月被任命為南京駐在員。11月《北京滿鐵月報》改題為《滿鐵支那月誌》，

³⁷⁷ Ibid., p.81.

³⁷⁸ Ibid., p.103.

³⁷⁹ Ibid., p.103.

³⁸⁰ 滿鐵留學制度分為兩年、一年及半年三種，社員需在滿鐵任職滿五或六年才可申請。當時伊藤武雄已在滿鐵工作滿五年。Ibid., p.99.

³⁸¹ Ibid., p.100.

由上海事務所發行，伊藤發表「支那研究を科學的綜合へ」（趨向科學研究的支那研究）做為自歐美考察回來的心得。下為筆者所蒐集到《滿鐵支那月誌》中伊藤所寫文章的標題，有四篇和歐美相關的研究。

表 3-1 伊藤武雄發表於滿鐵支那月誌文章列表（部分）

時 間	通刊序號	題 目
昭和 4 年 11 月	通刊第 30 號	支那研究を科學的綜合へ 米國對支政策基調論
昭和 4 年 12 月	通刊第 31 號	支那言論界に於ける「滿州問題」 古代支那に於ける商業資本の發達
昭和 5 年 05 月	通刊第 36 號	歐洲に於ける支那發見
昭和 5 年 07 月	通刊第 38 號	リツヒアルト ウイルヘルムの訃

資料來源：同表 2-8

1932 年 1 月，伊藤被派任調查課課長。由於當時已成立經濟調查會，使調查課規模與重要性不如前，很多人都轉移到經調會系統去。³⁸² 伊藤指稱他在調查課長時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接待與提供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呈交國際聯盟的資料、宣傳對滿經濟與文化的發展，之後調查課即裁撤。³⁸³ 隨著滿鐵與日軍的勢力範圍向華北推進，伊藤如同十四年前成為北京初代駐在員一般，於 1935 年底，由（經調會）新京駐在幹事調至天津駐在幹事。³⁸⁴ 於天津閒暇之餘，他撰寫了冀東地

³⁸² 伊藤還兼任了太平洋問題調查會（IPR）的中國關係仕事、成為獨立法人的東亞經濟調查局的理事。Ibid., p.154.

³⁸³ Ibid., p.155.

³⁸⁴ 1937 年 3 月，伊藤擔任天津事務所所長。

區十三縣農村的實態調查計畫，³⁸⁵ 經軍方同意後，在天津事務所農業班、（本社）經調會農業關係者與滿州國臨產調查局三個機關的合作下，³⁸⁶ 以伊藤為班長，組成了「冀東農村時態調查班」。他使用了蘇聯中國研究者 Mad'iar ³⁸⁷ 的理論，表格則是依據美國經濟學家 Buck John Lossing 進行過的調查所制訂，伊藤並提出六個調查要點。³⁸⁸ 依據 1936、37 年兩次的調查資料，最後編輯成《冀東農村時態調查報告》。³⁸⁹ 伊藤認為他們的調查相當成功，是「毛澤東的農村調查無法比擬的」，但他也承認「從方法論上，我們的研究是在科學調查的精神下進行的，但我們又無法否認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推進下的調查」。³⁹⁰

1937 年 7 月，他成為上海事務所所長。因為 1939 年調查部的擴大，上海支所也進來了許多左翼人士，很多都是透過他新人會時期的人際網路進來。當時有三百個職員及超過三百萬圓的經費。³⁹¹ 上海支所在支那抗戰力調查、日滿支通貨膨脹調

³⁸⁵ 1933 年塘沽協定後，該地劃為停戰區；1937 年何梅協定後，日軍推殷汝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在日軍的控制下，該處較為穩定與和平，因此伊藤視其為理想的農村調研區域。冀東地區是指長城線以南和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保坻、林亭口、蘆台一線以北及以東地區，22 縣、人口 600 餘萬，8,000 平方公里。解學詩，《隔世遺恩》，頁 276。

³⁸⁶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也提供協助，向調查地區各縣政府發出協助調查的指令，負擔部分費用，並任命全部調查員為冀東政府臨時囑託。

³⁸⁷ 解學詩，《隔世遺恩》，頁 277，註 2。

³⁸⁸ 1. 生活資料供需關係 2. 地區特殊生產關係實態 3. 農村金融實態 4. 農村疲敝原因 5. 合作社戶助組的有無及其現狀 6. 農村一般實態調查。解學詩，前引書，頁 277。

³⁸⁹ 解學詩，《隔世遺恩》，頁 280。

³⁹⁰ Ibid., p.164.

³⁹¹ Ibid., pp.175-176.

查、世界情勢分析三個綜合調查中扮演吃重的角色。伊藤武雄擔任了支那抗戰力調查會的委員及負責中支分科會主查。³⁹² 隨著前述知識界與權力當局的關係益形緊張，陸續發生諸多對知識份子的追放、彈壓事件，伊藤亦心中有数。³⁹³ 1943年6月，即調回大連本社任顧問一年半後，伊藤武雄與另外九個人在（滿鐵）第二次檢肅事件中遭到憲兵隊逮捕，關押在敦化憲兵隊留置所。³⁹⁴ 同年十月，他向滿鐵提出辭呈，後又輾轉送至奉天刑務所、新京監獄，1944年5月才被無罪釋放。1945年5月，伊藤從大連回到東京，成為「日華協會」的籌備成員之一。³⁹⁵ 由於日本已在為戰敗做準備，希望以此做為統合過去中日間各民間團體的組織，網羅各界「關心中國人士」，希望這個半官方機構可以在戰後談判與中日關係上有正面的作用。惟其尚未有任何做為即遭到終戰的清算。1946年，伊藤武雄與無產階級研究所的岩村三千夫、中西功、平野義太郎、石浜知行等人成為接收原日華協會資產成立的「中國研究所」的創始成員。³⁹⁶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隔年開始籌備「日中友好協會」，1951年7月年擔任該協會理事長（風見章為會長）。³⁹⁷ 1958年7月，

³⁹² Ibid., p.167.

³⁹³ Ibid.

³⁹⁴ Ibid., p.206.

³⁹⁵ 伊藤收到從滿鐵東京支社轉到大連本社給他的電報，要求他進行日華協會的籌備工作。Ibid., p.204.

³⁹⁶ Ibid., p.207.

³⁹⁷ 1950年10月開始一年的籌備期。伊藤任內策劃、舉辦了許多中日交流活動，如第一次學術文化訪中團（安倍能臣團長）、第一次文學代表團（田邊尚雄團長），來日參訪的則有第一次紅十字總會代表團（李德全團長）、第一次學術代表團、第一次通商貿易代表團、第一次京劇公演團（梅蘭芳

受長崎國旗事件³⁹⁸及後續中日民間交流中止等事刺激下，與風見章、細川嘉六、中島建藏發表「反省聲明」。10月，應中國人民外交協會邀請，與風見、細川等十人以「日中國交回復國民會議訪華代表團」訪華參加十一國慶（伊藤為副團長兼秘書）。

伊藤在東大受到吉野的影響，自認為受大正民主思潮影響的知識份子，關心勞工與中國這兩個議題。他在滿鐵的日子幾乎伴隨著帝國日本在支的情勢而推進：先去了北京，創辦了月報並與馬克思主義者交遊、作了冀東農村調查；繼而到了上海，因為東大的網絡引進了不少社運、左翼份子；大調查部時期參與了支那抗戰力調查的編輯，卻成了被檢肅的員因之一。從伊藤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知識份子既間接利用政治局勢、權力（如在軍方的輔助下調研）生產知識，一方面自己中間偏左的自由主義色彩到最後也不能倖免於「知識彈壓」。而透過滿鐵這個位置獲得豐富的中國經驗，終成為他之後毫無疑問地支持共產中國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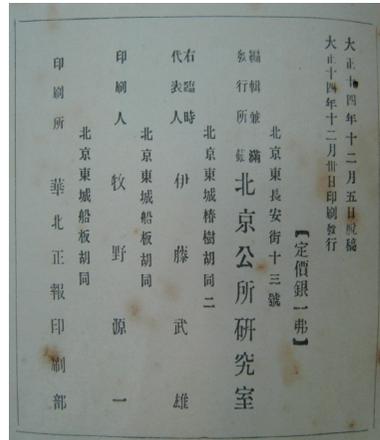


圖 3-1 北京滿鐵月報封底

團長），簽訂關於戰犯釋放的天津協定、第二次歸國締結協定等。

³⁹⁸ 1958年5月，日中友好協會在長崎浜屋百貨舉行「中國郵票展覽會」，一名右翼青年將會場入口天井懸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旗扯下。日本政府對此事無多作解釋，但中方認為是極大侮辱，因此中斷交流與廢止雙邊貿易協定。

第四章 滿鐵調查部遺緒與研究

我主要關心的是東亞經濟調查局的龐大資料。當我猶豫是否要保護它們時，一個第二代日本人與美軍佔領了滿鐵，驚訝於這批龐大且非常具有價值的材料，並很快將其運回美國。

伊藤武雄，《滿鉄に生きて》³⁹⁹

第一節 滿鐵遺緒

第一項 戰後資料與調查人員去向

滿鐵調查部在經過 40 年代一連串思想彈壓及 1942、1943 兩次檢肅事件後，過去所累積的調查能力受到打擊，隨著戰爭節節敗退，其功能已不復之前。1945 年 9 月 21 日，蘇軍以中國長春鐵路之名接管了滿鐵。⁴⁰⁰ 隔天，中長鐵路蘇聯代表加爾金中將至長春上任，以中蘇協定名義將幹線鐵路置於自己的指揮之下，並宣告滿鐵法人資格消滅、喪失管理權與滿鐵理事全

³⁹⁹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208.

⁴⁰⁰ 解學詩，前引書，頁 693。蘇軍的佔領是依據 1945/8/14 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條約中規定中蘇合辦中國長春鐵路。蘇崇民，前引書。

部解職。⁴⁰¹ 隔年 7 月 9 日，末任總裁山崎元幹簽署了將滿鐵所有財產移交給中華民國交通部和中長鋼鐵公司的文件。⁴⁰² 蘇軍佔領東北期間掠奪了大量日人遺留的工業裝備與武器，滿鐵的資料亦不能倖免。楊覺勇如此敘述：「戰爭結束後，在 Popov 的帶領下，一個有兩個漢學家、三個日本學家及一個英語專家的團隊佔領了滿鐵總部。在一個星期內他們調查了大連圖書館及其內部研究室的資料。一個叫 Egorov 的俄國人管理了前研究部、大連圖書館、中央試驗所，而部份研究活動則由長春鐵路公司科研部重新組織。」⁴⁰³ 除此之外，蘇軍還「用卡車拉走了保存在大連和旅順之間營城子的高爾夫球場地下室的大量調查文獻」。⁴⁰⁴ 伊藤武雄則指出旅大被佔領期間，三輛大卡車裝滿了文件送往蘇聯。「包括松崎鶴雄苦心蒐集來的數十冊永樂大典。」⁴⁰⁵ 美國的日本佔領軍接收了東亞經濟調查局的大批資料，運往美國並收藏在國會圖書館等地。⁴⁰⁶ 《滿鉄に生きて》中的記述了部份資料的下落：

⁴⁰¹ 1945/11/19，山崎元幹與加爾金中將關於蘇軍移交滿鐵財產管理權的備忘錄，內容：我等滿鐵理事團同意將滿州（包括北朝鮮）的屬於滿鐵會社所有及管理的全部財產，即鐵道線路及支線、各附屬事業、輪轉材料、機車…生產工廠及各種造物、學校、醫院及學術調查機構等的一切管理及使用權利向蘇軍司令部移交並付諸實行。蘇崇民，《滿鐵史》。

⁴⁰² 筆者在北京交通大學滿鐵研究會看到此檔正本。

⁴⁰³ John Young, 1966.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of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⁴⁰⁴ 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

⁴⁰⁵ 這批永樂大典在之後歸還給中國。伊藤武雄，《滿鉄に生きて》。

⁴⁰⁶ 黃福慶教授口述，筆者整理。

1. 上海事務所。其資料被國民黨所掠奪，上海解放時它們被運到香港，現在（1984年）可能在台灣。
2. 東亞經調局。被美軍所佔領，和東亞研究所的資料一樣，被視為對美國遠東研究有非常大的助益，特別是研究中俄關係與對蘇聯以及中國的政策。它們存放在美國國會圖書館。
3. 中央試驗所。為滿鐵最重要的科研機構，在之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接收，一些原來的日籍職員被續聘為顧問。部份計劃則移交給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

因此，滿鐵的文書資料就如同戰利品般被以聯合國軍名義前去接管的美、中、蘇三國軍隊所接收，如今散佈在中、日、美、俄、台等地。根據筆者於北京實地訪查所得的訊息，⁴⁰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⁴⁰⁸ 滿鐵藏書、調研報告及各種文獻資料被當圖書資源分送到各高校圖書館、研究單位，以東北的大學為大宗，如黑龍江社科院、吉林省社科院、遼寧大學、瀋陽市圖書館等；北京則有北京交通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家科學院圖書館、中國農業大學圖書館；在華東則在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圖書館等地。台灣則是國家圖書館與台大法學院圖書館（帝大時期藏書）有之。

滿鐵調查部第二項重要的遺產是研究（調查）人員。伊藤

⁴⁰⁷ 筆者於 2008 年 12 月參訪北京交通大學滿鐵研究分會及其收藏資料的檔案室，並簡要訪談了圖書館人員宋雪、教授孟憲梅等人。

⁴⁰⁸ 國共內戰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收。

武雄指出，雖然滿鐵解體使大約十四萬受雇者一夕之間失去了工作，但原隸屬於調查部的職員，絕大部分都找到適合的工作，甚至超過他們的預期。除了成為負責策劃的政府高級官僚，更多是大學擔任教師，從自然科學、文科到經濟領域皆有。⁴⁰⁹ 中央試驗所丸澤常哉博士與試驗所的科學家幫助中國科學院的建置；天野原之助與野間清等人被中國長春鐵路公司留用，天野在科研院所經調局，返日後京都大學人文研任教，是中國農經專家；野間在理事會調查處，之後在中國研究所與愛知大學。具島兼三郎則擔任長崎大學校長、長崎平和文化研究所所長等職。政治色彩較濃厚者，中西功與細川嘉六都在戰後當選參議員（中西為日本共產黨黨員），佐野學於早稻田大學，嘉治隆一任獨協大學講師與文部省委員。大川周明作為甲級戰犯中唯一民間人士，但因被判定精神疾病沒被處死。旗田魏是為中韓史專家，於東京都立大學擔任過文學院院長，原覺天則於亞洲經濟研究所；伊藤武雄在日中友好協會，是日本對共產中國關係的重要人物。小林英夫甚至認為，滿鐵菁英是日本戰後經濟高速成長的原因之一。⁴¹⁰

第二項 滿鐵資料分類及存放地

美、日、中均有機構或學者做過關於滿鐵資料散佈的考據

⁴⁰⁹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212.

⁴¹⁰ 小林英夫，《滿鐵調查部の軌跡：1907-1945》。

與分類，美、日、中均有機構或學者做過。1966年，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出版了美籍華人學者楊覺勇⁴¹¹對滿鐵調查部活動及所存資料調查的研究－《The Research Activities of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1907-1945: A History and Bibliography》，⁴¹²書中列舉了楊覺勇利用八年時間對美、日兩國圖書館（美國10間、日本25間）滿鐵資料的清查，包含了滿鐵藏書、研究資料、研究成果、期刊等6,154件，並細分成46個項目。書中將滿鐵當時研究分為三種：第一種是研究日本很感興趣的地方的經濟、社會及文化，這些地方包括中國、西伯利亞及其他亞洲地區。第二種包括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如物理學、化學、地質學、農業、植物學、衛生學、氣象學及細菌學。第三種是與滿鐵業務有關的商業及統計題材。根據楊覺勇的調查，美國館藏地有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國會圖書館、夏威夷大學圖書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奧克拉荷馬大學、賓州大學。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圖書館接收了滿鐵在東京的

⁴¹¹ 楊覺勇，1920年生，美籍華人，二戰期間曾在中國外交部負責對日工作，為美國著名日本問題專家。1948年，時任喬治敦大學歷史教授的楊覺勇偶然接觸了戰後美國運回的秘密檔案，申請通過後，他在佛吉尼亞州倉庫檢視了這批七千立方公尺的資料，以微縮膠捲拍攝了其中的5%。但他與學術界的研究計畫尚未開始，美國即因冷戰等因素將其歸還日本。這本書即是他研究的成果之一。2010年7月4日，楊覺勇口述，文車整理，2005。〈國民黨不敢查閱 我拍到了日本的秘密檔案〉，人民網日本版 <http://japan.people.com.cn/BIG5/35467/35498/3910492.html>。

⁴¹² John Young,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分社（東亞經濟調查局）十萬冊藏書（其中有三萬冊是西文書刊）的其中六萬冊，二萬五千冊歸納入日本藏書，剩下三萬五千冊多半是中文、韓文及西文書刊，已送去了中文、韓文，及西文組收藏。有些還分配給法律圖書館、地理及地圖部、圖片及照片部、電影及錄音部等。其他多餘的版本則送到美國及琉球的東亞圖書館去收藏。⁴¹³ 日本館藏地則有中國研究所、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庫等 25 個地方。⁴¹⁴ 日本方面，以通產省為背景、研究重點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的亞洲經濟研究所，擁有大量包含滿鐵調查部在內的舊殖民地機關文獻資料。1975 年先刊行了《滿州國·關東州編》，1979 年刊行了《舊殖民地關係機關刊行物總合目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其在 1965 至 1978 年間查閱了日本四十四個、美國（胡佛、哥大、加大、哈佛燕京、國會圖書館）六個單位的圖書館、學術機構 50000 枚圖書卡所藏滿鐵資料（含文書）編製。⁴¹⁵

在中國大陸，吉林省社科院是滿鐵研究的重鎮。1990 年代，有四十年滿鐵研究經歷的研究員解學詩與其團隊用五年的時間，將幾十年蒐集到的數萬件、冊滿鐵資料，進行清理、分類、編目，編成《滿鐵調查報告目錄》、《滿鐵調查部期刊

⁴¹³ 2010 年 7 月 4 日，李華偉（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漢學資源》，<http://www.ntnu.edu.tw/alumni/alumni-07/325/325-004.htm>。

⁴¹⁴ 同前註。

⁴¹⁵ 解學詩，《隔世遺恩》，頁 19。亞洲經濟研究所，1979。《舊殖民地關係機關刊行物總合目錄》。

載文目錄》與《隔世遺思—評滿鐵調查部》等書，還建立起附屬於吉林省社科院的滿鐵資料館。⁴¹⁶ 他將滿鐵資料分為四部份：⁴¹⁷

表 4-1 滿鐵資料分類

分 類	內 容
滿鐵檔案	原始文書及檔案。本社檔案迄今尚存 13,000 多卷。
滿鐵資料	滿鐵檔案文書以外由本社及滿鐵所屬各機構形成的文字資料，包含當時其他日本在華機構的資料。
滿鐵圖書	滿鐵系統的圖書館有 22 處，較大規模的有大連、奉天和哈爾濱圖書館。其中大連圖書館保存了從中、俄及世界各地蒐集各種版本的中、日及西文圖書。
個人文書	滿鐵理事以上個人所藏滿鐵文書資料，如十河文庫（東京大學）、山崎元幹文庫（小原田圖書館）、松岡文庫（成為《現代史資料》的一部分）。大部份歸日本教育文化機構所管。

資料來源：解學詩，《隔世遺思—評滿鐵調查部》。

而中國其他地方的滿鐵資料過去被當作圖書資源而分送至

⁴¹⁶ 1995 年 7 月，透過解學詩與安藤彥太郎的關係，吉林省社科院獲得日本萬國博覽會紀念協會、國際交流基金的援助，加上自籌資金，成立了滿鐵資料館，共收錄館藏資料 28,709 冊，其中日文 27,160 冊、西文資料 1,549 冊。2010 年 7 月 4 日，條目：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滿鐵資料館，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543475.html>。

⁴¹⁷ 解學詩，《隔世遺思》，頁 722。

各大學，沒有受到相當重視。為了避免珍貴史料的毀損，在諸多學者的努力與奔走下，中國國家教委會於 1996 年成立「中國近代史史料學學會滿鐵資料研究分會」，李新任會長，季羨林與國林等擔任顧問，並由社會經濟歷史學家曹幸穗指導進行。該會制訂了整理滿鐵資料的三原則：

1. 以史為鑑，還原歷史真面目。
2. 分為整理、出版和研究三方面。
3. 運用現代化手段。

十年間動員了五十餘個有收藏滿鐵資料的單位，在 2007 年編成《中國館藏滿鐵資料聯合目錄》，共三十卷、二十八萬條（中、日文二十二萬條，西、俄文及其他五萬條）、兩千五百萬字。其中，從原滿鐵調查部與大連圖書館歷年目錄整理出來的就佔了十八萬條。目錄分類為三十一個學科：綜合圖書、宗教、哲學、教育、文學、語言、歷史、地理、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統計、殖民、數學、物理、化學、醫學、工程、軍事、美學藝術、體育、產業、農業、畜牧業、水產業、蠶桑養殖業、商業、工業、交通、通訊。

分會於 2007 年委由北京交通大學圖書館管理，由其負責行政及相關事務等工作。⁴¹⁸ 筆者於 2008 年 12 月拜訪了北交圖書館滿鐵資料研究分會，《目錄》出版後，分會目前從事的第二期工作為建立滿鐵資料的數據庫與目錄補遺，將來可在各大學

⁴¹⁸ 目前會長為中央編譯局局長魏海生、北交大副校長王永生，副會長為北交大圖書館館長韓寶明，秘書長為教育部退休官員沈友益。

圖書館網站查到該館所藏的滿鐵資料。北交圖書館數字資源部主任宋雪指出，滿鐵資料清查工作的困難主要在於資料分散於全國各地、成本和涉及機密等限制，他們能做的就是能聯合多少就聯合多少。另外，滿鐵資料涵蓋中國古籍、中文與外文，各方面都有，包羅萬象，各領域也在其中找尋相關研究材料，如北交主要是運用其來研究鐵道史和交通史，還有圖書文獻的整理。

第二節 滿鐵研究的回顧與評價

第一項 滿鐵研究回顧

作為帝國日本中日關係史重要機構與歷史的滿鐵，除了會社自身出版的十年史、⁴¹⁹ 社業報告，有菊池寬所著《滿鐵外史》、關東憲兵隊司令部根據檢肅事件與彈壓蒐集來的證據編輯的《在滿日系共產主義運動》，諸多調查部知識菁英的資料、經歷與言論都鉅細靡遺地記錄其中。戰後則在原調查員和學者的推波助瀾下，不只產出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書籍，亞州經濟研究所還召開過滿鐵關係者的聽證會。對滿鐵調查部問題、歷史與地

⁴¹⁹ 《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十年史》、《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第二次十年史》、《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第四次十年史》。

位的研究，在日本甚至成為所謂的“滿鐵調查部論”。⁴²⁰

1964年，伊藤武雄在山田豪一與安藤彥太郎的協助下，出版了《滿鐵に生きて》，描述了在滿鐵二十五年的經歷，首開原調查部成員以回憶、自傳式記述來寫「滿鐵史」的先河，對後續影響頗大。同年還有以在中國隨筆和遊記為主的《黃龍與東風》。1965年，領導滿鐵史研究會的早大教授安藤彥太郎主編的該會研究成果《滿鐵—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出版，後記稱「研究會每個人都沒有直接參加戰爭的經驗、未去過中國，都是滿鐵會社無關係者…我們選取這個課題，是想考察日本資本主義殖民地政策的特質，探索中國方面的反應，把握近代日中關係史的整體結構」。⁴²¹ 1970年代，有中西功《在中國革命的波瀾中》、田中武夫《橘樸和佐藤大四郎—合作社事件・佐藤大四郎的生涯》、山田豪一《滿鐵調查部光榮與挫折四十年》、草柳大藏《實錄 滿鐵調查部》（分上、下冊）。山田把調查部形容成「左翼花園」，給予綜合調查很高的評價；草柳著作則是由在朝日週刊七十回的連載⁴²²編輯而成，以故事（物語）的形式描述滿鐵與調查部的種種事蹟，他從權力與調查關係、理念和調查的關係、和中國社會的關係三個角度來描寫。⁴²³ 1980年代有原田勝正《滿鐵》、具島兼三郎《奔流 我走過的路》、宮西義雄《滿鐵調查部和尾崎秀實》、小林文男《滿鐵調查部

⁴²⁰ 解學詩，《隔世遺恩》，頁14。

⁴²¹ 安藤彥太郎編，《滿鐵日本帝國主義と中國》，頁277。

⁴²² 1978年1月6日至1979年5月1日。

⁴²³ 草柳大藏，劉耀武等譯，《滿鐵調查部內幕》。

的中國研究》、石堂清倫等⁴²⁴《十五年戰爭與滿鐵調查部》；野間清等⁴²⁵在《滿鐵調查部 綜合調查報告集》中相當詳細地說明大調查時期綜合調查的背景、方針、項目與結果。野野村一雄指稱因為已出版的相關著作有分歧而寫了《回想滿鐵調查部》，並在其中批評了草柳與山田。曾在亞洲經濟研究所任職的原覺天利用其收藏的滿鐵資料出版了《現代亞洲成立史論》、《亞洲研究和學者們》、《滿鐵調查部和亞洲》等專著。《史論》從當代亞洲研究出發，以文獻結合回憶性口述資料，討論調查機構機能和業績兩方面。除了把鐵調查部視為奠基性的研究機構，也兼論東亞研究所與太平洋問題調查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是迄今最詳細的滿鐵調查部著作。⁴²⁶

近二十年日本研究滿鐵的學者主要有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小林英夫、新瀉大學人文學部井村哲郎與慶應義塾大學社會史學教授松村高夫等人。小林英夫著作有：《超官僚》、《滿鐵》、《滿鐵經濟調查會史料》、《近代日本和滿鐵》、與福井紳一合著之《滿鐵調查部事件的真相》、《滿鐵調查部「元祖シンクタンク」の誕生と崩壊》、《滿鐵調查部の軌跡 1907-1945》。井村哲郎有《滿鐵調查部－關係者證言》、《擴充前後的滿鐵調查組織》、與天野弘之⁴²⁷合寫的《滿鐵調查部和中國農村調查－天野元之助中國研究回顧》，論文〈辛亥革命和

⁴²⁴ 野間清、野野村一雄、小林庄一。

⁴²⁵ 下條英男、三輪武、宮西義雄。

⁴²⁶ 解學詩，《隔世遺恩》，頁 24。

⁴²⁷ 天野弘之為天野元之助之孫。

滿鐵－以奉天公所情報活動為中心〉。此外還有中日共同研究，由松村高夫、解學詩與江田憲治合寫的《滿鐵勞動史的研究》。2008年另有松村高夫、江田憲治、柳澤遊合寫的《滿鐵の調査と研究－その「神話」と實像》。

中國大陸，吉林大學蘇崇民於1990年出版了《滿鐵史》；吉林省社科院的解學詩堪稱中國第一滿鐵專家，著有《鞍鋼史》、《歷史的毒瘤－偽滿政權興亡》、《滿鐵勞動史的研究》、《隔世遺思－評滿鐵調查部》、《滿鐵調查期刊載文目錄》、《滿鐵調查報告目錄》。遼寧省檔案館於1999年編成《滿鐵密檔－滿鐵與侵華日軍》。

在台灣，有中研院近史所黃福慶發表期刊論文數篇：〈論後藤新平的滿洲殖民政策〉、〈滿鐵調查部的調查事業－滿洲舊慣調查報告評估〉、〈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之背景探討〉、〈九一八事變後滿鐵調查機關的組織體系1932-1943〉等。臺北大學歷史系李朝津亦於1995年發表論文《滿鐵成立時期的多重性格－日俄戰後日本殖民及經濟路線的對立》。⁴²⁸在美國，有上述美籍華人John Young的*The Research Activities of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1907-1945: A History and Bibliography*、Louise Young的*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與Yoshihisa T. Matsusaka的*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 1904-1932*。

Louise Young認為不管是滿鐵或滿州國，這些殖民機關在

⁴²⁸ 李朝津，1995。《華岡文科學報》，第20期。

滿州大膽的統制經濟與創新構成了戰後經濟奇蹟的一部份；Matsusaka 指出滿鐵的重要性在於，以鐵道公司使日本得以合法地行使經濟權力並治理殖民地。

第二項 滿鐵研究的詮釋

戰爭的結束（或稱終戰）給日本各層次與領域都帶來了斷裂，知識與心理上亦然。鶴見俊輔在《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以「轉向」來表述終戰後日本人在精神、文化層面的趨向。如何的「轉向」，或之後所處的位置，將決定戰後日本知識界如何來回顧戰前歷史，並因此衍生出反省之必要、如何反省、怎麼樣稱得上戰爭罪行，以及加害者／受害者身分等等問題。「滿鐵調查部」做為一個既身處戰爭、又不直接進行戰事的機構，無論其中知識份子是如何回應與評價滿鐵問題、或對滿鐵歷史研究的詮釋，都不脫戰後轉向的脈絡。

其中一種是從戰爭反省的角度，例舉石堂清倫等四人。在《十五年戰爭與滿鐵調查部》的序言中，石堂指出：

在十五年戰爭中，滿鐵調查部始終站在戰場的第一線，為軍方的政策和調查而獻身。為此，調查人員中有的已經做了相應的反省。當然，調查人員的情況也有分別，率先協助侵略行動者有之，也有的因大勢所趨已無力正面抵抗侵略行動，不得以只有在追隨其行動的同時，在其內部摸索改善之策。但是，整體來說，調查人員都沒有擺脫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對十五年戰爭應自覺到都負有直接責任。

因此，若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歷史進行反思，「就無法去談滿鐵和滿鐵調查部的評價。」⁴²⁹ 而在著作中批評草柳與山田的野野村一雄這樣認為：

滿鐵調查部無論戰前戰時都是無可比擬的龐大調查機關，在那裡進行所謂自由的科學調查，乃是幻想…⁴³⁰（調查部）領導層，一邊不斷地勾結軍方，同時又進行所謂「科學的調查」，從而向軍部、政府和一般公眾提供虎頭蛇尾式的建議，最好的例子就是《生活在滿鐵》作者伊藤武雄…

另外，綜合課業務係人員也並非沒有這種人，他們一方面實踐著所謂的「抵抗的精神」，同時又想著在滿鐵社內晉升的可能性，並懷有強烈希望…嚴肅地說，這不是抵抗精神，而恰恰相反。⁴³¹

原覺天認為所謂學術的關心「很明顯是紮根於同侵略行動並行的野心動機之中的。」⁴³² 旗田魏則指出，在侵略體制下進行的研究，雖然因為實證學風而有一定的成果，但因為缺乏歷史體系與權力的關係，研究結果被忽略、也成為國家侵略的工具。⁴³³

⁴²⁹ 轉引自解學詩，《隔世遺恩》，頁 19。

⁴³⁰ 野野村一雄，《回想滿鐵調查部》，頁 387。

⁴³¹ 野野村一雄，《回想滿鐵調查部》，頁 408。野野舉渡邊雄二為例，他公開表示將來相當滿鐵副總裁。

⁴³² 解學詩，《隔世遺恩》，頁 697。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頁 764。

⁴³³ 石之瑜編，2007。《近代日本對華思想》，臺北：臺大政治系中國大陸研究中心，頁 49。

第二種的態度較為保留與中立，例如伊藤武雄認為東大新人會把大正民主風氣帶進滿鐵，不只使調查部人文薈萃，在戰爭擴大前的自由研究風氣是無庸置疑的，他個人的研究方法與議題也沒有受到干涉。在 1960 年代對帝國日本時期機構研究者（institution's researchers）的重新反省中，野間清相信自己的位置與立場和所謂帝國主義者有相當的區別：

我們是否真的有清楚地察覺到自己是日本人及滿鐵的一員？恐怕不是。我們沒做錯任何事，並主觀、自發地對中國農民產生憐憫和同情。對於是帝國主義的一翼的認同是很模糊。因為對自己的位置感到模糊，表現在我們對中國人抵抗和運動的瞭解，把他們置於我們觀點的領域之外。因此，即使語言上評價日本對中國的殖民控制，我們不能對連續懷著嚴肅的疑問，因為我們不知道。結果，我們沒有質疑把沒在日本研究過的中國農村變成一個研究目標。相反的，我們的位置是自信的研究者。⁴³⁴

他也提出疑問：侵略者為殖民統治需要而發起的調查研究，不論個別調查員的動機為何，其結果怎麼能客觀呢？⁴³⁵ 但三輪武說：「大調查部時期的綜合調查，明確指出戰爭計畫是錯誤的…綜合調查分析的結果，可以成為對日本戰爭政策毫不妥協的批評…對於日本戰爭政策所持的批判立場構成了調查部的（調查）工作基礎。」⁴³⁶ 立場居中的天野原之助認為，「我們做的

⁴³⁴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p.229.

⁴³⁵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頁 40。

⁴³⁶ 井村哲郎，《關係者證言》。轉引自解學詩，頁 708。

是提供對支政策的基礎資料，研究區域並隨著戰爭往華北、南洋乃至整個大東亞，軍方的態度是能用則用…從這點來看，我們是有協助軍方作戰，但對東亞政策等等沒什麼立場。」從這些原調查員的論述，我們可能很難分辨究竟是原來即有之，抑或終戰後的轉向。但更可能的是，滿鐵調查部這個場域本身就涵納了多元性徵與不同的可能，除非深入回溯個別知識份子在其中的經驗與過程，才有可能去回答對於滿鐵的詮釋為何。

而不同於日本著重在滿鐵意義、重新詮釋調查部或人員回憶錄等，中國大陸的滿鐵研究側重在對中國侵略史中的一個重要部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最佳體現。例舉典型評論之一如下：

滿鐵資料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對於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⁴³⁷

滿鐵資料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和掠奪中國的真相，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中國、對外擴張侵略、稱霸世界的鐵證。

滿鐵資料在某方面也存在失實和不客觀的因素，因為其調查的內容和地點，都是侵略者為殖民統治而發起…通過滿鐵資料的整理研究，可以進一步弄清日本侵略整個中國乃至東北地區以及中國人民反抗侵略鬥爭的脈絡，

⁴³⁷ 王萍，2006。〈滿鐵資料的形成及利用價值研究〉，《蘭臺世界》，第 11 卷，頁 58。

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和掠奪的真相。⁴³⁸

鑽研滿鐵四十年的解學詩更是鏗鏘有力：

滿鐵是外國帝國主義設在中國的調查機關和情報機關…
他嚴重侵害了中國主權和民族尊嚴，在日本帝國主義對
中國以及亞洲推行侵略與戰爭的政策中，起了其他方面難
以起到的巨大罪惡作用，犯下了無法估量的嚴重罪行。⁴³⁹

因此，這些帶著帝國主義、後殖民的批判的後設立場，可能會成為有戴著意識形態去面對史料、史實的有色眼鏡，進而造成研究的失真或偏誤。

第三節 中國農村資料的再研究

第一項 經濟史研究

滿鐵會社在終戰時隨著帝國日本的消亡而覆滅，但調查部留下的知識不但延續，時態調查的資料成為戰後中國研究的豐富素材。1945年前，原本這些調查與資料具有的「敵性研究」，「中國停滯論」與「輕蔑／落後」是普遍的預設與結論，然而隨著終戰的思想解放，卻因此形成以民俗人類學為基礎的研究

⁴³⁸ 李晉瑞、馬克芬，2004。〈滿鐵資料研究綜述〉，《世紀橋》，第二期，頁57。

⁴³⁹ 解學詩，《隔世遺恩》，頁695。

高峰。⁴⁴⁰ 1952年，在文部省與政治經濟研究所（所長伊藤武雄）資金贊助下，代表者仁井田陞、顧問山田三良的「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委員會」重新出版了滿鐵十多年前在華北農村的田野代表作《中國農村慣行調查》（至1958年共出版六卷，1981年又再版）。⁴⁴¹ 日本學界在同年（1952）亦依據華北慣調而有仁井田陞《中国の農村家族》、天野元之助《中国農業の諸問題》與窪德忠的《中共の宗教政策と民衆道教》等研究。⁴⁴²

1950、60年代，由於在美蘇對峙的冷戰國際結構下，美國學界對「中國」的認識與研究呈現緩慢而封閉的狀態，資料取得不易，《慣調》的出版部分填補了這個空白。1970年，經濟史學者馬若孟出版了《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是西方第一個引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的學者，更是日本之外以日文著作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第一人。⁴⁴³ 他受訪時有這樣的敘述：

在1962年之前，除了少數日本學者之外，沒有人使用這些資料。因此，在其後幾年間，我看完了整套共計5本的著作，並在其中瞭解到清末民初時，河北與山東農村的情形。這個研究後來在1970年出版成書，成為我第一

⁴⁴⁰ 邵軒磊，2008。〈戰後初期中國研究的延續斷裂〉，《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5期第1卷，頁228。

⁴⁴¹ 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第一卷》。

⁴⁴² 邵軒磊，〈戰後初期中國研究的延續斷裂〉，頁229。

⁴⁴³ 2010年7月4日，馬若孟博士訪談口述稿中譯，2007，首頁—訪談與資料，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網站，<http://140.112.150.151/RAEC/act02.php>。

本發表的專著。現在 47⁴⁴⁴ 年過去了，我剛買了 2 本史丹福大學出版社所出版關於華北地區的書，從這兩本書中，我知道我的著作仍然被視為是拓荒之作而被引用。

這本書主要的論點是反對以馬克思主義來解釋中國農村生活與經濟。Myers 解釋左派理論家論述中國的經濟困境在於，成長中並擁有財產權的農村與城市菁英集團支配了要素與產品市場，成為中國市場與消費經濟中的有錢有勢者。這些以資本家、地主、官僚或軍閥等身份組成的集團，藉由各種方式取得或擁有不同層次的壟斷力（monopoly power）來剝削在市場體系中的無產階級，依此構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史觀，賦予了階級革命正當性。但當他如一般學者希望找出支持透過獨佔控制要素與產品市場來集中財富的理論證據時，卻發現這樣的資訊其實是不存在的，「反之還看到相關證據證明市場其實不是獨佔、而是高度競爭，而貧窮發生的原因是因為戰爭與當地法律及秩序的崩潰，而非一個階級剝削另一階級的結果。」馬若孟這本書推翻了「中國的農村貧困的原因在於中國農業體系是剝削式的農業」這個命題，內容也被廣泛地引用、爭辯和討論。⁴⁴⁵

1983 年，歷史、社會經濟史學家黃宗智出版了《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⁴⁴⁶（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他想探討農村長時期的演變模式，為了進行不同時期的演變及比較研究，除了自身於 1980 年至沙井等兩個

⁴⁴⁴ 應為 37 年，訪談時馬若孟口誤。

⁴⁴⁵ 馬若孟博士訪談口述稿中譯。

⁴⁴⁶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村莊實地探訪（訪談耆老以探究當年滿鐵調查員的調查方式），⁴⁴⁷ 主要引用三組資料：冀東農村實態調查、華北農村慣行調查，以及滿鐵研究員與其他學者就個別村莊所寫的資料。黃宗智指出，以對遵化縣盧家寨、通縣小街、獲鹿縣馬村、高唐縣祁寨四個村的調查為例，提供的農作技術、勞動程式、作物組成型、耕作制度、畜力利用等詳細農家資料相當有用。更深入的研究，還有村中所有農戶的個別資料，例如沙井與寺北柴村調查員和村中數十位人士的冗長交談，⁴⁴⁸ 得以對個別農戶和村莊作縝密的審查。黃宗智認為和滿鐵資料比起來，1920、30 年代最具代表性的 John Lossing Buck 與國民黨政府土地委員會所作的兩個調查「實際上幾乎都令人只見森林，不見樹木」。⁴⁴⁹ 通過實地的調查來和滿鐵資料進行核對、補充，他的結論是：

滿鐵資料不失為用現代經濟人類學方法來研究中國農村的一組數量最大而又內容極為豐富的資料…他們的質量甚至可能高於本世紀前半期世界任何其他小農社會的有關資料。⁴⁵⁰

除了兩者皆指出世界資本主義的入侵未改變華北地區小農經濟本質之外，⁴⁵¹ 黃宗智亦藉由滿鐵資料，和馬若孟一樣對共

⁴⁴⁷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頁 42。

⁴⁴⁸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頁 38。

⁴⁴⁹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頁 40。

⁴⁵⁰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文版序。

⁴⁵¹ 杜贊奇，王福明譯，2004。《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前言。

產黨的階級革命史觀提出了批判：

使我自己免入陷阱（意識形態驅使）的最好保護可能又一次是我所使用的滿鐵調查材料以及我自己對經驗材料的偏重。材料中所顯示的豐富現實和我對經驗學術這一理想的篤信，使我無法接受用意識形態的觀察和推斷來取代調查所發現的東西。舉例來說，不同於馬克思主義者的預言，我在材料中沒有看到“經營農場”的生產力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儘管它使用了雇傭勞動這種“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⁴⁵²

他論及「滿鐵調查的巨大力量在於這些材料中豐富的細節…仔細閱讀滿鐵材料就絕不會像官方化的毛主義那樣，將中國村莊描寫為一幅簡單的階級鬥爭圖景。」⁴⁵³除了中國近代史中不容易處理的意識形態問題，黃宗智自詡為「經驗的歷史學家」，研究的起點通常是一開始鑒別大量迄今還沒有發掘的或發掘不夠的材料，然後從中找出新的經驗訊息。滿鐵材料中的豐富細節使他避免落入或偏向某一個理論的框架，符合他自己所設定，對素材的「不加批判地運用」。⁴⁵⁴馬若孟指出，他和黃的著作與理論不只被拿來進行比較，在經濟史的領域中關於如何詮釋1940年代之前的中國農村經濟這個議題上，更引發了一次大辯

⁴⁵² 黃宗智編，2003。《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⁴⁵³ 黃宗智編，《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

⁴⁵⁴ 黃宗智編，《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

論。⁴⁵⁵

研究中國土地制度的經濟史學者趙岡，在 1982、2005 年出版了《中國土地制度史》（與陳鍾毅合著）、《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兩本專書。⁴⁵⁶ 前者嘗試用土地所有權、耕地面積之變動、人口與耕地比例、耕地分配、農業經營方式比較、歷史上的經營地主、歷史上的租佃制度七個主題，以貫通的方式來探究中國土地制度的變遷，並試圖找出其中的關聯性。他引用的文獻資料頗為廣泛，從魚鱗圖冊、食貨志、明會典、清通典等古籍中擷取土地慣習、土地制度、人地關係、土地利用與分配等為經濟所用的數據資料，進而推斷研究。而民國時期的農業資料，則取自第二章所介紹，1920、30 年代對中國方興未艾的農村研究。趙岡使用了 Buck 的《中國土地利用》（1937）、土地委員會編的《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與滿鐵的調查，並比較作出了評價。他指出，滿鐵的個別農村調查範圍小、且是調查員到指定的村落中親自尋問填報，故所獲資料比全國性大面積的調查結果（指前二者）精確。⁴⁵⁷ 以表 4-9 農村調查所顯示的土地分配（1931-1941）為例，是中國 47 個地區的農村土地分配表，涵編號、地區、調查日期、調查戶數、吉尼係數、無田產者百分比與最大田產畝數，而來自滿鐵的資料較散佚，不像馬、黃集中在《慣調》，有：

⁴⁵⁵ 臺大政治系中國研究中心（2007），馬若孟博士訪談口述稿中譯。

⁴⁵⁶ 趙岡、陳鍾毅，1982。《中國土地制度史》，臺北：聯經出版社。趙岡，2005。《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臺北：聯經出版社。

⁴⁵⁷ 趙岡、陳鍾毅，《中國土地制度史》，頁 234。

《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海市嘉定區，1941，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泰安縣一部落に於ける農業情事》（滿鐵調查月報 20 卷 3 號）、《山東臨清縣農村實態調查報告》（滿鐵調查月報 23 卷 7 號，岸本光男）、《河北農村經濟之概況》（滿鐵調查月報 18 卷 4 號、1 號，中西功）等。

第二項 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

除了馬若孟與黃宗智側重經濟史的研究，之後還有政治社會學途徑的杜贊奇、人類與社會學途徑的蘭林友，以及中國農村慣行調查會三谷孝等人和南開大學合作的再調查。杜贊奇在 1988 年出版了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他沒有實地回到那些村落考察，但曾訪問過原調查員小沼正與旗田魏（東京，1981-82）、南開大學農經系（天津，1986）。⁴⁵⁸ 他想探討的問題是「國家政權的擴張對華北鄉村社會權力結構的影響」，回顧了 Sidney Gamble、楊懋春與日本學者對華北鄉村社會之描述，並參考政府報告、法令匯編、地方誌與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 1920、30 年代的調查。⁴⁵⁹ 其中關於村級結構的資料則來自滿鐵的《中國農村慣行調查》。杜贊奇發現《慣調》大部份是採訪農民的記錄，且因為人們對作為殖民統治代

⁴⁵⁸ 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頁 5。

⁴⁵⁹ 以方顯廷團隊為主。

表的調查員有疑懼，加上一些農民性情古怪等因素，⁴⁶⁰ 使部份材料自相矛盾，並不是很可靠。為了擷取出真實有用的訊息，杜贊奇廣泛閱讀調查員對一批人的訪談（許多人回答同一問題），再由其他人的回答來驗證某一材料；第二是通過精讀某一農民提供的材料，熟悉該人後即可判斷資料真偽；第三則是借助《慣調》某些卷中碑刻、契約和村莊向縣衙之稟狀這樣的原始記錄，來再現歷史原貌及檢驗材料真偽。透過交叉分析的方式考據，從中過濾出農民的生活、文化與政治社會關係，杜贊奇提出了這本書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國家政權內捲化（state involution）。內捲化最早來自 Clifford Geertz 為概念化爪哇水稻農業而提出，指的是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後，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成為另一種高級模式。20 世紀之前，鄉村社會中的政治權威體由組織和象徵符號構成的框架之中（他稱之為文化的權力網絡，the culture nexus of power），當中國從帝制走向共和，乃至 1928 年國民政府形式上統治了大部分區域後，由於試圖在既有的文化網絡外建立政治體制的失敗，使得介於國家與平民之間的鄉村菁英得以通過稅收在兩者間取得制高點，國家現代化的過程由於失去財政的控制無法推進，農民更被苛捐雜稅壓榨，直到共產黨革命的成功才終結所謂的內捲化，而這顯然是國民政府失去政權的重要原因。⁴⁶¹

⁴⁶⁰ 旗田魏與小沼正告訴他的。

⁴⁶¹ 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頁 5。

1988年，距滿鐵調查半世紀後，中國農村慣行調查會在三谷孝的主持下，與南開大學合作，追蹤調查了山東省平原縣後夏寨村等地。⁴⁶² 1999年出版了《中國農村變革と家族・村落・國家—華北農村調査の記録》兩冊。⁴⁶³ 這次中日合作的調查除了追蹤原先的紅槍會、祈雨、聯莊、村廟、打更、家族等題目，新增滿鐵調查、抗戰、土改、互助組、初級社、大躍進、四清、文革、包幹等項目，反映共和國建政後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動員歷史，加以計畫周密，收集資料相當齊全。⁴⁶⁴ 2001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學蘭林友為了進行華北村落的人類學民族誌，於暑假在後夏寨蹲點兩個月（2001/7/9-8/28），研究成果最後成書，以《廟無尋處—華北滿鐵調查村落的人類學再研究》（2007）出版。他之所以選擇後夏寨有以下原因：⁴⁶⁵

1. 利用滿鐵資料反思日本中國農村慣行調查會的調查過程，進行本土條件下人類學方法論的研究。⁴⁶⁶
2. 利用黃宗智與杜贊奇假滿鐵資料做的研究，與他們的方法做比較、反思民族誌方法論。
3. 透過滿鐵的材料，獲得日本歷史學、人類學的優良傳統與存在的研究缺陷的認識。

⁴⁶² 該團隊總共調查了四次，分別為1988、1993、1994與1999年。

⁴⁶³ 第二冊於2000年由汲古書院出版。

⁴⁶⁴ 蘭林友，2007。《廟無處尋—華北滿鐵調查村落的人類學再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頁13。

⁴⁶⁵ 蘭林友，《廟無處尋》，頁250。

⁴⁶⁶ 蘭林友獲得經費的研究計畫即為「本土條件下人類學方法論研究」。

4. 將過去民族誌村級水準資料，與現在的田野素材結合起來，體現時間軸上的比較研究。

也就是，除了因為有過去的滿鐵調查與黃宗智、杜贊奇等人的著作，使他可以從事現在與過去比較研究之外，更試圖藉由前人的研究，建立「本土的人類學方法論」。蘭林友指出，由於黃宗智與杜贊奇兩人沒有進行人類學田野工作，在絕大部分依賴 1940 年代資料的基礎下，難以辨識材料真偽，使得因為不能掌握農村政治的實質而出現錯誤的解釋。⁴⁶⁷ 他在結論處與過去的研究對話，嘗試在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的知識架構內，將華南、英語文獻、形式主義的宗族範式，與華北、日文文獻、滿鐵的、實體主義的落研究傳統結合起來，輔以滿鐵資料與自身的田野，在追蹤調查的基礎上對研究主體（華北慣調的六個村落，以後夏寨村為田野對象）進行再研究。⁴⁶⁸ 蘭林友發現後夏寨最大的變遷是，經濟型態的改變與宗教的消失，至少在象徵意義上，實體的廟都已不復存在。⁴⁶⁹

⁴⁶⁷ 例如以外顯姓氏符號建構宗族。蘭林友，《廟無處尋》，頁 2。

⁴⁶⁸ 蘭林友，《廟無處尋》，結論。

⁴⁶⁹ 蘭林友，《廟無處尋》，頁 251。宗教是杜贊奇書中文化的權力網絡中的重要途徑，藉此鞏固鄉紳在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非正式權力，而廟做為一個具政治社會意涵場域的不在，也是國民政府時期一個文化網絡消失的證據。另，本篇取名為「廟無處尋」即是由這個意義引伸而來。

第四節 滿鐵與日本戰後中國學

第一項 戰後的中國研究機構

1945年5月，隨著戰局的發展，日本的戰敗已是不可擋的趨勢。日本政府試圖將在中國的機構、團體與相關人士整合成「日華協會」，想藉這些過去和中國友好的關係緩和戰敗的衝擊。在大東亞署的監督下，由近衛文麿擔任總裁、伊藤為總務局長，並以網羅了各領域和中國相關人士為目標。⁴⁷⁰ 惟尚未有任何作為，即因二戰結束，被盟軍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GHQ)視為國策機構遭到關閉。1946年1月，在東京大塚舉行的「東洋文化研究所創立總會」結束後，與會人員順勢組成了中國研究所籌備會（在日華協會的基礎下）。10月正式成立，除了著名馬克思理論家平野義太郎、前無產階級研究所岩村三千夫、回教圈研究者野原四郎，幼方直吉、中西功、石浜知行、伊藤武雄、堀江邑一、具島兼三郎、尾崎庄太郎均曾是滿鐵人員（堀江與幼方為囑託），可視為滿鐵調查部的延續。⁴⁷¹ 雖然

⁴⁷⁰ Itō Takeo, Joshua A. Fogel trans.,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pp.206-7.

⁴⁷¹ 除此之外，尾崎、中西兩人與平野義太郎、岩村三千夫、淺川次郎於年代前期曾隸屬於屬左翼研究機構的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加加美光行(2007)，張玉林譯，〈現代中國學的新範式－共同行動論的提倡〉，《中國研究》，春秋季合卷總第5-6期，頁6。

繼承原日華協會資產的計畫遭到拒絕，外務省仍撥款十萬日圓的援助資金，使其得以運作。1951年5月，以中國研究所為母體成立了現代中國學會。加加美光行指出，這兩者都從戰前和二戰時期「日中提攜」觀點出發，具有和滿鐵相似的容共、自由主義與中間偏左的立場，並以滿鐵、東研等國策機關內左翼或容共立場從事支那研究的學者為骨幹，但認為他們不宜納入二戰後開始快速發展的「地域研究」範疇。⁴⁷²

在上述背景之下，不難想像中國研究所保持著一種中間的立場，和同時期費正清等人在美國成立的地域研究一樣，具有容共的性格。⁴⁷³ 但隨著鹿地亘進入與國共內戰實況的影響，中國研究所的立場逐漸左轉，批判國民黨並支持共產黨。⁴⁷⁴ 1950年前後發生柏林一分為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與韓戰等事件，使日本從戰敗國成為西方世界在東亞最堅實的盟友。⁴⁷⁵ 因此，GHQ 佔領日本的策略同時也從容共、民主化、非軍事化轉變為反共的軍事戰略，進而使得左傾立場方確立的中國研究所失去了涉及日本國策的可能性。⁴⁷⁶ 1953年成立亞洲政經學會，此時

⁴⁷² 加加美光行著，張玉林譯，〈現代中國學的新範式〉，頁5。

⁴⁷³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J.K. Fairbank）與麥肯（Don Mckey）等人於1946年成立了「國際與地域研究專門委員會」（Facult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由此開創了他們稱之為「地域研究」（Area Studies）之學術領域。加加美光行，張玉林譯，〈現代中國學的新範式〉，頁2。台灣通常稱作區域研究。

⁴⁷⁴ 加加美光行著，張玉林譯，〈現代中國學的新範式〉，頁6。

⁴⁷⁵ 陳建廷、石之瑜，《中日合群？日本知識界爭中國崛起的近代源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暨中國大陸研究中心，頁135。

⁴⁷⁶ 加加美光行著，張玉林譯，〈現代中國學的新範式〉，頁7。

距舊金山合約生效已一年，日本政府以擺脫美軍佔領、發揮內外政策自主性為目的。亞洲政經學會既是戰後日本地域研究的發軔、具國策研究意圖，一方面是日本領導人主觀上政策自主性的恢復，並在現實上和依附美國、反共道路重疊。⁴⁷⁷ 核心理事中，原覺天曾是滿鐵調查部成員。⁴⁷⁸ 1957年，在板垣與一、原覺天與川野重任的建議下，岸信介命通產大臣成立了亞洲經濟研究所，希望培養熟悉亞洲歷史、現狀又具熱情的人才，更有使日本作為亞洲盟主擺脫對美依附的宏大意圖。⁴⁷⁹ 從東大退休的東畑精一於1959年擔任首任所長，他所考慮的培養人才途徑，是通過當地留學或實地調查等形式獲得有關亞非拉的歷史和現實的基於實感的知識，然後進行理論化的嘗試，最後再發展到政策研究層面。⁴⁸⁰ 但無論是亞洲政經學會或亞洲經濟研究所，都沒有處在直接介入制定外交國防政策和經濟援助合作政策的立場。⁴⁸¹

第二項 對戰前中國學的批判與滿鐵的意義

第二節已由原滿鐵調查部成員的反省提到終戰給予日本的

⁴⁷⁷ 加加美光行著，張玉林譯，〈現代中國學的新範式〉，頁7。

⁴⁷⁸ 其他研究人員為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植田捷雄、慶應大學英修道、入江啟四郎、板垣與一、川野重任等，政府方面有外務省亞洲局局長中川融、課長小川平四郎，與經濟界的水野成夫等人。

⁴⁷⁹ 加加美光行著，張玉林譯，〈現代中國學的新範式〉，頁11。

⁴⁸⁰ 加加美光行著，張玉林譯，〈現代中國學的新範式〉，頁11。

⁴⁸¹ 加加美光行著，張玉林譯，〈現代中國學的新範式〉，頁11。

斷裂，若將他們個人層次拉高至「日本」，則是包括大東亞概念、帶領支那進步的東洋史觀等中國論述的失敗。面對此價值上的「虛脫狀態」，輿論界和學界開始因應這個處境並找尋對於自身的一套論述解釋。⁴⁸² 學界在冷戰體制建立起來的短暫期間中，主要的思考方向在「反省」之前的中國研究觀點。然雖以 1945 年 8 月作為討論「戰後中國學」的斷點，但學術社群有其延續性，不可能憑空產生，⁴⁸³ 這使得和帝國日本擴張同起同滅的滿鐵調查部有其重要性，更是延續／斷裂兩分有所不當的例證；二來受到「戰前與戰後的研究連結性」、「革命史觀與講座時期」、「美日學術結構」、「亞細亞、福特基金會事件」、「日中共產黨分裂對學術」等事件的影響，⁴⁸⁴ 發展過程曲折且複雜。唯戰後非本文討論重點，故僅就日本戰後知識界對滿鐵研究在日本中國學脈絡的位置與詮釋作一簡單的定位。

在戰後日本中國學研究的分類中，第一期是一方面反省戰時的知識矛盾與其間藉由各種思想包裝起來的戰爭論述，並試圖在新的政經環境下摸索。其時中國內戰與國際現勢未明，中國研究所不只均為滿鐵與東研的學者，也一定程度延續了曾經為滿鐵人所自豪的自由空氣。一種以 1958 年亞洲經濟研究所成

⁴⁸² 吉川道雄，1993。《總論—戰後日本の中國史論爭》，東京：河合出版，頁 10。轉引自邵軒磊，2009。《戰後日本之中國研究系譜》，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中國研究中心，頁 91。

⁴⁸³ 邵軒磊，《戰後日本之中國研究系譜》，頁 51。

⁴⁸⁴ 山根幸夫，1983。現代：戰後の日中交流とわが國中國現代史研究の背景，山根幸夫編，《中國史研究入門》，東京：山川出版社，頁 488-539。轉引自邵軒磊，《戰後日本之中國研究系譜》。

立為斷點（山根幸夫與邵軒磊）；一種以文革爆發的 1966 年為斷點（加加美與嚴紹盪），視戰後二十年為「反省和原罪中國觀時期」，⁴⁸⁵ 兩者皆將中國研究所當作討論戰後中國研究的起點。1947 年，藤原定在《中国研究の課題性と大衆の思想》⁴⁸⁶ 中提出當時日本中國研究者困境是缺乏全面性的思考，而以知識途徑而言，只接受了中國的上層知識階級意識形態與觀點。第二，是研究者必須將視野關照實際社會，而「戰時日本中國學」研究累積了大量的基礎調查資料，對其加以整理成為研究文獻是十分有利的，例如滿鐵調查部與東亞研究所做的慣行調查便是很珍貴的素材。第三，他又認為思想範疇中，相對於戰前的文哲學（儒學）研究，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科學研究」則在當時具有心理與現實的急迫性。1950 年，村松祐次在《戰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⁴⁸⁷ 中，從要求對整體的中國有歷史性、全面性的視角開始，再次呼籲要研究底層社會。由此延伸對實證主義的反省，認為必須要從身邊、從生活經驗開始，進行帶有「目的」的研究。1966 年，旗田魏，在《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學の傳統》中，指出日本亞洲研究的標的是沿著朝鮮→滿蒙→中國→東南亞的路徑，基本上與時間軸上的滿鐵調查

⁴⁸⁵ 第二階段為文革時期 1966-1975，第三階段為 1975 至今日。嚴紹盪，《日本中國學史》。

⁴⁸⁶ 藤原定，1947。〈中國研究の課題性と大衆の思想〉，《中國研究》，第 1 期，頁 56-58。轉引邵軒磊，《戰後日本之中國研究系譜》，頁 39。

⁴⁸⁷ 村松祐次，1950。〈戰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一橋論叢》，第 23 卷第 1 期，頁 45-65。轉引邵軒磊，《戰後日本之中國研究系譜》，頁 26。

部的關注重點一樣。他並稱「戰前日本之亞細亞研究是在侵略體制下進行，在實證學風下固然有一定的成果，但因為缺乏歷史體系，最後是無視其研究所產生的結果，與權力緊密結合，成為國家侵略的工具。」⁴⁸⁸ 但增淵龍夫持否定觀點，認為戰前中國研究固然受到近代主義影響，採取蔑視中國的態度，戰後亦然，並以馬克思主義為準，造成日本的中國研究缺乏主體性。「無論是過去對中國的蔑視，或對現代中國的禮讚，都是由同一國際感覺出發，但在同一視角下卻出現兩極化的表現。」故除了權力的扭曲之外，還要爭取本身的主體性。⁴⁸⁹

另外，山根幸夫以 1958 年作為戰後的中國研究的斷點，第一代戰後主要的現代中國研究者「通常都隸屬於舊滿鐵調查部與舊東亞研究所，包括直接、間接與這個機關有關係的人。」而這些人的中國情懷與實際中國經驗，使前期中國研究具有原始資料上的優勢，研究中國時不可避免地帶有感情，是因為與戰時體驗和生命歷程息息相關。⁴⁹⁰ 1958 年後的第二期，是建立在較為現代的學術規範與制度之上，伴隨日中國交正常化，得以有學術交流的可能，各種資料能夠得到更新。⁴⁹¹ 山根的論文另一特色是結合了學術與時事的討論，回顧許多對學術影響的重大事件。原覺天在 1984 年發表《現代亞洲成立史論》詳盡記

⁴⁸⁸ 李朝津，〈日本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慶應義塾大學政治學科之個案研究〉。石之瑜編，《近代日本對華思想》，頁 49。

⁴⁸⁹ 石之瑜編，《近代日本對華思想》，頁 49。

⁴⁹⁰ 邵軒磊，〈戰後日本之中國研究系譜〉，頁 92。

⁴⁹¹ 山根幸夫，1983。《中國史研究入門》，頁 498。

錄了滿鐵調查部的研究與知識史，認為戰時中國研究雖然與侵略行為同時，但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很明確與絕對。亞洲經濟研究所所長東畑精一在《亞洲經濟》創刊號中，指出「『…過去的日本，儘管絕大多數是以國策為契機進行調查研究的，但是，也有立即擺脫這種制約，致力於符合實際的真正調查研究而獲得寶貴的調查報告。』並舉台灣舊慣調查、朝鮮農業土地調查、華北農村舊慣調查等「滿鐵調查部的大量調查」為例，強調其完全是為了學術本身而進行的。⁴⁹² 內山完造指出，戰前日本的中國研究主要是為政府服務，研究如何有效的佔領與控制中國，當時的研究機構也大都受到政府或軍方的補助，以致日本的知識界可說是幾乎是依附在軍國主義下，並且大都願意為其提供理論包裝，⁴⁹³ 這種知識界怯懦的現象到戰後也被廣為檢討。⁴⁹⁴ Stefan Tanaka 在 *Japan's Orient* 中視東洋學方法的發展為一典範，框架了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日本對中國（支那）的認識，但機構知識（如滿鐵與東洋文庫）因為後設與方法論的欠缺，致使獲得的訊息悖離研究客體；但他同時也指出，滿鐵內部的「左翼派系」有注意到這個偏誤，並以馬克思方法論來修正並從事研究。他舉尾崎秀實言論為例：

⁴⁹² 解學詩，《隔世遺思－評滿鐵調查部》，頁 696。

⁴⁹³ 諸葛蔚東，2004。〈戰後日本知識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1 卷第 1 期，頁 92-93。

⁴⁹⁴ 陳建廷、石之瑜，《中日合群？日本知識界爭中國崛起的近代源流》，頁 138。

特別因為這些知識是由滿鐵獲得的，我相信其可以被完全的信任；事實上，來自滿鐵的訊息與知識不會被貼上任何標籤。

滿鐵對中國研究重要性在於，無論是在日本、甚至世界上其他地方，都難以再出現一個這麼龐大、橫跨半世紀、觸角遍及整個中國的研究機構。但若從整個滿鐵歷史的深度出發，又很難去簡化出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知識機構。研究者會遇到的矛盾是，如果以滿鐵為題目，會是一個太大的歷史問題，無法容納這麼多的史料；若將其中的部分，例如滿鐵調查月報、經調會、左翼派系等拉出來處理，又有可能欠缺周延與代表性。但滿鐵還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使後人在回顧「日本中國學」知識史、系譜時，可以做一個延續／斷裂的對照。第二，戰後二十年中國的相對封閉，使得實證研究與經驗資料突然從有至無，再因為中日關係、交流的恢復，使學界有一個很好機會，可以是反省、反思或對照，以及利用終戰之前的珍貴資料。這些資料填補了當時對中國經驗資料的空白。第三，滿鐵調查部在的時間，正是中國處於最劇烈變動的大時代，使得支那研究既可以貼近觀察、更得以見證到變遷，而滿鐵也成了研究者進入中國的途徑與位置。

第五章 結論：以滿鐵爲 方法進入中國

日本在甲午戰爭擊敗中國，獲得朝鮮與台灣，毫無置疑地以行動證明自己在亞洲的優越；然不出十年，又在國際不是很看好的情況下擊敗了俄國，昭示日本不止已雄霸亞洲，此勝利同時取得和歐陸、美國等列強平等的位置。為了好好利用取得的戰果，閣僚們決議以成立鐵路、港口與煤礦等商業經營為主體的公司，但即使有一半民股，仍不掩滿鐵是國策會社的事實。後藤新平把他的「生物學國家」原理灌注到調查部，希望能像在台灣一樣，從科學、經驗的研究出發，生產有效輔佐政策的知識。但調查部往後的發展可能遠遠超過後藤的預想，他不只是一個機構，而顯然是日本在中國知識菁英的代稱，這些人可能在大連、北京、張家口或上海，彼此不一定有密切聯繫，但都是滿鐵職員的身份、或在滿鐵框架下和中國發生各種互動和關係。面對這個宏大的歷史問題，本文是以日本中國學脈絡為基礎，從三個面向討論滿鐵中國研究的知識學，一是滿鐵的調查研究、二是滿鐵的研究者，三是戰後滿鐵遺留資料的使用者與研究者。

滿州舊慣調查是滿鐵第一個大規模農村研究，但關心的議題主要是土地而非農業，且和實際調查比起來，更多的是對舊

有資料的查核與勘誤，故被批評為文獻至上主義；滿鮮史地部是白鳥庫吉與後藤的合作，前者希望以延續與擴大他的東洋史學研究，後者則認為「歷史慣習」的調查有助於殖民政策，正是後藤主張「學俗一致」的體現。東亞經濟調查局則號稱為滿鐵外務省，既是政策需要，也企求在學術上開放的態度能使列強不會質疑日本想獨佔滿州。到了經調會時期，在軍部和滿州國政府的要求下，調查部也進行了更多關於「統制經濟」的政策與研究，雖然受軍方干預日深，在大上末廣等人的推波助瀾下，引入當時在日本頗為流行講座派經濟理論，馬克思主義有頗為流行，形成「講座」與「前歷」兩派。但隨著戰爭擴大與日本國內的思想彈壓，調查部亦無法倖免。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一開始被視為解決戰事停滯的利器，但結論是長期以來日本可能無法負荷，具島和中西力陳的「政治解決」，卻反過來成為軍方檢舉他們有敗戰思想的證據。從第二章可以看到，滿鐵反映了帝國日本的知識矛盾，以及權力和知識之間相互利用又衝突的複雜關係。知識的客觀性不能擺脫權力與其目的，但是研究者仍有一定的能動性做出若干超越權力而影響後世的決定。不管是自然或社會科學，知識本身就有立場，並由這個立場衍生出論述，在殖民／被殖民的結構中，這個立場主要是由殖民者所決定。但在當時的中國，滿鐵調查員雖然來自日本，但從筆者所蒐集的資料可以發現，他們常常覺得自己是被夾在政府（或權力當局，如軍部、滿州國）與中國實體之間，既要依賴這個位置從事研究，又無法超越這個位置的結構，只能權宜地在兩者間擺盪。

為了更深入討論滿鐵內部的知識學，第三章個人歷程出發，選取橘樸（1881-1945）、大川周明（1886-1957）、伊藤武雄（1895-1984）與天野原之助（1901-1980）四個看似沒有顯著連貫，從明治橫跨到昭和的知識份子，卻因為滿鐵關係者而有共通性。橘樸在日俄戰爭後，即藉著《遼東新報》登陸中國，以記者的身份親身觀察中國達近半世紀，並以擔任滿鐵囑託時發行的《滿州評論》影響最大。大川並未前進中國，但是是亞洲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的代表，是滿鐵青年將校的代表，和軍方關係密切並提供戰爭理論，以東亞經調局為活動場域。前二者活動均因天皇宣佈終戰而消亡。但伊藤和天野並沒有結束於此，滿鐵經驗更成為他們和共產主義中國交好的原因之一。伊藤武雄與天野原之助是大正思潮下成長的一代，前者在東大法學部時參與新人會，並因為吉野作造產生中國興趣，是滿鐵前進北京與上海的前緣，北京滿鐵月報更致力於中國革命與促進中日的瞭解；後者畢業於京大，受西田幾多郎、內藤湖南與河上肇影響頗深，透過滿鐵調查部，他得以在中國各地進行農村研究的。這四者既是滿鐵知識份子的切片，也是當時從事支那研究的在華日人例像（不含大川），伊藤關注勞工運動、革命與列強對中國的宰製，天野和橘樸則都視農民、農村為認識中國最佳途徑。

第四章討論滿鐵在戰後的後續研究影響，以華北農村慣行調查為例，成為了 1900-1949 半世紀間中國農村研究最好的素材，也因此產生了一種知識上延續與再利用。不管是社會科學或人類學，都以不同時間的比較研究來觀察社會的變遷，最著

名的例子就是費孝通的《再訪江村》。而解放後因為農業集體化、以政治動員推展政策等因素，中國農業生產、農民生活都有劇烈的改變，這使華北慣調成為了比較的珍貴素材，馬若孟、黃宗智與杜贊奇都不同程度地給予了這批資料高評價。但蘭林友認為要親身從事田野民族誌，才可以比較並比對出材料的真實性與修正偏誤；第二，因為與這批出自日本人的材料對話，蘭林友得以依此建立屬於中國學界的「本土人類學方法論」，從知識論來看，對人類學方法是一個很好的進展。至於滿鐵研究的意義，如本文所敘，可以是考證、戰爭反省與典型歷史研究，但在中國，卻因為種種目的而沾染意識形態，使得詮釋被框架在帝國主義批判的脈絡下。這使研究者會以此來過濾史料或事件，近而造成詮釋的失真。

戰後中國學的延續／斷裂，則是從多為原滿鐵調查部成為組成的中國研究所出發，雖因為政治變遷，使其很快被其他機構所取代，但仍代表了實證／多元／不受規範／經驗／自由主義等概念意義上的中國研究延續。滿鐵調查部在「日本中國學」知識史、系譜的脈絡下，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場域，涵納了當時日本對中國研究的矛盾、興趣、方法、爭論、學者等面向，也是日本邁向帝國過程中嘗試更為包容的知識視野，因而更是日本中國學界的縮影。而無論是超越或進入，帝國主義或馬克思，政策或興趣，經驗或案牘，若仍僅以帝國主義一言來指涉滿鐵調查部在知識學上意義，顯已不敷使用，茲以為本書結論。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份

(一) 專書

- Gordon, Andrew (安德魯·高登)，李朝津譯，2008。《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幕府到現代》，桂林：廣州師範大學出版社。
- Spence, Jonathan D. (史景遷)，溫洽溢譯，2001。《追尋現代中國——革命與戰爭》，臺北：時報出版。
- Duara, Prasenjit (杜贊奇)，王福明譯，2004。《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Myers, Ramon H. (馬若孟)，史建雲等譯，1999。《中國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民發展，1890-194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Robert J. C. Young (楊格)。國立編譯館主譯，周素鳳、陳巨擘譯，2006。《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導引》，臺北：巨流圖書。
- 子安宣邦，陳瑋芬譯，2004。《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王屏，2004。《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石之瑜，2003。《社會科學方法新論》，臺北：五南出版。
- 石之瑜編，2007。《近代日本對華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 北岡伸一，魏建雄譯，2005。《後藤新平傳》，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1999。《江蘇省農村調查(民國二十二年)》，臺北市：文海出版。
- 李永熾，1992。《日本近代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

- 李圭之，2008。《近代日本的東洋概念——以中國與歐美為經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 杜維運，2006。《史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邵軒磊，2009。《戰後日本之中國研究系譜》，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 沈宗瀚、趙雅書等編，1979。《中華農業史論集》，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周德望，2008。《不在中國？日本漫畫中的起源意識與現代身份》，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 荊子馨，鄭力軒譯，2006。《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
- 孫歌，2001。《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草柳大藏著，劉耀武、凌雲、舟徙、關益譯，1982。《滿鐵調查部內幕》，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陳水逢，1988。《日本近代史》，臺北：台灣商務，頁154。
- 陳建廷、石之瑜，2007。《中日合群？日本知識界爭中國崛起的近代源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 崔新京等著，2006。《日本法西斯思想探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野村浩一，張學鋒譯，1999。《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走向亞洲的行蹤》，北京：中央編譯。
- 黃宗智，1994。《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黃宗智編，2003。《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費孝通，1987。《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 曾倚萃，2008。《溝口雄三的的中國方法——超克亞洲的知識脈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 解學詩，2003。《隔世遺思——評滿鐵調查部》，北京：人民出版社。
- 解學詩，2007。《滿鐵與華北經濟 1935-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解學詩主編、松村高夫，2003。《滿鐵與中國勞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趙岡、陳鍾毅，1982。《中國土地制度史》，臺北：聯經出版社。
- 趙岡，2005。《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臺北：聯經出版社。
- 蘇崇民，1990。《滿鐵史》，北京：中華書局。
- 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2008。《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臺北：行人出版。
- 關捷主編，2006。《日本侵華政策與機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嚴紹盪，1993。《日本中國學史》，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 蘭林友，2007。《廟無尋處——華北滿鐵調查村落的人類學再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二) 論文與期刊

- 王萍，2006。〈滿鐵資料的形成及利用價值研究〉，《蘭臺世界（理論版）》，第11卷，頁58。
- 加加美光行，張玉林譯，2007。〈現代中國學的新範式——共同行動論的提倡〉，《中國研究》，春秋季合卷總第5~6期，頁5-7、11。
- 李晉瑞、馬克芬，2004。〈滿鐵資料研究綜述〉，《世紀橋》，第2

- 期，頁 57。
- 邵軒磊，2008。〈戰後初期中國研究的延續斷裂〉，《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5(1)，頁 228。
- 邵軒磊，2009。〈西方如何影響日本的中國研究？——以日本福特基金會論爭為例〉，《中國大陸研究通訊》，52(3)，頁 71-87。
- 林文程演講，2005。趙文瑾整理，〈方法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國大陸研究通訊》，第 5 期，頁 24。
- 陳豐祥，1984。〈滿鐵經濟調查會之成立及其影響〉，《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12 期，頁 225-248。
- 陳慈玉，2003。〈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日本東洋史學方法之一面向〉，《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 42 期，頁 18-19、21-22、26-29。
- 黃俊傑、蔡明田，1997。〈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試論〉，《人文學報》，第 16 期，頁 6。
- 黃福慶，1986。〈論後藤新平的滿洲殖民政策〉，《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 15 期上冊，頁 379-381、393-398、401。
- 黃福慶，1990。〈滿鐵調查部的調查事業——滿州舊慣調查報告評估〉，《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 19 期，頁 345、349。
- 黃福慶，1993。〈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之背景探討〉，《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 22 期下冊，頁 140-141、146、151-154。
- 黃福慶，1995。〈九一八事變後滿鐵調查機關的組織體系 1932-1943〉，《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 24 期上冊，頁 369-374、379、396。
- 黃福慶，2001。〈一九三三年的滿鐵改組案爭議〉，《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18 期。
- 解學詩，2004。〈日本戰時對中國的認識——滿鐵的若干對華調查與觀點〉，《近代史研究》，第 4 期。
- 諸葛蔚東，2004。〈戰後日本知識界〉，《北京大學學報》，21(1)，頁 92-93。

(三) 網路資料

- 2010年7月4日，條目：荒木貞夫，維基百科（中文）
<http://zh.wikipedia.org/wiki>。
- 2010年7月4日，條目：南滿州鐵道，維基百科（中文）
<http://zh.wikipedia.org/wiki>。
- 2010年7月4日，條目：天皇機關說，維基百科（日文）
<http://ja.wikipedia.org/wiki/>。
- 2010年7月4日，條目：新人會，維基百科（日文）
<http://ja.wikipedia.org/wiki/>。
- 2010年7月4日，條目：東亞經濟調查局，維基百科（日文）
<http://ja.wikipedia.org/wiki/>。
- 2010年7月4日，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http://marxists.anu.edu.au>。
- 2010年7月4日，條目—陳翰笙，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 2010年7月4日，Ramon Myers 博士訪談口述稿中譯（2007），首頁—訪談與資料，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網站，<http://140.112.150.151/RAEC/act02.php>。
- 2010年7月4日，楊覺勇口述，文車整理，2005。《國民黨不敢查閱 我拍到了日本的秘密檔案》，原文刊載於環球時報第二十三版（2005年11月30日），人民網日本版<http://japan.people.com.cn/BIG5/35467/35498/3910492.html>。
- 2010年7月4日，李華偉（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漢學資源》，<http://www.ntnu.edu.tw/alumni/alumni-07/325/325-004.htm>。
- 2010年7月4日，條目：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滿鐵資料館，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543475.html>。

二、外文部份

(一) 英文

Cooper, Frederick & Ann Stoler, Laura eds., 1997, *Tension of Empire-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akeo, Itō, Joshua Fogel A. trans., 1988, *Lif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John Young, 1966,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of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1907-1945*, New York: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Louise Young, 1998,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hilip C.C. Huang, 1983,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eter Duus,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s., 1989, *Japan's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asenjit Duara, 1988,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rasenjit Duara, 2003,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Inc.

Ramon H. Myers, 1970,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 Stefan Tanaka, 1993,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ven Saaler & J. Victor Koschmann eds., 2007, *Pan-Asianism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Colonialism, Regionalism and Border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Yoshihisa Tak Matsusaka, 2001, *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 1904-193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二) 日文

- 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79。《舊殖民地關係機關刊行物總合目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編》，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 小林英夫，2005。《滿鐵調査部「元祖シンクタンク」の誕生と崩壊》，東京：平凡社。
- 小林英夫，2006。《滿鐵調査部の軌跡—1907-1945》，東京：藤原書店。
- 小林英夫，1996。《滿鐵—「知的集團」の誕生と死》，東京：吉川弘文館。
- 小熊英二，1995。《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
- 三谷孝主編，1999、2000。《中國農村變革と家族・村落・國家—華北農村調査の記録（二卷）》，東京：汲古書院。
- 山田豪一，1977。《滿鐵調査部—榮光と挫折の四十年》，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
- 山本秀夫，1977。《橘樸》，東京：中央公論社。
- 山田辰雄等，2005。《橘樸翻刻と研究》，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社。

- 山根幸夫編，1983。《中國史研究入門》，東京：山川出版社。
- 井村哲郎、天野弘之，2008。《滿鐵調査部と中國農村調査—天野原之助中國研究回顧》，東京：不二出版。
- 中國農村慣行調査刊行會編，1982。《中國農村慣行調査第一卷》，東京：岩波書店。
- 北京滿鐵月報，1925年9月—1928年6月，通刊第11—17、27卷；特刊第1-7、12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
- 田中武夫，1975。《橘樸と佐藤大四郎》，東京：龍溪書社。
- 石堂清倫、野間清、野野村一雄、小林庄一，1986。《十五年戦争と滿鐵調査部》，東京：原書房。
- 安盛松之助編，龍溪書社復刻，1978。《上海滿鐵季刊》，東京：龍溪書社。
- 安藤彦太郎編，1965。《滿鐵—日本帝國主義と中國》，東京：御茶水書房。
- 伊藤武雄，1984。《滿鐵に生きて》，東京：勁草書房。
- 吉川道雄，1993。《戦後日本の中國史論争》，東京：河合出版。
- 村松祐次，1950。〈戦後日本の近代中國研究の動向〉，《一橋論叢》，23(1)。
- 松村高夫、柳沢遊、江田憲治編，2008。《滿鐵の調査と研究：その「神話」と実像》，東京：青木書店。
- 酒井哲哉編，2006。《帝國日本の學知—第一卷》，東京：岩波書店。
- 原覺天，1984。《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東京：勁草書房。
- 野野村一雄，1986。《回想滿鐵調査部》，東京：勁草書房。
- 滿鐵調査部，三一書房復刻，1970。《支那抗戦力調査報告》，東京：三一書房。
- 滿鐵支那月誌，1929年11月—1931年4月，通刊第30—43、46、47卷，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

滿鐵調查部編，高麗書林復刻，1985。《滿鐵調查月報》，首爾特別市：高麗書林。

藤原定，1947。〈中國研究の課題性と大眾の思想〉，《中國研究》，第1期。

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編，極東研究所復刻，1969。《在滿日系共產主義運動》，東京：極東研究所出版會。

— |

| —

— |

| —

附 錄

附錄一：伊藤武雄的中國履歷

時間	經 歷 與 事 件
1895	出生
1914	進入第一高等學校（一高）就讀
1917	從一高畢業，同年夏天參加滿鮮支旅行團。 進入東京帝大法學部政治學科，加入東大新人會（12月）。
1920	自東大畢業，進入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7月）。 轉入大連本社調查課（10月），在石川鐵雄課長下參加滿蒙全書第二卷軍事擔當的編撰。
1921	被任命為北京初代駐在員（10月）。
1922	考察第一次香港罷工，由開灤煤礦罷工觀察中國解放運動。
1924	北京滿鐵月報創刊，設置北京研究室。
1925	上海五卅運動，北京滿鐵月報五卅特刊發刊。
1926	視察第二次香港大罷工，在廣州和蘇兆征、劉少奇、林祖涵會面。（3月）；「歐美諸國的對中國政策和中國研究調查機關的研究」留學計畫被批准（5月）到美國加州大學進修（12月）。
1927	《現代支那社會研究》出版（3月）。

時間	經 歷 與 事 件
1929	從歐洲返回大連（3 月）；被任命為南京駐在員（5 月）；北京滿鐵月報改為滿鐵支那月誌，由上海事務所發行。
1932	任經濟調查會調查課長（1 月）；協助接待李頓調查團。
1935	由經調會新京駐在幹事轉任天津駐在幹事。
1937	天津事務所所長（3 月）；上海事務所所長（7 月支那事變後）。
1942	轉任大連本社顧問（2 月），等待成為滿鐵旁系公司的理事；被通知可能成為西伯裏島行政長官。
1943	第二次檢肅事件被拘留（6 月）；於敦化監獄時向滿鐵提出辭呈（10 月）；一路從大連、敦化（待六個月）輾轉至奉天刑務所。
1944	由奉天刑務所轉送至新京監獄；5 月 27 日獲釋。
1945	自大連返回東京（5 月）。收到從東京支社透過大連本社，希望他加入籌組民間團體日華協會的電報。擔任日華協會總務局長。
1946	參加中國研究所設立。
1951	擔任日中友好協會理事長（7 月）。
1958	長崎國旗事件（4 月）；受國旗事件的刺激，與風見章、細川嘉六、中島建藏等人發表「反省聲明」（7 月）。

附錄二：滿鐵知識菁英一覽表

姓名與生卒年	最高學歷	滿鐵職位	備註
橋樑 (1881-1945)	熊本第五高等學校	顧問 (屬託)	記者
大川周明 (1886-1957)	東京帝大	東亞經調局	甲級戰犯、活躍於猶存社等社團。
中江丑吉 (1889-1942)	東京帝大政治學部 (1913)	顧問 (屬託)	中江兆民之子。
佐野學 (1892-1953)	東大法學部、大学院農政學	東亞經調局 (屬託)	新人會，日本共產黨員。
嶋野三郎 (1893-1982)	聖彼得堡國立大學 (公費)	東亞經調局	滿鐵俄羅斯專家
宮崎正義 (1893-?)	留學莫斯科 (和嶋野同時被選拔為石川縣公費留學生)	調查課俄國系主任、參事、經調會第一部主任查	石原莞爾智囊
鈴江言一 (1894-1945)	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肄業	北京、上海支所屬託	
田中九一 (1894-?)	東京帝大法學部 (1921)	東亞經調局	新人會
伊藤武雄 (1895-1984)	東京帝大 (1920)	上海、北京支所	新人會
波多野鼎 (1896-1976)	東京帝大	東亞經調局	新人會
嘉治隆一 (1896-1978)	東京帝大	東亞經調局	新人會
鈴木小兵衛 (1899-?)	東京帝大文學部肄業 (1929)	調查部資料課	新人會
尾崎秀實 (1901-1944)	東京帝大	屬託	Sorge 事件，文藝評論家尾崎秀樹之弟。
大上末廣 (1901-1944)	京都帝大 (1929)，大學院肄業	屬託、經調會、產業部	因檢肅事件死於獄中。
天野原之助 (1901-1980)	京都帝大	調查課、經調會	中國農業經濟專家
前嶋信次 (1903-1983)	東京帝大文學部	東亞經調局	伊斯蘭史專家

具島兼三郎 (1905-2004)	九州帝大法文學部 (1928)	調查部資料課	國際政治學者，曾任長崎大學校長、長崎綜合科學大學校長、長崎平和文化研究所所長。
石堂清倫 (1904-)	東京帝大 (1927)	調查部資料課	新人會
野間清 (1904-)	京都帝大 (1931)	調查課、經調會	新人會
稻葉四郎 (1908-)	東京帝大 (1933)		
中西功 (1910-1973)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	上海事務所	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野野村一雄 (1911-)	大阪商科大學 (1935)	調查部資料課	
石川正義 (1911-)	東京帝大 (1937)	上海支所	
伊藤律 (1913-1989)	一高退學	滿鐵東京支社	受尾崎秀實重用；日本共產黨。
石川鐵雄 (-1934)	東京帝大法學部 (1910)	東亞經調局、本部、第四任調查課長	
旗田魏	東京帝大 (1931)	華北經濟調查所調查員 (1940)	參與華北農村慣行調查，日、韓史專家。
枝吉永	東京帝大經濟學部 (1931)	東亞經濟調查局	
原覺天	法隆寺勸學院	1939 入滿鐵任囑託	現代亞洲成歷史論作者
石浜知行	東京帝大		新人會
笠木良明	東京帝大	東亞經調局、本部	行地社、大雄峰會，國粹主義者、法西斯份子。滿州青年聯盟的五族協和運動。
岡上守造	東京帝大		新人會
綾川武治	東京帝大法律/文學	東亞經調局	

附錄三：1920-30 年代中國的農村調研整理

調查人或單位	時間	調查區域	調查成果或出版書籍	備註
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	1927 1930	湖南省（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 江西省尋烏縣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為了有效地將農村接及矛盾化為革命力量，共產黨人透過實地調查以了解農村的真實情況。
費孝通	1936	江蘇省吳江縣開弦弓村	《江村經濟》	江村經濟由其倫敦政經學院博士論文出版。
陳翰笙與中研院社科所	1929 1930 1933-34 1933	a. 無錫 b. 河北保定 c. 廣東 d. 山東濰縣、安徽鳳陽、河南襄城（菸草區）	敵的差異（無錫）、廣東的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中國煙農生活研究	a. 無錫農村經濟調查計畫 b. 與北平社會調查所合作 c. 與中山文化教育館、和嶺南大學合作 d. 與中山文化教育館合作
卜凱 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	1922-24 1929-33	華北與華東 7 個省的 7 個縣 2866 個農場； 22 個省 16786 個農場	《中國農家經濟》（1936） 《中國土地利用》（1937）	
威廉·瓦格納	1920 年代	山東	《中國農書》	以個人第一手田野調查和及閱讀為基礎
方顯廷 南開大學經濟所	1930 年代	天津市及河北各城市與鄉村		該所由洛克斐勒基金會贊助。方顯廷與其學生關注的重點為城市及鄉村工業。
托尼	1930 年代		《中國的士地和勞動》	
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	1930 年代	廣西省、雲南省、陝西省、江蘇省、浙江省…等	廣西省、雲南省、陝西省、江蘇省、浙江省農村調查	1933 年 5 月成立
土地委員會	1930 年代		《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	

附錄四：滿鐵重要農村調查研究整理

調查計畫	時間	滿鐵機構與合作機關	調查區域	備註
滿州舊價調查	1909	調查部舊價調查班	先以關東州與奉天，後延伸至吉林、黑龍江與蒙地	岡松參太郎、天海謙三郎、川村柳次郎 《滿州舊價調查報告書》
大泉眼村調查	1933	公主嶺農事試驗場、經調會	吉林省懷德縣大泉眼村	《滿州一農村的社會經濟的研究—大泉眼部落調查》；天野原之助、鈴木辰雄、水谷國一
農村概況調查	1934	滿鐵	吉林省永吉縣	《滿州農業和部落構成—生產諸關係》（鈴木辰雄）、《滿州一農村的金融》（水谷國一）、《滿州一農村的農民租稅負擔》（野間清）
農村實態調查	1936.3	滿州國臨時產業調查局、經調會	奉天省五縣、熱河省兩縣、黑龍江省一縣	塩見友之助、椎名悅三郎
第一次冀東農村時態調查	1936	天津事務所、經調會、產調、冀東自治政府	冀東地區十三縣農村	《冀東農村時態調查報告書》（四部） 伊藤武雄
第二次冀東農村時態調查	1937.2-3	天津事務所、產業部	冀東地區的平谷、寶坻、豐潤、昌黎四縣農村	《第二次冀東農村時態調查報告書》 中西功
農家經濟調查	1937	北支經調所第四班	冀東地區	記帳式調查
華北農村概況調查	1939-40	北支經調所第四班	河北、山東交界處	不同農村概況比較研究
華北農村慣行調查	1940-42	東亞研究所、北支經調所	河北省、山東省七農村	《法的慣行》 東研未弘嚴太郎、滿鐵杉之原舜一

附錄五：北京滿鐵月報

刊 號	北 京 公 所	通 刊 號	內 容	分 類
第二年四、五 號合刊	1925/9/30	11 12	上海事件特輯 一、上海事件に就て 二、上海及各地狀況一般（一） 三、輿論及宣言 四、經濟上の影響に就て	政治
第二年第六號	1925/11/30	13	I 調査研究 1.支那官營鐵道從業員待遇規則及概況 2.業景莘氏案財政整理計畫 II 月報 支那鐵道建設計畫大綱	鐵道 經濟 鐵道
第二年第七號	1925/12/30	14	I 月報 1.勞動問題視察記 2.支那國有鐵道第六回運輸會議議案 II 資料 支那古代政治思想史	勞工 鐵道 新書介紹

第三年第一號	1926/1/30	15	<p>I 月報</p> <p>開鑿礦物局營業報告</p> <p>軍閥內閣對民眾運動立場</p> <p>日本滿州出兵反對輿論</p> <p>混沌北京政局</p> <p>II 資料 – Process of Physical Growth of Among Chinese (附錄) 支那財政と人民負擔</p>	<p>勞工</p> <p>政治</p> <p>政治</p> <p>政治</p>
第三年第二號	1926/3/15	16	<p>I 調查研究</p> <p>支那國有鐵道的職工教育</p> <p>II 月報</p> <p>1. 一九二三年度支那國有鐵道營業成績</p> <p>2. 吉敦鐵道請負契約締結の事情及び其の經過</p>	<p>鐵道</p> <p>鐵道</p> <p>鐵道</p>
第三年第三號	1926/4/10	17	<p>I 調查研究</p> <p>平滂鐵道線路測量報告大意</p> <p>II 月報</p> <p>1. 戰事の損失</p> <p>2. 民國十五年支那戰亂小誌</p>	<p>鐵道</p> <p>政治</p> <p>政治</p>
第五年第一號	昭和3年6月1日	27	北京に於ける下層社會の金融機構と各種の社會設施	經濟

附録六：滿鐵支那月誌

刊 號	出 版 時 間	通 刊 號	目 録
第六年第二號	昭和4年11月15日 (北京滿鐵月報改題)	通刊第30號	支那研究を科學的綜合へ (滿鐵支那月誌改刊に際して) 里見甫 訓政時期の國民黨と國民政府 伊藤武雄 米國對支政策基調論 熊得山 支那の土地制度 宮本通治 支那の農村經濟に関する一つの觀察
第六年第三號	昭和4年12月15日	通刊第31號	里見甫 訓政時期の國民黨と國民政府 大塚令三 上海の小銀に関する一考察 伊藤武雄 支那言論界に於ける「滿州問題」 古代支那に於ける商業資本の發達 宮本通治 支那の農村經濟に関する一つの觀察 支那の政治・經濟・社會・勞動に関する文獻の紹介
第七年第一號	昭和5年1月15日	通刊第32號	里見甫 國民政府の立法事業 李達 現代中國社會の解剖(一) 橘樸 舊支那社會に於ける資本家的の生産關係 ミフ 現代支那の經濟狀態 大塚令三 中國共產黨の成立期に就て 支那の政治・經濟・社會・勞動に関する文獻の紹介
第七年第二號	昭和5年2月15日	通刊第33號	里見甫 國民政府の司法活動 橘樸 支那農村社會の上部構造 赤塚武雄 銀の暴落と上海市場の影響に就て 熊得山 中國農民運動の史的考察(一) 宮本通治 最近に於ける支那の赤色勞動組合運動に就て 支那の政治・經濟・社會・勞動に関する文獻の紹介

第七年第三號	昭和5年3月15日	通刊第34號	<p>里見甫 國民政府の農金廣事業と財政問題 李達 現代中國社會の解剖(二) 田中忠夫 支那農業に於ける資本家的生産關係 陳獨秀 支那共產黨批判 支那の政治・經濟・社會・勞動に関する文獻の紹介</p> <p>里見甫 國民政府の財政問題 田中忠夫 支那の農具經濟問題 大塚令三 中國共產黨文獻考(一) 島家進二郎 上海の雜誌に関する調査 社會科學に関する翻譯出版 南京政府の十七年度財政報告 支那の政治・經濟・社會・勞動に関する文獻の紹介</p>
第七年第四號	昭和5年4月15日	通刊第35號	<p>里見甫 國民政府の教育事業 大塚令三 中國共產黨文獻考(二) 大形孝平 支那の都會人口に就て 宮本通治 最近支那に於ける勞動運動の發展傾向 伊藤武雄 歐洲に於ける支那發見 和田喜一郎 國民政府の財務會計制度に關するケンメラ一 案實施とその概要に就て 支那の政治・經濟・社會・勞動に関する文獻の紹介</p>
第七年第五號	昭和5年5月15日	通刊第36號	<p>里見甫 國民政府の工商關係問題 陶希聖 中國社會の封建性 大塚令三 中國共產黨文獻考(三) 方峻峯 トロツキー派の中國社會論 宮本通治 支那農村社會の封建的性質に就て 大形孝平 上海に在る支那研究機關(一) 支那の政治・經濟・社會・勞動に関する文獻の紹介</p>
第七年第六號	昭和5年6月15日	通刊第37號	

第七年第七號	昭和5年7月15日	通刊第38號	クーパー 里見甫 房福安 伊藤武雄 大形孝平 支那に関する新刊圖書 銀の價格 國民政府の交通關係事業 支那に於ける自動車道路の現状 リツヒアルトウ(?)イルヘルムの計 上海に在る支那研究機關(二)
第七年第八號	昭和5年8月15日	通刊第39號	里見甫 龍眠 宮本通治 大形孝平 支那に関する新刊圖書 國民政府の交通關係事業(二) 支那に於けるソウエート政權の發展 自流井の鹽 上海に在る支那研究機關(三) 米支經濟關係 支那農村社會に於ける階級層
第七年第九號	昭和5年9月15日	通刊第40號	支那に関する新刊圖書 マデアール 陳菲芸 中島權 見里甫 支那に関する新刊圖書 アジア的生產方法 支那社會史に於ける數個の基問題 江北農村社會の構造に就て 國民政府の外交問題
第七年第十號	昭和5年10月15日	通刊第41號	支那に関する新刊圖書 マデアール 陳菲芸 逸廣 張心一 支那に関する新刊圖書 支那の農業經濟 支那社會史に於ける數個の基問題(二) 陶希聖氏の「中國社會の封建性」を讀みて 支那の小作に関する統計的研究
第七年第十一號	昭和5年11月15日	通刊第42號	支那に関する新刊圖書 マデアール 逸廣 里見甫 支那農村經濟の統計に就て 陶希聖氏の「中國社會の封建性」を讀みて(二) 國民政府の内政及導准

第七年第十二號	昭和5年12月15日	通刊第43號	一雜錄— 滿州の農民運動 自流井の鹽（二） 支那に関する新刊圖書 ドウプロウスキー— 封建制度・農奴制度及商業資本の本質 に就て 朱伯康— 中國封建制度の史的考察 一雜錄— スウェーデン燐寸トラストと支那の燐寸工業 最近の上海の人口 支那ソウエイットの靈法に就て 陳菲芸— 中國の土地所有形式（一） 陶希望— 支那に於ける婚姻と家庭の發達 朱伯康— 中國封建制度の史的考察（三） 河北省の工業化に就て 支那に関する新刊圖書
第八年第三號	昭和6年3月15日	通刊第46號	陳菲芸— 中國の土地所有形式（二） 陶希望— 支那に於ける婚姻と家庭の發達（二） 陳翰笙— 支那の社會の構造に関する研究活動 王寅生— E Kann— 現在支那にはいくらの銀が在るか 大形孝平— 最近の中央財政に就て 支那に関する新刊圖書
第八年第四號	昭和6年4月15日	通刊第47號	

附註：由上海事務所出版，1929-1933（昭和四年—八年），昭和八年（1933年）春休刊。

附錄七：上海滿鐵季刊發刊文

上海滿鐵季刊

第一 年 第 一 號

昭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支那研究と我等の態度……………安盛松之助…	1
浙江期間の基礎的考察……………山上金男…	3
支那航運業の現勢……………下田有文…	71
支那合作運動發展の様相……………長澤武夫…	173
支那の土地問題に関する文獻……………天野元之助…	215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上海事務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資料

從王道樂土到中國研究的資料庫—超越帝國主義的滿鐵
/ 陳鼎尹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大政治系中國中心，
民 103.03

ISBN 978-986-04-0403-6 (平裝)

1. 南滿鐵道株式會社 2. 歷史

557.256

103001602

從王道樂土到中國研究的資料庫 — 超越帝國主義的滿鐵

著作權所有 ◆ 翻印必究

著 者 / 陳鼎尹

出 版 者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
教學與研究中心

地址：100 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

電話：(02)2351-9641#337

傳真：(02)2341-2806

E-mail:politics@ntu.edu.tw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

印 刷 者 / 翰蘆圖書出版公司暨金華排版打字行

電話：(02)2382-1120 • 2382-1169

初版日期 / 103 年 3 月

非賣品

《本書如有缺頁、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